

2012/13 全球工资报告

工资和公平增长

国际劳工组织

国际劳工组织（ILO）成立于 1919 年，致力于促进社会正义，实现世界永久和平。ILO 的责任是制定和监督实施各项国际劳工标准。它是唯一具有三方性质的联合国机构，由来自政府、雇主和雇员的代表共同制定政策和实施项目，促进所有人实现体面劳动。这一独特的制度安排使得 ILO 在了解就业和工作方面的“实际”知识时拥有优势。

全球工资报告

2012/13

工资和公平增长

国际劳工组织 — 日内瓦

版权 © 国际劳工组织 [2012]
2012 年第一次印刷

国际劳工局出版物享有《世界版权公约》第二项议定书中规定的版权。未经允许，在标明来源的情况下可以转载部分内容。如需复制或翻译，应向国际劳工局出版部门（版权和许可）申请复制权和翻译许可，地址：International Labour Office, CH-1211 Geneva 22, Switzerland, 或发邮件至：pubdroit@ilo.org。国际劳工局欢迎此类申请。

已在复制权组织注册的图书馆、机构及其他用户可根据许可复制。请访问复制权组织国际联盟网站 www.ifrro.org 得到本国复制权组织相关信息。

2012/13 全球工资报告 —— 工资和公平增长
日内瓦，国际劳工局，2012

工资 / 最低工资 / 就业 / 失业 / 家庭收入 / 劳动生产率 / 经济衰退 / 发达国家 / 发展中国家
13/07

ISBN: 978-92-2-526236-3 (印刷版)
978-92-2-526237-0 (网络版 PDF)

同时出版英文、阿拉伯文、法文、葡萄牙文、俄语和西班牙文 PDF 版：

英文：ISBN 978-92-2-126237-4；阿拉伯文：ISBN 978-92-2-626237-9；法文：ISBN 978-92-2-226237-3；葡萄牙文：ISBN 978-92-2-826237-7 俄语：ISBN 978-92-2-426237-1 西班牙文：ISBN 978-92-2-326237-2

同时出版英文、法文和西班牙文 EPUB 版：

英文：ISBN 978-92-2-126923-6；法文：ISBN 978-92-2-226923-5；西班牙文：ISBN 978-92-2-326923-4。

国际劳工组织出版物数据库分类

国际劳工局出版物使用的名称符合联合国惯例，其内容不代表国际劳工局对任何国家的法律地位、区域或领土及其当局、或边界划定发表意见。

署名文章、研究报告和其它文稿，文责由作者自负，出版发行并不构成国际劳工局认可其观点。

提及的企业和商业产品和生产的名称不意味其得到国际劳工局的认可，而未提及的企业和商业产品和生产也并非得到不认可。

国际劳工局出版物可以通过大型书商，或国际劳工组织设在当地的办公室获得，抑或直接联系国际劳工局出版部门，地址：Publications Bureau, International Labour Office, CH-1211 Geneva 22, Switzerland。新出版物的图书目录或清单可以从上述地址免费索取，或通过电邮索要：pubvente@ilo.org

欢迎访问我们的网站：www.ilo.org/publns

在中国印刷

前言

全球经济危机对世界许多劳动力市场造成了负面影响，复苏的进程和成果还难以确定。在全球层面，平均工资出现增长，但是增长率低于危机前水平。尽管如此，此次《2012/13 全球工资报告》还是表明，经济危机对各国工资的影响程度非常不均。

在发达经济体，经济危机导致工资“两次下跌”：实际工资先是于 2008 年下降，然后于 2011 年再次下滑，目前的情况表明，在 2012 年，许多发达国家工资就算有增长，涨幅也非常微弱。

在新兴经济体，工资增长普遍更加坚韧，亚洲增长强劲，而非洲、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涨幅温和但仍呈现正向增长。

在东欧和中亚地区，经济危机导致工资于 2009 年出现下降，随后回到正增长但涨幅较低。

从长期趋势来看，报告估计得出，亚洲自 2000 至 2011 年间，月实际平均工资几乎翻番，非洲增长了 18%，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增长了 15%，而发达经济体增长 5%。在东欧和中亚区域，工资从原来 1990 年代经济崩溃这样一个非常低的起点上增长了两倍。在中东，可用的工资数据非常有限。这些有限数据表明，较低的劳动生产率和薄弱的制度建设使得该地区工资增长在过去十年间停滞不前。

此次《全球工资报告》提供了全球工资变化趋势的数据，将这些数据与劳动生产率变化趋势进行了对比，分析了他们对全球经济的复杂影响，我们希望这些分析能够为目前关于分配、竞争力和劳动成本的讨论带来一些新的思考。当工资能够和劳动生产率同步增长，二者都能实现可持续发展，家庭购买力因而得到提高，从而刺激进一步的经济增长。然而，在经济危机前十年甚至更长时间以来，许多国家工资和劳动生产率之间的联系被打破，导致产生全球经济不均衡。本报告表明，自 1980 年代以来，大多数国家“劳动份额”出现下滑，意味着国民收入中只有较低比例流向劳动薪酬，而更多的份额流向了资本。这种情况不仅常见于工资停滞的那些国家，也出现在了一些实际工资呈现强劲增长的国家。从社会和政治层面来看，这种趋势可能会导致一种

感觉，就是劳动者及其家庭没有从他们创造的财富当中分到应得的份额。从经济层面来看，以工资为主的家庭消费受到束缚，这可能危及未来经济增长的脚步和持续的发展。尤其是以债务为基础的消费致使家庭在接下来的时期内不得不还清早先的债务，情况就更加如此。

在全球层面，当一些国家通过贸易盈余或出口来抵抗经济衰退时，就需要以进口国出现赤字和重新安排就业为代价。为避免以邻为壑的竞争局面，可持续和均衡的经济增长应当通过工资和劳动生产率同步增长，从而带动盈余国家国内消费来实现。国际协商有助于实现公平的成果，使所有国家受益。

世界上有许多国家在尝试通过实施创新性政策来应对这些挑战。我希望此次《全球工资报告》会对各国有所帮助，能够促使我们对当前国际决策层面最为关注的问题产生新的思路。



Guy Ryder

国际劳工组织总干事

目录

前言.....	V
目录.....	VII
致谢.....	XI
摘要.....	XIII

第一部分：工资的主要发展趋势

1 全球经济背景：经济危机、经济衰退与就业.....	1
1.1 各地区经济增长率差异显著	1
1.2 全球失业率维持较高数字	2
2 实际平均工资.....	3
2.1 复杂形势下的缓慢增长	3
2.2 性别工资差距.....	5
3 区域估算	8
3.1 整体增长掩盖复杂局面	8
3.2 发达经济体.....	12
3.3 东欧与中亚区域.....	18
3.4 亚洲和太平洋区域.....	21
3.5 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区域.....	27
3.6 中东区域.....	31
3.7 非洲	34
4 最低工资和有工作贫困.....	38
4.1 发达经济体	38
4.2 发展中经济体和新兴经济体	40

第二部分 劳动份额下降与公平增长

5 收入中劳动份额的降低	45
5.1 劳动份额的变动趋势.....	45
5.2 工资与劳动生产率之间的差距	50
5.3 金融市场和其它因素的作用	53
6 劳动份额对经济增长的影响.....	59

6.1 劳动份额和总需求下降：影响不确定	59
6.2 追求最佳的劳动份额	62
6.3 “大衰退”和更均衡增长的机会	65

第三部分 对公平增长的启示

7. 内部和外部的不均衡	67
7.1 功能性和个人收入分配	67
7.2 工资性消费下降，影响了经济的复苏	68
8. 重新建立工资和生产率之间的联系	69
8.1 统一政策措施	69
8.2 加强现有制度	69
8.3 劳动力市场之外的思考	70
8.4 发展中国家的特殊情况	71

附录

技术附录一	73
技术附录二	83
技术附录三	87
技术附录四	97
尾注	103
参考书目	109

表

表 1. 2000 年以来各地区实际工资的累计增长（以 2000 年为 100）	10
表 2 16 个经济体中劳动份额下降 1%对国内生产与服务中的私人消费、投资和净出口的影响 ..	60

图

图 1. 1995 至 2012 年期间年均经济增长率（以不变价格计算 GDP）	1
图 2. 2005 至 2011 年世界和发达经济体整体失业率（占劳动力总数百分比）	2
图 3. 2006 至 2011 年全球实际工资年平均增长率	3
图 4. 1999 至 2007 年以及 2008 至 2011 年性别工资差距的变化情况	6
图 5. 1993 至 2009 年爱沙尼亚性别工资差距	7

图 6. 2008 至 2011 年挪威不同就业状况的性别工资差距	7
图 7. 2006 至 2011 年各区域年平均实际工资增长率	8
图 8. 2010 年制造业单位小时直接工资报酬的国际比较（美元）	11
图 9. 2006 至 2011 年超发达经济体名义工资增长和通货膨胀变化趋势（%）	12
图 10. 1999 至 2007 年间和 2008 至 2011 年间发达经济体产出与就业增长（%）	15
图 11. 1999 至 2007 年间和 2008 至 2011 年间发达经济体实际工资与劳动生产率增长（%）	16
图 12. 1999 至 2007 年间和 2008 至 2011 年间东欧和中亚产出与就业增长（%）	19
图 13. 1999 至 2007 年间和 2008 至 2011 年间东欧和中亚工资和劳动生产率增长（%）	20
图 14. 1990 年以来俄罗斯联邦实际工资指数（以 1990 年为 100）	21
图 15. 2006 至 2011 年亚洲实际平均工资年增长率	22
图 16. 1999 至 2007 年间和 2008 至 2011 年间亚洲产出与就业增长（%）	24
图 17. 1999 至 2007 年间和 2008 至 2011 年间亚洲产出与领薪雇员数量增长（%）	25
图 18. 1999 至 2007 年间和 2008 至 2011 年间亚洲工资和劳动生产率增长（%）	26
图 19. 1999 至 2007 年间和 2008 至 2011 年间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区域的产出和就业增长（%）	28
图 20. 2004 至 2011 年间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的经济增长和失业率（%）	29
图 21. 2006 至 2011 年间巴西年实际平均工资年增长率	29
图 22. 部分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国家 2004 至 2011 年间工资和劳动生产率的增长（%）	30
图 23. 1999 至 2007 年间和 2008 至 2011 年间中东地区产出和就业率增长（%）	32
图 24. 1999 至 2011 年间中东地区工资和劳动生产率的增长（%）	33
图 25. 1999 至 2007 年间和 2008 至 2011 年间非洲的产出和就业率增长（%）	35
图 26. 1999 至 2007 年间和 2008 至 2011 年间非洲产出和领薪雇员数量的增长（%）	36
图 27. 部分非洲国家 1999 至 2011 年工资和劳动生产率增长（%）	37
图 28. 部分发达经济体 2010 年最低工资标准（以 2010 年购买力平价计算，和与全职劳动者中位数工资的比值）	39
图 29. 2006 至 2011 年间发达经济体最低工资标准的增长	39
图 30. 有就业的有工作贫困人口（每天收入低于 1.25 美元和 2 美元）占雇员总数的比例 .	43
图 31. 1970 至 2010 年期间发达国家、德国、美国和日本调整后的劳动份额	47
图 32. 1970 至 2007 年期间发展中国家和新兴经济体调整后的劳动份额	47
图 33. 1992 至 2008 年期间中国未经调整的劳动份额	48
图 34. 1947 年 1 季度至 2010 年 1 季度期间美国小时劳动生产率和小时劳动薪酬	50
图 35. 1991 至 2011 年间德国劳动生产率和工资的变化趋势：	52

图 36. 发达经济体平均工资和劳动生产率增长的变化趋势（以 1999 年为 100）	53
图 37. 影响劳动收入份额的因素	55
图 38. 1990 至 1994 年间和 2000 至 2004 年间各因素分解后给调整后平均劳动收入 份额变化造成的影响	58
图 39. 功能性收入份额对宏观经济的影响	59
图 40. 2000 至 2010 年期间部分欧元区国家的单位劳动成本（以 2000 年为 100）	63
债务驱动的增长	63
图 41. 2003 至 2010 年部分国家经常账户差额和家庭债务的变化情况.....	64

专栏

专栏 1: 工薪劳动者中的贫困状况	42
-------------------------	----

附录图

图 A1 劳动份额下降 1%对国内产品和服务的私人消费、投资和净出口的影响：a 为产品和服务的私人消费；b 为投资；c 为净出口	101
--	-----

附录专栏

专栏 A1 数据选择和估算过程：计量经济方法	87
专栏 A2 数据、估计和模拟	97

附录表

表 A1 区域划分	75
表 A2 2010 年全球工资数据库的覆盖率（%）	76
表 A3 2006 年至 2011 年期间全球工资数据库的覆盖率（%）	77
表 A4 影响调整后劳动份额的因素	92
表 A5 外部因素对调整后劳动份额的影响	93
表 A6 表 A4、A5 和专栏 A1 中所包括的国家的情况	93



国际劳工组织全球工资数据库：www.ilo.org/wage12.

请用智能手机扫描此二维码，
接入国际劳工组织全球工资数据库网址。

致谢

主要创作人员

本报告是由国际劳工组织工作条件与就业司（TRAVAIL，简称就业司）工作人员以及国际劳工组织在日内瓦各部门和全球各国办公室的同事们共同完成的。就业司司长 Philippe Marcadent 负责组织领导工作。Patrick Belser 负责主要编撰工作。报告撰写团队包括 Patrick Belser，Malte Luebker，Sangheon Lee，Andres Marinakis，Kristen Sobeck，Daniel Vaughan-Whitehead，Jacobo Velasco 和 Rosalia Vazquez-Alvarez。Rengin Gunaydin 和 Mila Daskalova 进行协助研究工作。Kristen Sobeck 处理了全球工资数据库的工作，完成了第一部分的图表。Malte Luebker 审核了全球及各地区的工资趋势估计值。Rosalia Vazquez-Alvarez 提供了中东地区的工资政策并审阅了报告的第二部分。Charlotte Beauchamp 协调编辑和出版事宜。Christian Olsen 负责报告封面设计。

具体资料来源

本报告第二部分主要选自由 Sangheon Lee（ILO 就业司）负责的“工资对宏观经济影响”的研究课题。这个课题由 Özlem Onaran（威斯敏斯特大学），Giorgos Galanis（威斯敏斯特大学和华威大学），Marc Lavoie（渥太华大学），Engelbert Stockhammer（金斯顿大学），Eckhard Hein（柏林经济和法律学院），Matthias Mund（柏林经济和法律学院），Servaas Storm（代尔夫特科技大学），C.W.M. Naastepad（代尔夫特科技大学），Till Van Treek（Düsseldorf 宏观经济研究所）和 Simon Sturn（曼彻斯特阿默斯特大学）等学者共同参与完成。Massimiliano La Marca（ILO 政策一体化司）也对课题有所贡献。

特别致谢

感谢国际劳工组织位于巴拿马的“信息系统和劳动力分析”团队，特别感谢 Bolívar Pino 提供了拉丁美洲和加勒比海地区的工资数据，同时感谢 Steven Kapsos 提供了关于工薪劳动者贫困问题的分析研究。

我们也感谢下列人员对报告的宝贵贡献：Janine Berg, Fabio Bertranou, Evangelia Bourmpoula, Monica Castillo, Juan Chacaltana, Matthieu Charpe, Miguel del Cid, Maria Crisetti, Mauricio Dierckxsens, Chris Edgar, Philippe Egger, Lawrence Egulu, Ekkehard Ernst, Verónica Escudero, Regina Galhardi, Werner Garate, Najati Ghosheh, David Glejberman, Stefan Kühn, Sameer Khatiwada, David Kucera, Bob Kyloh, Chang-Hee Lee, Elva Lopez Mourelo, Moazam Mahmood, Anne Posthuma, Stephen Pursey, Uma Rani, John Ritchotte, Catherine Saget, Reynold Simons, Vincenzo Spiezia, Steven Tobin, Manuela Tomei, Raymond Torres, Geir Tonstol, Zafiris Tzannatos, María Elena Valenzuela, Sher Verick, 还有四位匿名评审人。

本报告的中文版由王霞女士翻译和审阅，在此一并致谢。

工资的主要发展趋势

经济危机继续抑制工资增长

全球实际平均工资的增长仍然远低于危机前的水平，虽然新兴经济体仍有明显的增长，但发达国家的实际工资增长已经变成了红色。全球 2011 年剔除通货膨胀因素后的月平均工资——即月实际平均工资——增长了 1.2%，低于 2010 年的 2.1% 和 2007 年的 3%。中国因其庞大的经济规模和强劲的经济表现而对全球工资增长率的计算产生了很大影响。如果不包含中国，2011 年全球实际平均工资的增长率只有 0.2%，低于 2010 年的 1.3% 和 2007 年的 2.3%（见图 3）。

工资增长的区域差异

不同区域实际平均工资的增长趋势存在明显差异（见图 7）。发达经济体的工资趋势经历了两次下沉，而拉丁和加勒比区域在整个危机期间仍然保持正增长，亚洲涨幅更大。东欧和中亚区域的波动幅度最大，部分原因是全球经济危机爆发之前这些国家经历了后经济转型期工资恢复迅猛增长的阶段，而在 2009 年实际工资又开始剧烈收缩。在中东地区，实际平均工资自 2008 年以来一直在下降，当然其中一些数据还只是暂时估计值，非洲的数据也是如此。

不同区域的累计工资增长率

如果对 2000 年至 2011 年累计工资增长率数据进行分析就会发现，各区域之间的差异更加明显。从全球角度来看，月实际平均工资仅增长了不到四分之一。在亚洲，月实际平均工资几乎翻了一番，而发达经济体只增长了约 5%。东欧和中亚区域的实际工资几乎是过去的三倍，但这主要是由于向市场经济转型过程的恢复性增长带来的。例如，俄罗斯工资的实际价值曾经下跌到不足上世纪九十年代的 40%，而此后又用了十年时间才恢复到最初的水平。

工资水平的区域差异

新兴经济体的工资水平虽然有显著增长，但是各国工资水平的差距依然十分明显。在菲律宾，制造业工人每工作一小时只能拿到大约 1.40 美元。在巴西，制造业工人每小时的直接报酬是 5.40 美元，希腊为 13 美元，美国为 23.30 美元，而丹麦达到了 34.80 美元（按 2010 年汇率计算）。

劳动份额不断下降和公平增长

全球劳动者分到的蛋糕更小了

1999 年至 2011 年期间，发达经济体平均劳动生产率的增长是平均工资增长的两倍多（见图 11）。在美国，非农领域的实际小时劳动生产率自 1980 年以来增长了 85%，而实际小时劳动薪酬只增长了 35%。在德国，劳动生产率在过去的二十年里提高了近四分之一，而月实际工资却维持不变。

这种全球趋势带来了国民收入分配的变化，即大多数国家劳动收入占国民收入份额不断降低，而资本收入所占份额不断提高。甚至在中国这样一个过去十年间工资水平大约增长了两倍的国家，GDP 的增长速度也依然超过了工资总额的增长，因而导致劳动份额走低。

劳动份额的降低主要是由于技术进步、贸易全球化、金融市场扩张以及工会入会率下降等因素对劳动者谈判能力的破坏所导致的。其中，金融全球化产生的影响可能高于先前的判断。

劳动份额下降带来的影响

劳动份额的下降不仅影响了人们对公平这一问题的看法，特别是当前公司高管和金融领域过高的工资引起了越来越多的关注，也不利于家庭消费的增长，进而导致总需求不足。一些国家通过增加净出口来弥补总需求不足的问题，但并非所有国家都可以在同一时期内实现经常账户盈余。因此，承受经常账户赤字危机的国家经常会被建议采取削减劳动成本的策略，而这一策略在压制内需方面带来的风险可能更甚于刺激

出口增长的效果。如果众多国家同时竞相削减工资，将出现劳动份额的“逐底竞赛”和总需求的萎缩。

对公平增长的影响

收入分配和工资水平

这份《全球工资报告》详细介绍了国家内部及国与国之间工资分配和工资水平的变化趋势，分析了这种变化趋势对经济和社会造成的影响。报告的主要结论之一是，无论是从功能性收入分配的角度，还是就个人收入分配而言，收入不平等都在继续扩大。

功能性收入分配关注的是国民收入在劳动和资本之间的分配，许多国家的功能性收入分配都呈现出工资份额下降而利润份额上升的长期趋势。同时，个人收入分配也变得更加不平等，工资额最高 10% 和最低 10% 劳动者之间的收入差距在日益扩大。这些内部的“不均衡”已经导致或加剧了外部的不均衡，甚至在此次经济大衰退之前，由于各国试图通过放松信贷或出口顺差来弥补工资份额降低对消费需求的不利影响，这种不均衡就已经开始显现。

强化生产率与工资之间的联系

那么应该怎么做呢？我们的分析表明应当在国家层面和全球层面采取政策措施，努力实现“再均衡”。在纠正外部不均衡方面，各国决策者不能简单地认为可以找到摆脱危机的“捷径”。决策者应当努力制定政策来加强劳动生产率增长和劳动者薪酬增长之间的联系。一些国家目前拥有高额的经常账户盈余，为加强生产率增长与工资增长之间的联系，从而刺激内需增长创造了有利空间。而债务国家和欧元区国家则应当避免使劳动份额的逐底竞赛进一步加剧。外部和周边社会伙伴采取的紧缩措施会危害有效的劳动关系。

强化制度建设

实现“内部再均衡”可以从加强工资决定制度入手。在劳动力市场分割加剧和技术进步迅速的背景下，将劳动者组织起来难度很大，因此需要为集体谈判提供更大的

支持和创造更为有利的环境。低工资工人在工资决定制度方面需要得到更为有力的保护。设计得当的最低工资制度被证明是一种行之有效的政策工具，能够提供体面的“地板工资”，进而保障劳动者及其家庭维持最低生活水平。

劳动力市场范围之外的改革

仅通过劳动力市场政策来达到收入分配的目标是不现实的，还需要许多劳动力市场之外的改革措施来配合实现分配的调整，包括改革和修复金融市场，恢复其引导资金进行生产性和可持续性投资的作用。关于“再均衡”，还有其他一些重要措施值得进行更进一步的分析，如资本课税和劳动收入课税之间的平衡等等。

在工资收入者之外的人群

在发展中经济体中，与支付最低工资有关的那些就业保障计划能更好地激励私营企业遵守最低工资制度。但由于发展中国家和新兴国家中只有约一半的劳动者为工资收入者，因而还需要辅以其他手段来提供更多的工资性工作岗位，同时还要提高个体劳动者的生产率和收入水平。

提高平均劳动生产率仍是我们面临的重要挑战，因为这需要努力提高受教育水平，提高生产转型和经济发展所需要的各项技能。要建立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使劳动者及其家庭能够减少预防性储蓄，增加子女的教育投入，这样才能更好地促进国内消费需求的增长和生活水平的提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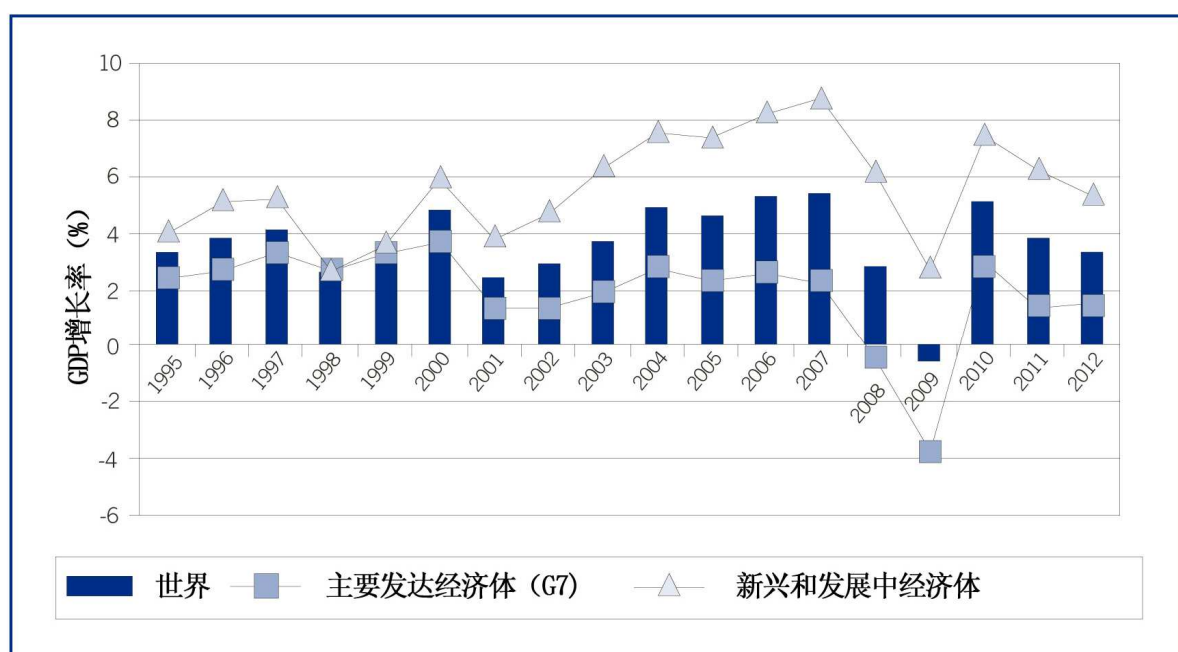
第一部分：工资的主要发展趋势

1 全球经济背景：经济危机、经济衰退与就业

1.1 各地区经济增长率差异显著

在经历了 21 世纪最初几年的强劲经济增长后，2009 年世界经济因全球金融和经济危机而开始萎缩（见图 1）。经济危机在全球各地造成的影响非常不均。在较发达的经济体，2009 年被视为“经济大衰退”年，是自上世纪 30 年代“经济大萧条”以来最严重的经济下滑。尽管 2010 年最初的经济复苏比预期强劲，但是主权债务危机和随之而来的各种紧缩措施使得随后的经济增长明显放缓，在欧洲尤为明显。与之相反，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则避免了整体衰退，其经济增长率自 2000 年以来始终高于发达国家。

图 1. 1995 至 2012 年期间年均经济增长率（以不变价格计算 GDP）



注：国家分组是按照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分组方法，在 IMF，2012b 报告附录中有介绍。主要发达经济体包括加拿大、法国、德国、意大利、日本、英国和美国。新兴和发展中经济体由没有被界定为发达经济体的 151 个经济体组成。2012 年数据为预测数据。

资料来源：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经济展望数据库

1.2 全球失业率维持较高数字

全球金融和经济危机对劳动力市场的影响通常是用失业率柱状图来进行分析的，特别是发达经济体，失业人数从不足劳动力总数的 6% 上升到 8% 以上，而希腊、爱尔兰、葡萄牙和西班牙失业率甚至达到了两位数¹。发展中国家的失业率波动相对较小。尽管如此，自危机发生以来，全世界失业人口还是新增了 2700 万，使得失业人口总数达到 2 亿人，占全球劳动力总数的 6%（图 2）。而问题最严重的可能是青年失业率，该数字已经达到了惊人的比例。按照国际劳工组织的估算，2011 年全世界有 7500 万年龄介于 15 至 24 岁之间的青年人受到失业问题影响，占青年人口总数的比例超过 12%。还有更多的人没有被纳入失业人员的统计，因为这些人由于极度沮丧而根本停止了寻找工作的努力。

图 2. 2005 至 2011 年世界和发达经济体整体失业率（占劳动力总数百分比）



注：2011 年数字为初步预测数字。“发达经济体”的界定见技术附录一。
资料来源：ILO 报告，2012a。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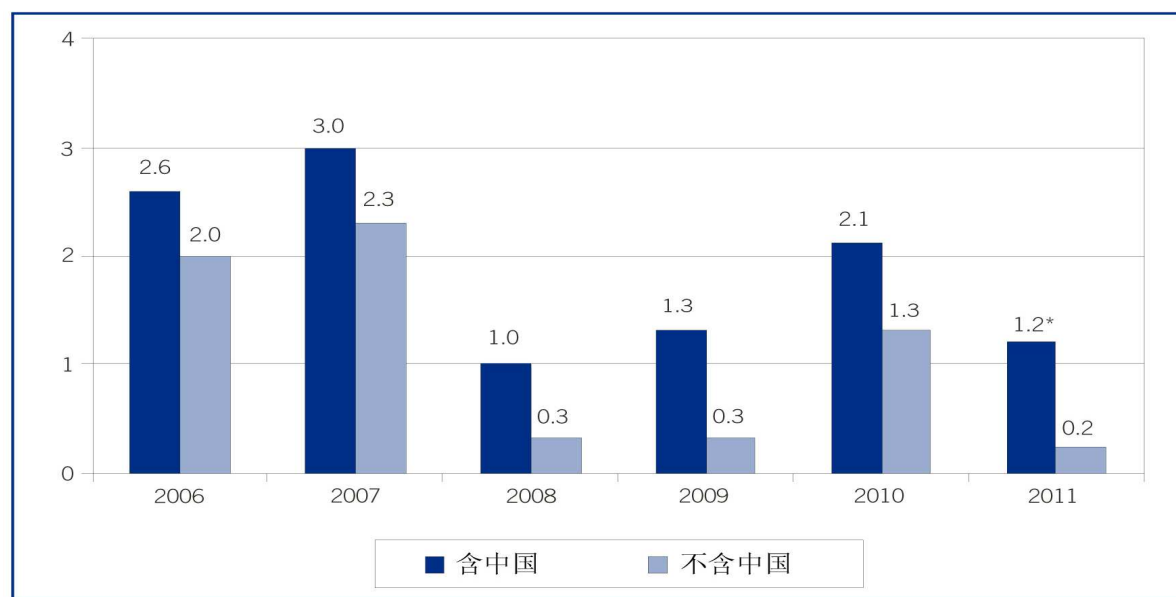
2 实际平均工资

2.1 复杂形势下的缓慢增长

全球实际平均工资增长的估算

仅凭就业和失业数据不能反映经济危机对劳动力市场的全部影响。本报告重点考察领薪雇员的工资状况²。工资的主要衡量单位是月实际平均工资（即剔除通货膨胀因素后的工资），而不是小时工资或日工资。月实际平均工资是国际劳工组织“体面劳动指标”之一³。月实际平均工资的变化趋势反映了平均劳动收入（税前和转移支付前）的变化，因而可以更清晰地看到工资购买力的变化。实际平均工资在不同区域和国家间的变化趋势并不相同，本报告后面部分将对此进行论述。尽管如此，从总体水平上仍然可以明显地看到经济危机所造成的影响。图 3 显示，在过去连续 4 年间（从 2008 年到 2011 年）月实际平均工资一直保持正增长，但是增长率已然降至低于危机前的水平。不管是否包括中国的官方工资统计数据，情况都是如此。但是，考虑到中国庞大的规模（就工资收入者的数量而言）及其突出的经济增长率，分析中如不包括中国，全球工资的增长幅度就会降低得更加明显⁴。

图 3. 2006 至 2011 年全球实际工资年平均增长率



* 这里公布的年增长率是“初步估算值”（数据覆盖面为 75%）

注：全球工资增长是指 124 个国家月实际平均工资年度增长的加权平均值

资料来源：国际劳工组织全球工资数据库

国家统计数据和工作时间的可比性

在解读全球估算值（及其后的区域估算值）时要谨慎。第一，各国国家统计机构统计工资的方式不同。最发达的国家通常定期开展企业调查和收入结构专项调查，而其他国家则通过劳动力调查收集工资数据，有时候对于哪些项目算工资的定义也有不同。另外，各国的调查范围也不同。国际劳工组织通常会努力寻找所有领薪雇员的数据，但实际上数据的覆盖范围有时会局限于某些特定地区（如大城市）或者某些特定雇员群体（如非农雇员）。同许多其他经济变量一样，这些差异导致难以在国家间横向进行比较。尽管如此，依然有可能就工资在一段时期内的变化情况得出有意义的结论。

第二，月平均工资的变化综合反映了企业和行业层面不可计数的各种变化，不仅包括每小时工资额的变化，而且包括实际工作小时数的变化。受全球经济危机的影响，许多国家因加班时间减少而导致工作时间缩短，与工作时间相关的不充分就业增加，兼职雇员相对于全职雇员的比例上升，所有这些都对月工资总额产生负面影响。一些国家还实施了“工作分享”计划：减少工作时间以避免裁员⁵。最典型的做法是，每个工作周由 5 个工作日改为 3 个或 4 个工作日。其他情况包括减少每天的工作小时数或者工厂临时关闭几周甚或几个月。减少工作小时数通常会相应导致月工资额降低，但是在“工作分享”计划下，政府往往会提供部分失业补偿金对工资予以补充⁶。

“复合效应”

使用总体工资数据而不是劳动者个体的面板数据也有可能造成所谓的“复合效应”：即平均工资水平变化是由于劳动力中工资收入者的组成结构发生变化而造成的，而不是由于始终保持就业的劳动者的收入水平发生变化而造成的。这可能会带来偏差。正如前一期《全球工资报告》（ILO，2010a）指出的那样，这一偏差可能是“反周期的”，即总体数据可能低估了在经济衰退期间一直保持就业的劳动者实际工资的下降情况，并且在随后的经济复苏期还会低估其工资的上升趋势。例如，持有临时就业合同的低技能工人可能是经济衰退期企业解雇的第一批人。那么由于剩下的劳动力队伍是由相对工资较高的工人组成，这反而会错误地造成平均工资上升的结果。而在经济复苏期，如果低工资工人是企业雇佣的第一批人，那么则会观察到相反的效应（见 ILO，2012b）。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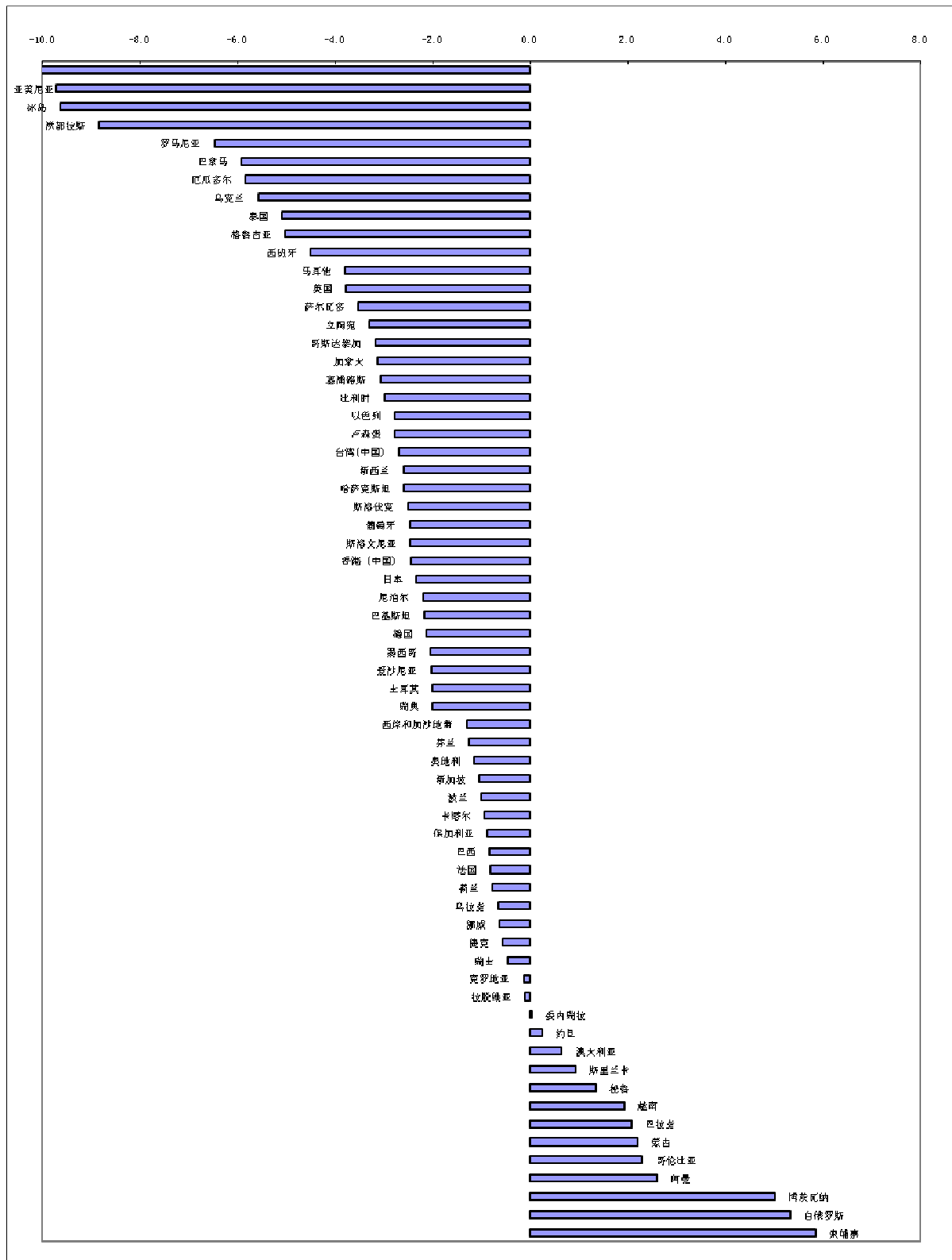
2.2 性别工资差距

差距在缩小但女性的处境未见好转

图 4 显示了 1999 年到 2007 年期间和 2008 年到 2011 年期间平均性别工资差距（GPG）的变化情况，展现了经济危机时期所有有相关数据的国家工资差距的演变情况。这些数据表明，大多数国家在经济危机时期性别工资差距有所下降。但是，“复合效应”使得对这种降低的理解和分析变得复杂，因为性别工资差距变小并不一定意味着女性劳动者的工资状况有所改善。爱沙尼亚的情况就表明性别工资差距的减小并非是由于女性劳动者状况改善，而是由于男性劳动力市场状况相对于女性更加恶化。图 5 展示了爱沙尼亚性别工资差距的正周期性变化趋势，经济增长时差距拉大，经济衰退时差距变小。2009 年最近一次经济危机过程中差距明显降低就是因为男性更加集中在受危机影响更严重的行业，工作时间减少。其结果是，2009 年性别工资差距的减小是因为男性工作小时数下降造成男性工资减少（参见 Anspal, Kraut 和 Rõõm, 2010 年报告）。

图 4 主要关注的是这两个时期性别工资差距的变化方向，而不是国家之间的差异。这是因为各国在数据来源和雇员覆盖范围方面存在的差异会影响对性别工资差距的估算。以挪威为例，图 6 显示了挪威在全体雇员、全职雇员或兼职雇员等不同组别的情况下，性别工资差距方面的不同变化。兼职雇员的性别工资差距低，表明从事兼职工作的男性和女性得到的工资相近。与之相对应的是，全职雇员的性别工资差距较高，因为男性全职雇员的工资明显高于女性全职雇员。最后，全体雇员组的性别工资差距甚至比全职雇员组的差距更高，这是因为女性雇员在兼职雇员中占了绝大多数，而 2011 年兼职雇员的小时工资仅相当于全职雇员小时工资的 80%。性别工资差距随时间的变化没有随不同雇员组别的变化那么敏感。尽管如此，分析性别工资差距随时间变化的情况应与其他反映女性工作条件和就业情况变化的劳动力市场指标一并考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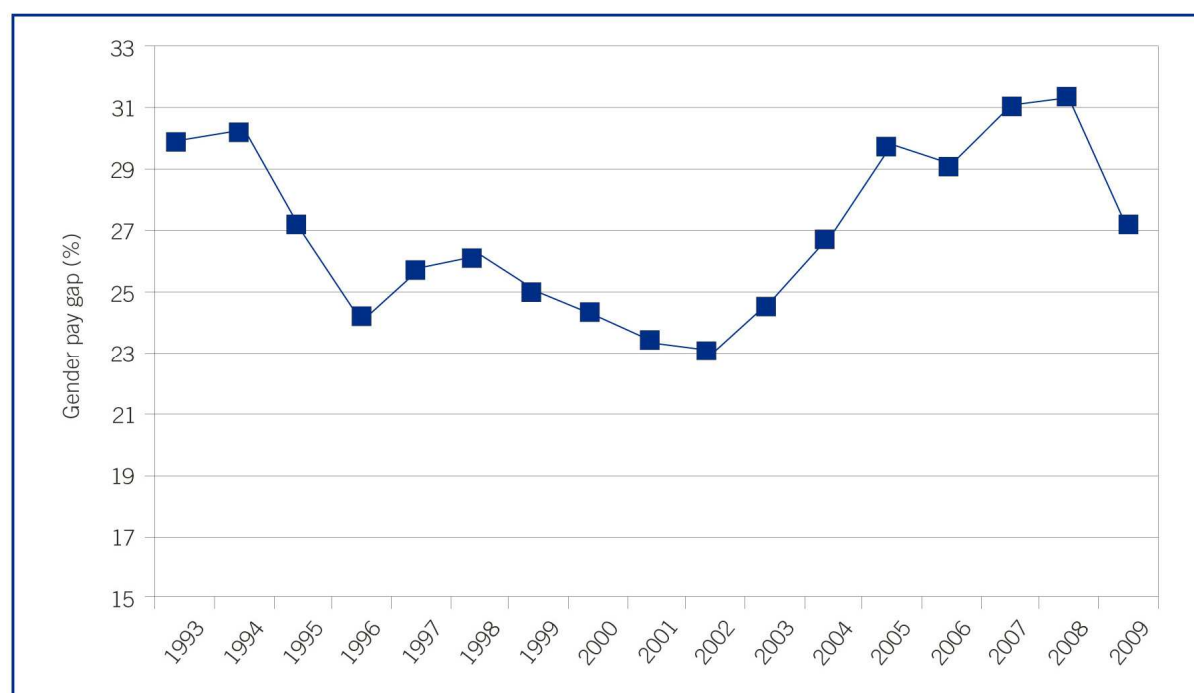
图 4. 1999 至 2007 年以及 2008 至 2011 年性别工资差距的变化情况



注：性别工资差距（GPG）计算公式为 $GPG = ((E_m - E_w) / E_m) * 100$ ，其中 E_m 代表男性平均工资， E_w 代表女性平均工资（见国际劳工组织，2012b）。性别工资差距的变化等于 2008-2011 年平均性别工资差距减去 1997-2007 年平均性别工资差距。并不是所有国家在所有年份都有可用数据；这两个时期的平均值是用每个国家的可用数据计算出来的。

资料来源：国际劳工组织全球工资数据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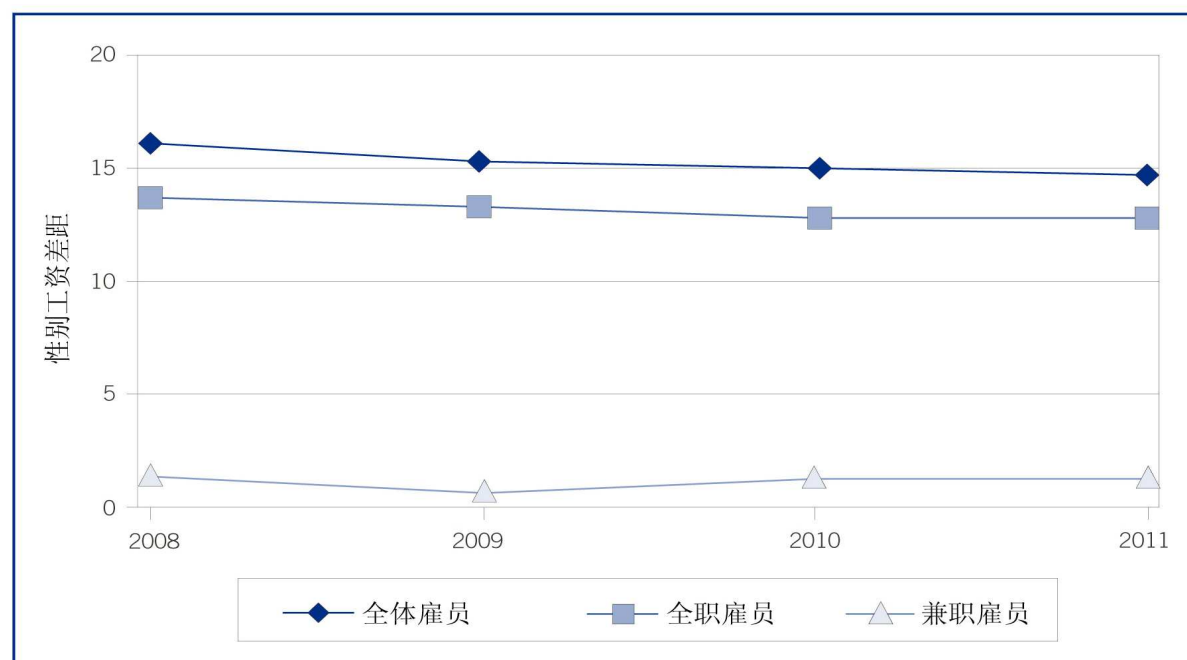
图 5. 1993 至 2009 年爱沙尼亚性别工资差距



注：性别工资差距（GPG）的计算方法为 $GPG = ((E_m - E_w) / E_m) * 100$ ，其中 E_m 代表男性平均工资， E_w 代表女性平均工资。（参见国际劳工组织，2012b）。

资料来源：图片来自 Anspal, Kraut 和 Rõõm, 2010。

图 6. 2008 至 2011 年挪威不同就业状况的性别工资差距



注：性别工资差距（GPG）的计算方法为 $GPG = ((E_m - E_w) / E_m) * 100$ ，其中 E_m 代表男性平均工资， E_w 代表女性平均工资。（参见国际劳工组织，2012b）。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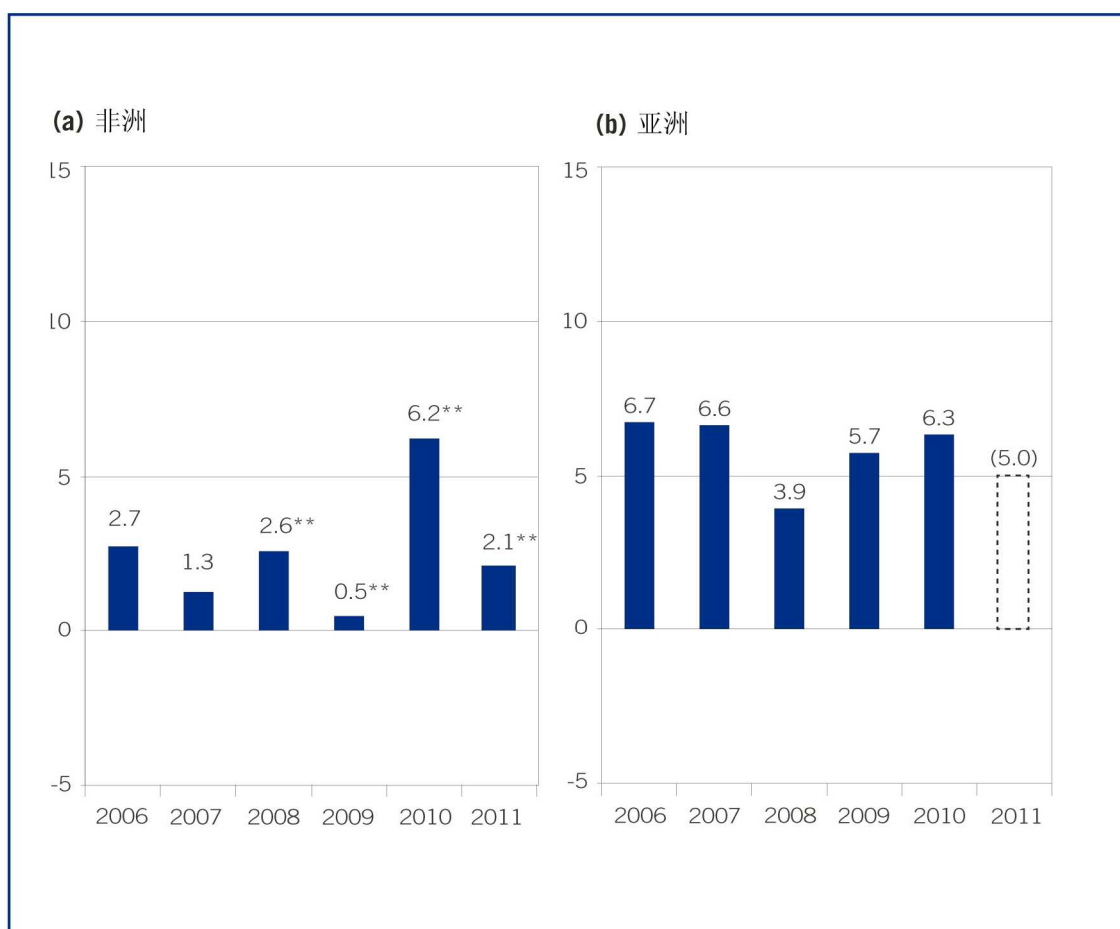
资料来源：国际劳工组织根据挪威统计部门数据计算得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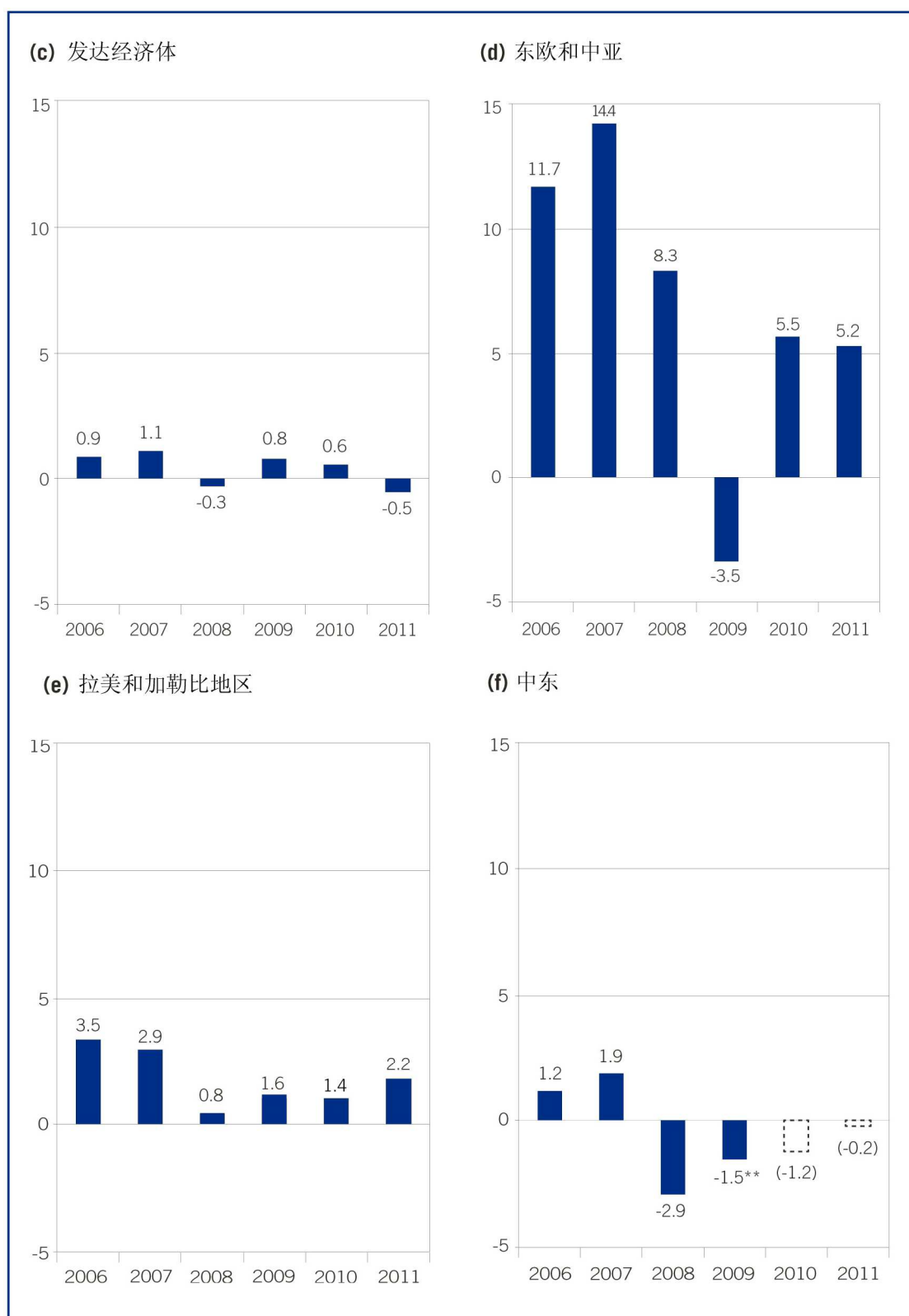
3 区域估算

3.1 整体增长掩盖复杂局面

正如前文指出的那样，各地区和各国的实际平均工资增长率存在很大差异，在经济增长表现比较强劲的地区，工资增长速度一般也更快。图 7 显示了 2006 年以来各区域包括经济危机时期在内的月实际平均工资增长估算情况。与我们对全球的估算一样，区域估算也是加权估算（见技术附录一），因此受到较大经济体工资发展趋势的影响非常明显，如亚洲的中国、发达经济体中的美国、东欧和中亚区域的俄罗斯和乌克兰、拉美和加勒比区域的巴西和墨西哥以及非洲大陆的南非。我们看到，在发达经济体，实际工资增长在正负 1% 之间窄幅波动。在其他地区，波动通常更为剧烈。

图 7. 2006 至 2011 年各区域年平均实际工资增长率





* 区域增长率为“初步估算值”（覆盖率为 75 %）

** 区域增长率为“暂时估算值”（覆盖率为 40 - 74%）

() 区域增长率公布但可能会发生变化（覆盖率不足 40%）

注：关于覆盖率和方法，参见技术附录一。

资料来源：ILO 全球数据库

表 1 显示的是长期趋势，即 2000 年以来实际平均工资累计增长情况。我们看到，2000 年至 2011 年期间全球月实际平均工资增长将近四分之一，但是地区间分化严重。亚洲实际平均工资增长近一倍，拉美和加勒比地区以及非洲增幅比世界平均增幅略低，发达经济体增长约 5%。在东欧和中亚，平均工资增长了近两倍：这部分是因为上世纪 90 年代向市场经济过渡的早期阶段工资损失的恢复性增长。在中东地区，初步估算表明工资实际有可能是下降的。

表 1. 2000 年以来各地区实际工资的累计增长（以 2000 年为 100）

区域分组	2000	2006	2007	2008	2009	2010	2011
非洲	100.0	103.9	105.3	108.1**	108.6**	115.4**	117.8**
亚洲	100.0	149.0	158.8	165.1	174.6	185.6	(194.9)
东欧和中亚	100.0	204.4	233.9	253.4	244.4	257.9	271.3
发达经济体	100.0	103.3	104.5	104.1	104.9	105.5	105.0
拉美和加勒比地区	100.0	105.4	108.5	109.3	111.0	112.6	115.1
中东	100.0	98.3	100.1	97.2	95.8**	(94.6)	(94.4)
世界	100.0	112.8	116.1	117.3	118.8	121.3	122.7*

* 地区增长率为“初步估算值”（覆盖率为 c. 75 %）

** 地区增长率为“暂时估算值”（覆盖率为 c. 40 - c. 74%）

() 地区增长率公布但可能会发生变化（覆盖率不足 40%）

注：关于覆盖率和方法，参见技术附录一。

资料来源：ILO 全球数据库

尽管在过去十年中新兴地区实际平均工资增长较快，但是各国和各区域间的工资水平绝对差距依然相当大。图 8 显示了美国劳工统计局对各国 2010 年制造业每小时直接工资水平的比较。各国小时工资不同，丹麦接近 35 美元，美国略高于 23 美元，希腊 13 美元，巴西在 5 美元和 6 美元之间，菲律宾低于 1.50 美元。采用不同的不可比的方法计算，2008 年中国制造业每小时劳动总薪酬为 1.36 美元，而 2007 年印度制造业每小时劳动总薪酬为 1.17 美元（美国劳工部、劳工统计局，2011 年）。这些差距是用当前美元价格计算的，因此取决于汇率的波动，但是这些数据仍然能够反映出世界各国在工资和劳动生产率方面始终存在较大差距。

图 8. 2010 年制造业单位小时直接工资报酬的国际比较（美元）



注：直接工资是指根据实际工作时间支付的劳动薪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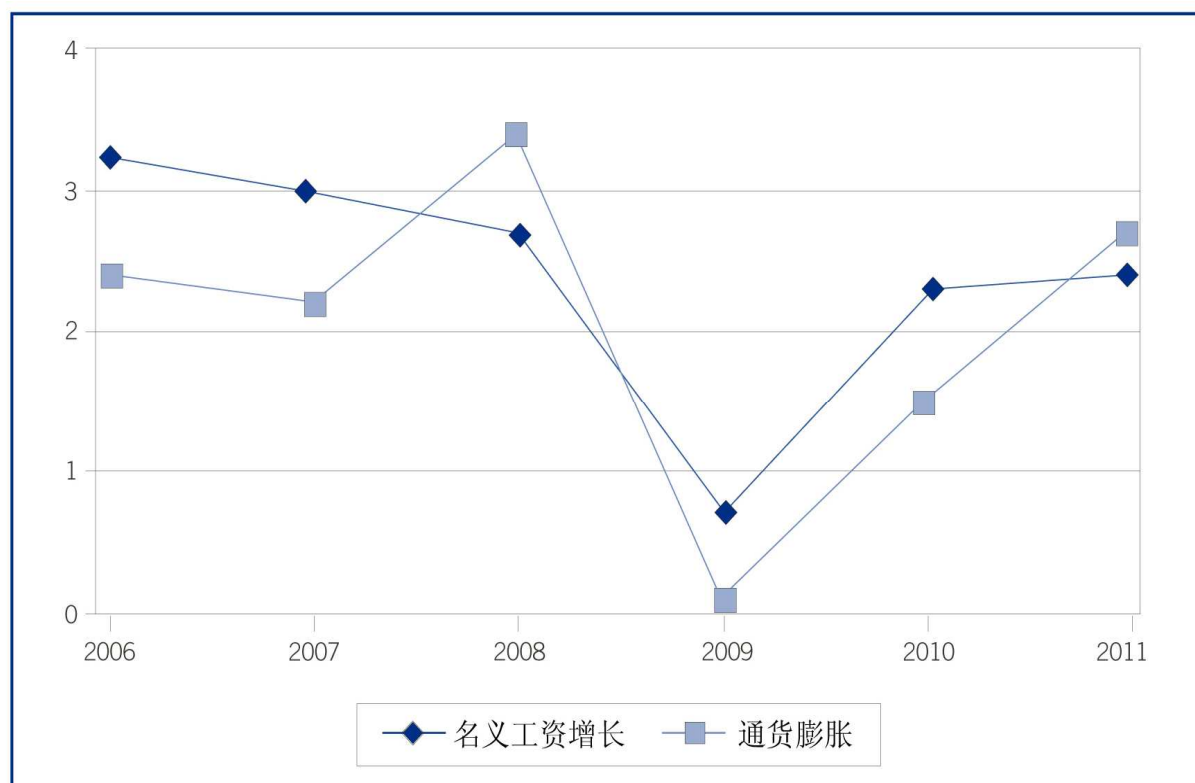
资料来源：美国劳工部，劳工统计局(BLS)，2011年。

3.2 发达经济体

工资与通货膨胀

在发达经济体，平均工资在 2008 年和 2011 年分别经历了两次下降（见图 7）⁷。图 9 重点反映了超发达经济体名义平均工资和价格通胀的发展趋势，该图表明 2008 年异乎寻常的高通胀率超过了名义工资增长，因此导致实际工资下降⁸。在发生全球经济衰退的 2009 年，名义工资和消费价格或多或少地停滞不动。自此，名义工资增长在 2011 年停止复苏，但是消费价格重回危机前的水平，说明这一年实际工资下降。

图 9. 2006 至 2011 年超发达经济体名义工资增长和通货膨胀变化趋势（%）



注：该表专指被 IMF 世界经济展望报告归为超发达经济体的国家，因此不包括本报告中归为发达经济体的某些国家（这些国家的名单详见技术附录一）。名义工资增长和通货膨胀数据严格意义上不能进行横向国家比较，因为在进行区域估算时各国被加权的方式存在差异。尽管如此，该图仍能表明文中的观点。

资料来源：国际劳工组织，全球工资数据库；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经济展望数据库

工资与劳动生产率

图 10 显示了经济危机前几年（1999 - 2007）和危机开始后几年（2008 - 11）发达国家在产出和就业人数方面的年均增长率。图 11 显示了实际平均工资的年均增长率和按就业人口人均实际产出计算的劳动生产率的年均增长率⁹。这两张图结合起来看，能够全面反映经济增长如何影响劳动力队伍以及“经济大衰退”如何影响劳动力市场。分析经济危机前的情况，我们可以看到，在几乎所有的国家，就业率的增加都小于或等于 GDP 增量（只有意大利和西班牙位于图 10(a) 中 45 度斜分线的右侧）。因为 GDP 增长比就业增长快，所以劳动生产率从其定义上（就业人口人均 GDP）就可以知道是会上升。图 11(a) 中除意大利和西班牙以外的所有国家都位于纵轴的右侧，就证明了这个事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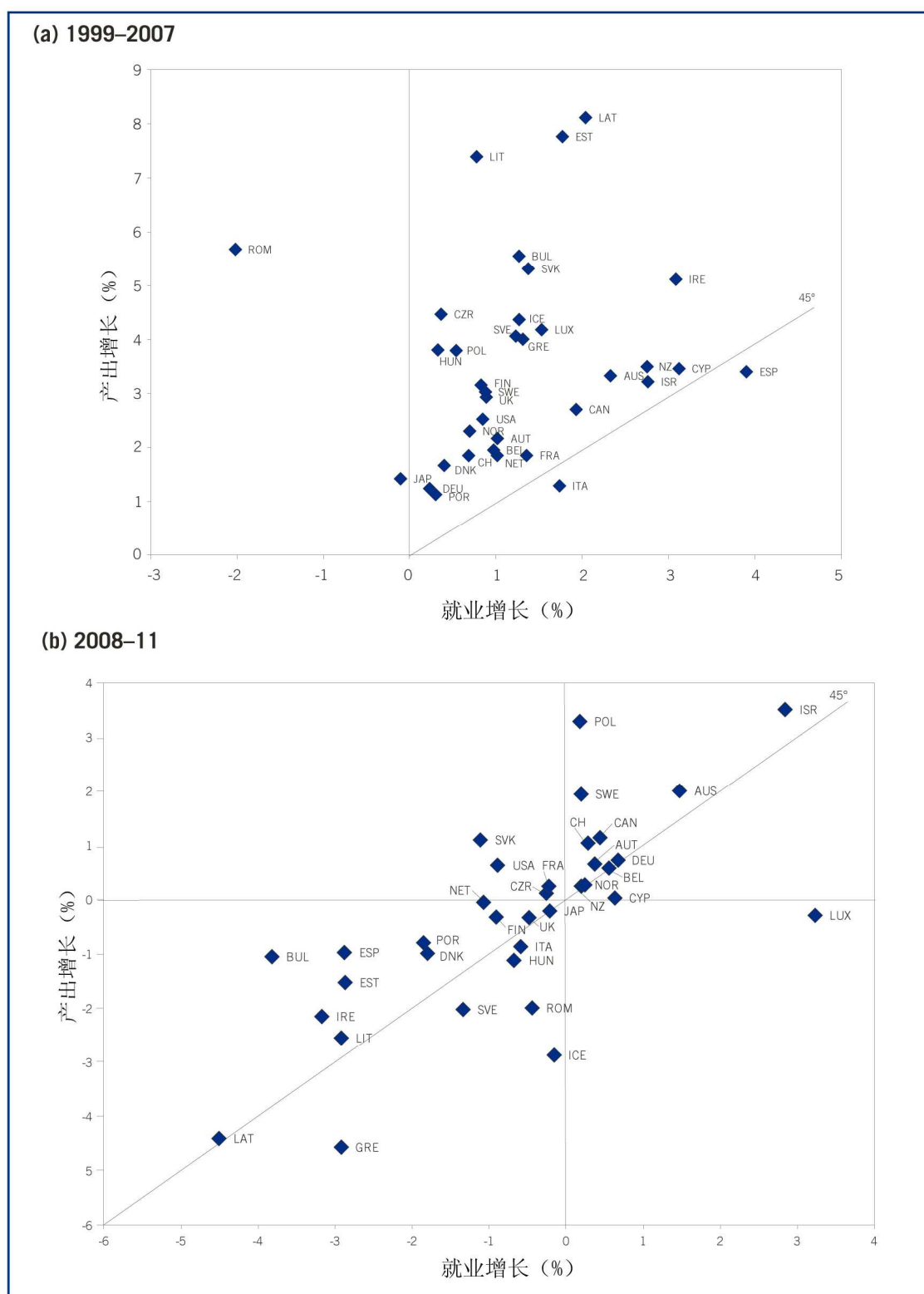
劳动生产率的增长转化为更高的实际工资了吗？图 11 显示，大多数国家确实经历了一段实际工资和生产率同时增长的时期（图 11(a) 中许多国家位于右上角就说明了这一点）。在一些国家，如丹麦、法国、芬兰、英国、罗马尼亚和捷克，工资增长与生产率增长关系紧密（见图 11）。但是也有一些国家的这两个变量的同步变化并不明显。图 11(a) 显示，在希腊和冰岛，平均工资增长领先于劳动生产率增长，而在西班牙和意大利，劳动生产率下降但工资只是微降（意大利）甚至不降（西班牙）。在该地区的一些最大经济体情况恰恰相反，工资增长滞后于生产率增长：美国、日本，特别是德国就是如此，在 1999 年至 2007 年期间尽管平均劳动生产率出现正增长，但平均工资却下降了（德国的详细情况见图 35）。

经济增长与就业增长

自“经济大衰退”以来的这些年中发生了什么呢？从图 10(b) 可以明显看出，所有在 2008 至 2011 年期间平均 GDP 出现萎缩的国家，其就业率也出现下降或者至多是停滞不动（卢森堡除外，该国就业率上升了）。相反，在大多数经济危机期间 GDP 正向增长的国家，其就业也成功扩大。但是，有趣的是，在经济危机期间，有些国家在就业方面遭受的冲击比经济产出方面受到的影响还要严重，其中包括西班牙、爱尔兰、葡萄牙和保加利亚。在美国，尽管经济发生正向缓慢增长，其就业率还是下降了。

结果如图 11(b) 和 (d) 显示，尽管发生了经济危机，大多数国家在 2008 至 2011 年期间的劳动生产率还是呈现正向增长（在这两个图中，大多数国家处在纵轴的右侧）。其中许多国家的实际工资也缓和增长，如德国改变了行动路线，在经过多年工资调整以后，工资增长超过了劳动生产率。英国是例外的国家之一，虽然劳动生产率上升了，实际平均工资却在相对高通胀的影响下大幅下降。在一些国家，工资比劳动生产率下降得更为严重：包括希腊和新加入欧盟的一些国家。在希腊，经济危机发生之前工资增长领先于生产率增长，但经济危机期间平均工资受紧缩计划影响而被迫下降，仅在 2010 至 2011 年间就累计下降了近 15%。总体而言，图 10 和图 11 的数字比较不足以证明经济危机期间工资调整与就业增长有简单直接的此消彼长关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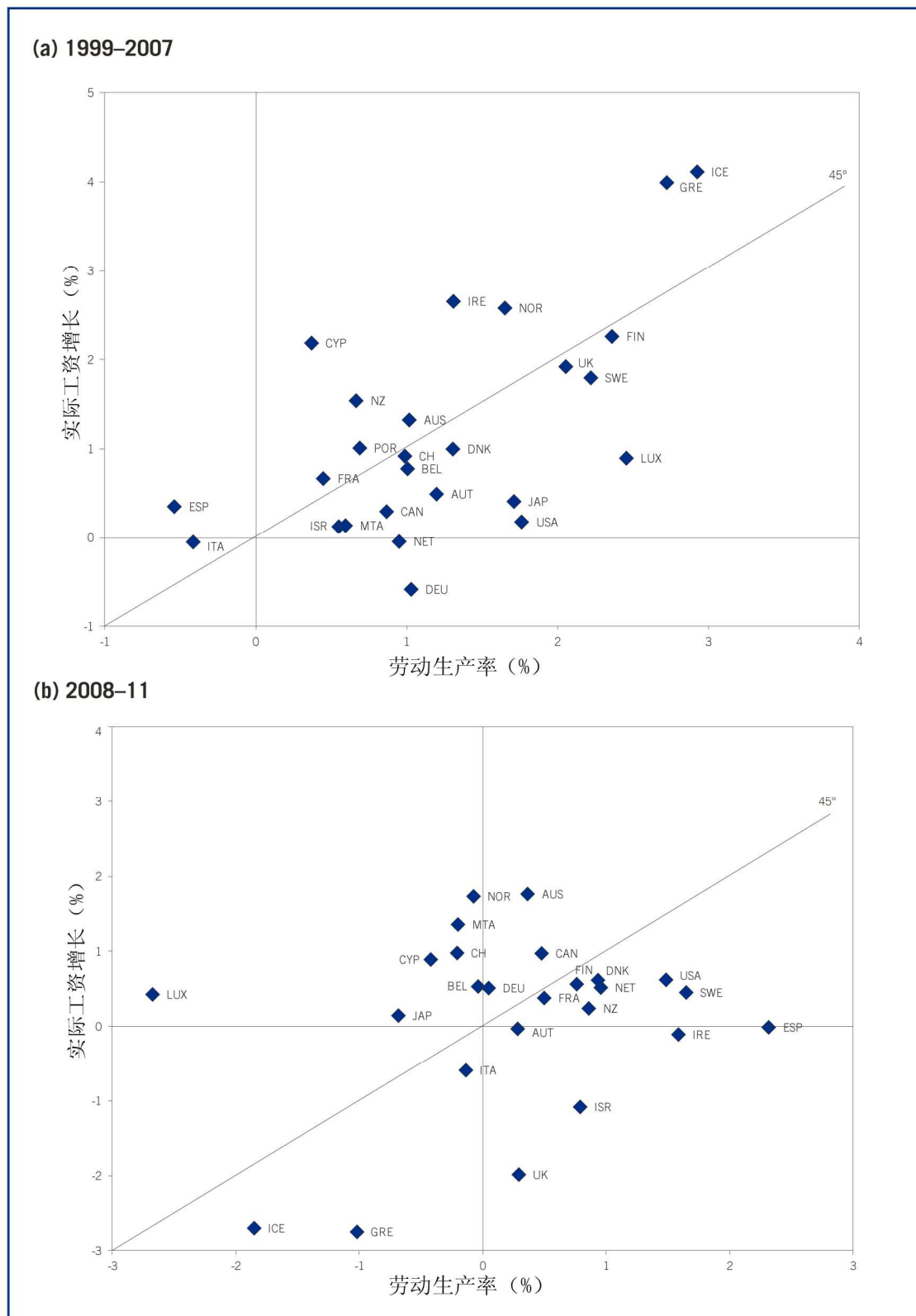
图 10. 1999 至 2007 年间和 2008 至 2011 年间发达经济体产出与就业增长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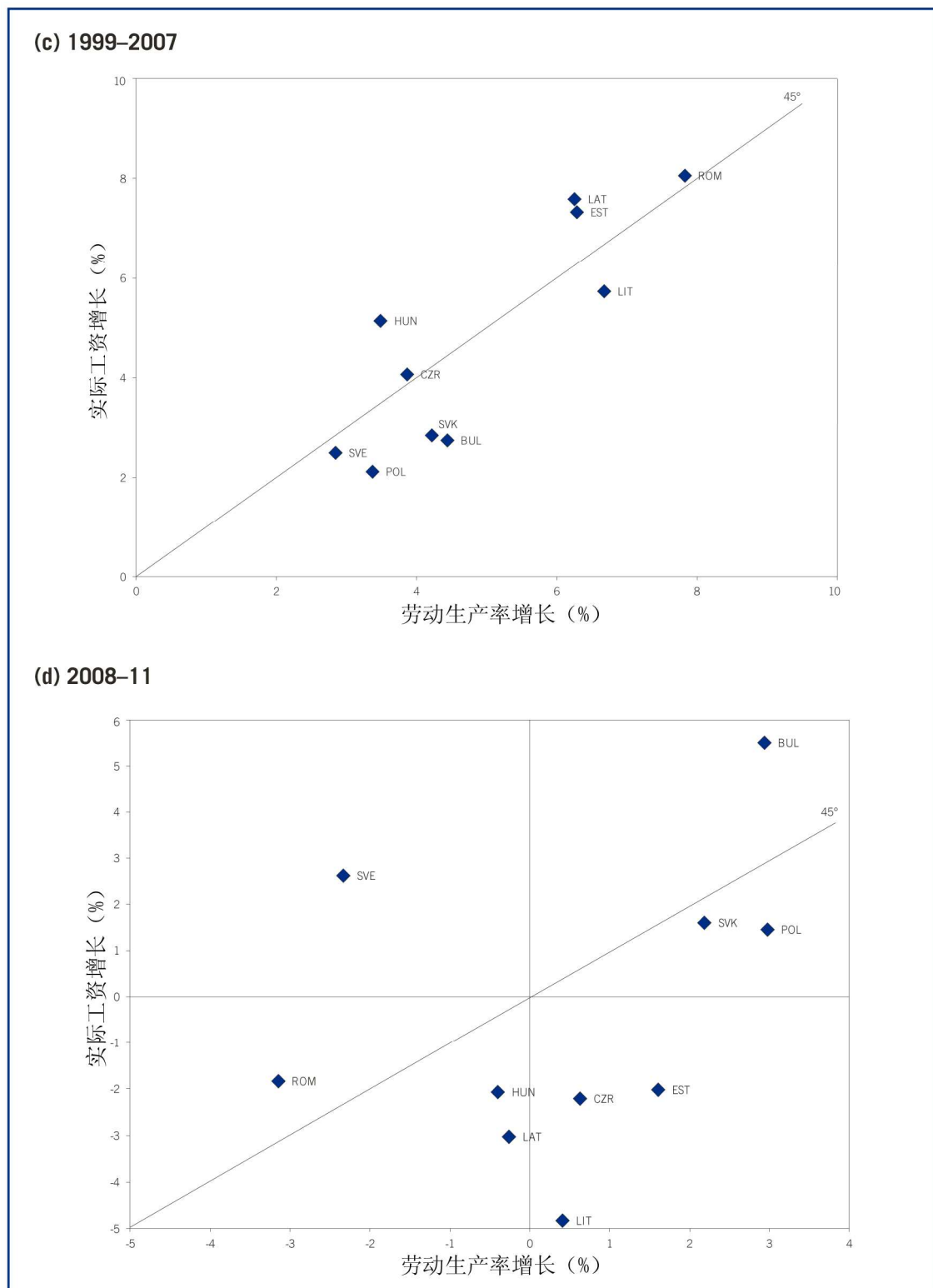


注：国家名称缩写见技术附录一。

资料来源：国际劳工组织，趋势计量经济模型，2012 年 3 月，IMF，世界经济展望

图 11. 1999 至 2007 年间和 2008 至 2011 年间发达经济体实际工资与劳动生产率增长 (%)





注：上面 a、b 和下面 c、d 两组图都是指归类于发达经济体的国家。把他们分开只是为了便于理解。如果没有 1999 年、2007 年、2008 年或 2011 年的数据可用，那么就会用最近的下一个时间段数据来估算发展趋势。国家名称缩写参见技术附录一。

资料来源：国际劳工组织，全球工资数据库；国际劳工组织，趋势计量经济模型，2012 年 3 月

3.3 东欧与中亚区域

从经济复苏到经济危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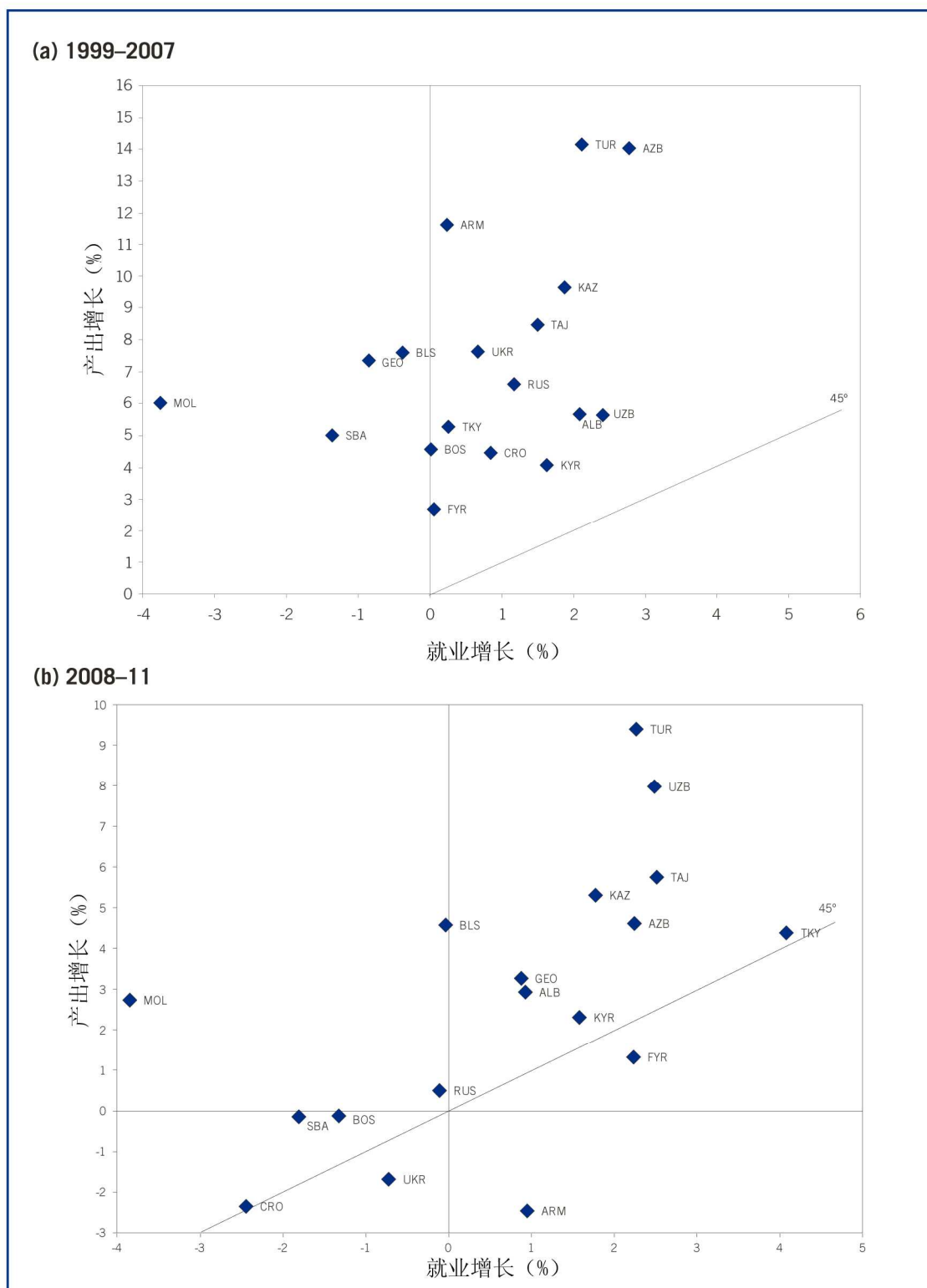
在（非欧盟成员的）东欧国家和中亚国家，实际平均工资的区域增长率大幅波动，从经济危机前的两位数增长变为 2009 年的硬着陆。虽然工资在 2010 至 2011 年间再度恢复正增长，但数值并没有达到经济危机前水平。图 12 和图 13 表明，在经济危机前经济产出比就业增长快（图 12），使得所有国家的劳动生产率都出现上升（图 13）。令人惊讶的是，在大多数国家，经济危机前生产率上升伴随的是实际工资的更大增幅，年均增长超过 10%。在很多情况下，这是向市场经济转型所带来的恢复性增长。图 14 表明，俄罗斯的实际工资起初跌至不足 1990 年数额的一半，然后在 2000 年以后数年间才逐步恢复，直至增长了两倍以上。乌克兰的情况也类似，实际工资在 1992 年至 1999 年间剧烈下降，然后直到 2009 年才实际增长了三倍多¹⁰。

工资停滞

在 2008 至 2011 年期间，该区域劳动生产率增长更加缓慢但是总体上保持正增长，实际工资增长与劳动生产率增长更加趋于一致。但也有例外：在塞尔维亚和阿尔巴尼亚，尽管劳动生产率正向增长，实际工资却下降了，这是公共部门名义工资冻结的一种反映。在塞尔维亚，根据 2009 年 4 月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签署的一份协议，塞尔维亚政府承诺在 2009 至 2010 年期间将公共部门工资和养老金名义冻结，因此公共管理部门的实际工资下降（Arandarenko 和 Avlijas, 2011）。与该措施并行的一项举措是禁止公共部门雇佣新员工。与之类似，按照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建议，阿尔巴尼亚也对公共部门工资增长施加了预算限制。

但是，图 7 显示，对该区域影响最大的是俄罗斯和乌克兰这两个最大经济体的发展趋势。2008 年两国的工资增长都开始放慢，2009 年出现负增长，在随后几年中出现反弹，达到危机前增长率的一半。经济危机对乌克兰劳动力市场影响的一项研究显示，月工资下降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 2009 年非自愿不充分就业增加，当时每 5 个乌克兰就业人口中就有 1 个人的工作小时数少于其希望的工作小时数。许多雇员不得不停薪休假，特别是在工业部门（ILO, 2011d）¹¹，其他部门则冻结了基本工资并削减了奖金（Kulikov 和 Blyzniuk, 201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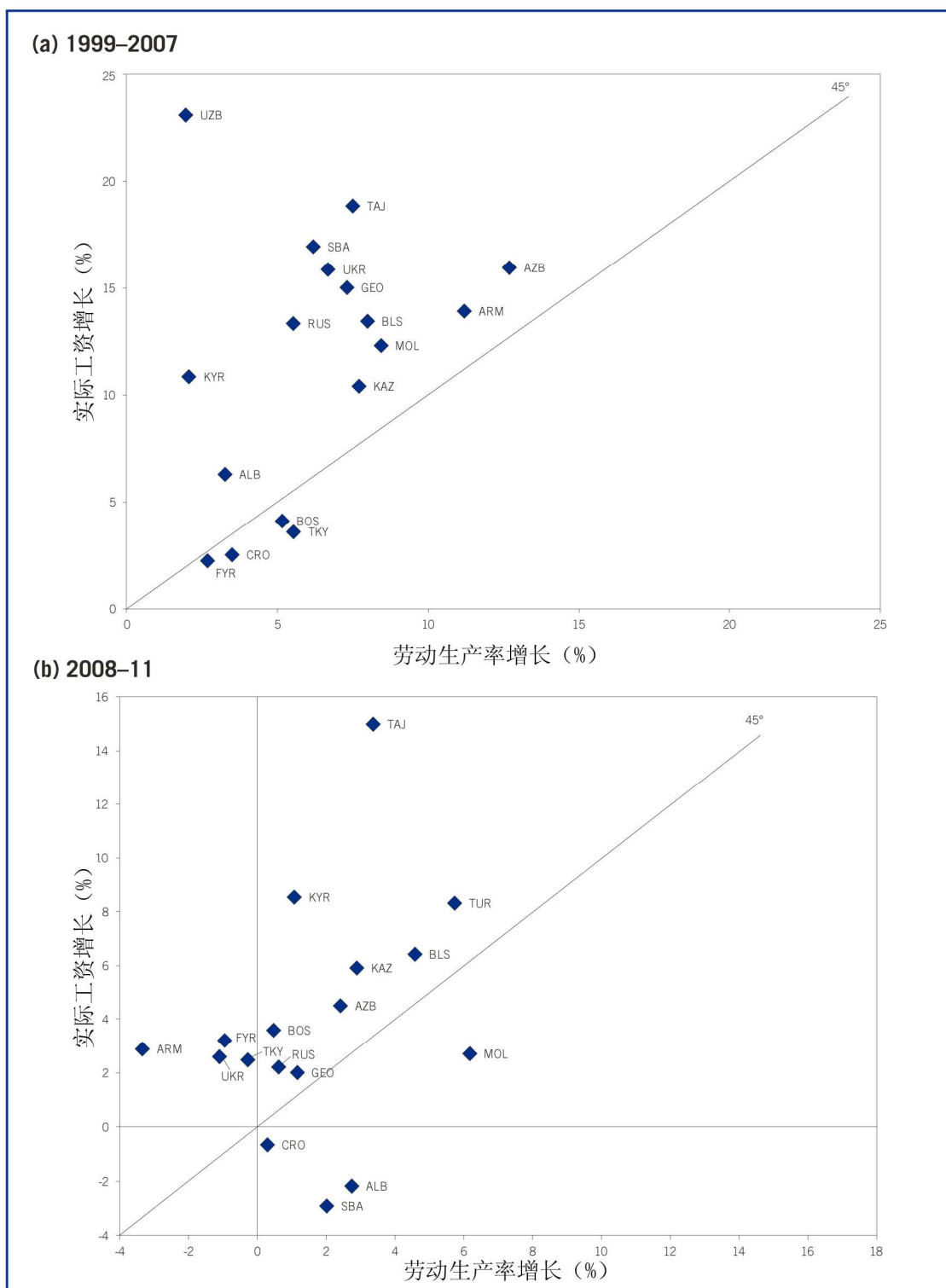
图 12. 1999 至 2007 年间和 2008 至 2011 年间东欧和中亚产出与就业增长 (%)



注：国家缩写参见技术附录一。

资料来源：国际劳工组织，趋势计量经济模型，2012 年 3 月；IMF，世界经济展望

图 13. 1999 至 2007 年间和 2008 至 2011 年间东欧和中亚工资和劳动生产率增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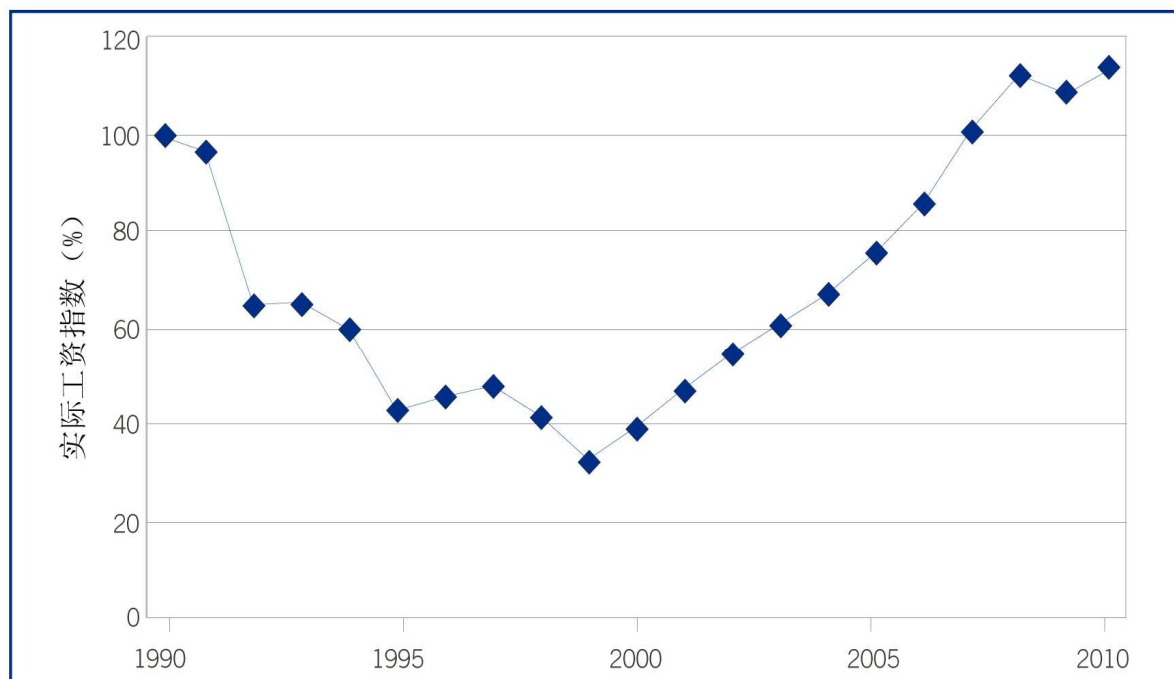


(%)

注：如果没有 1999 年、2007 年、2008 年或 2011 年的数据可用，那么就会用最近的下一个时间段数据来估算发展趋势。国家名称缩写参见技术附录一。

资料来源：国际劳工组织，全球工资数据库；国际劳工组织，趋势计量经济模型，2012 年 3 月

图 14. 1990 年以来俄罗斯联邦实际工资指数（以 1990 年为 10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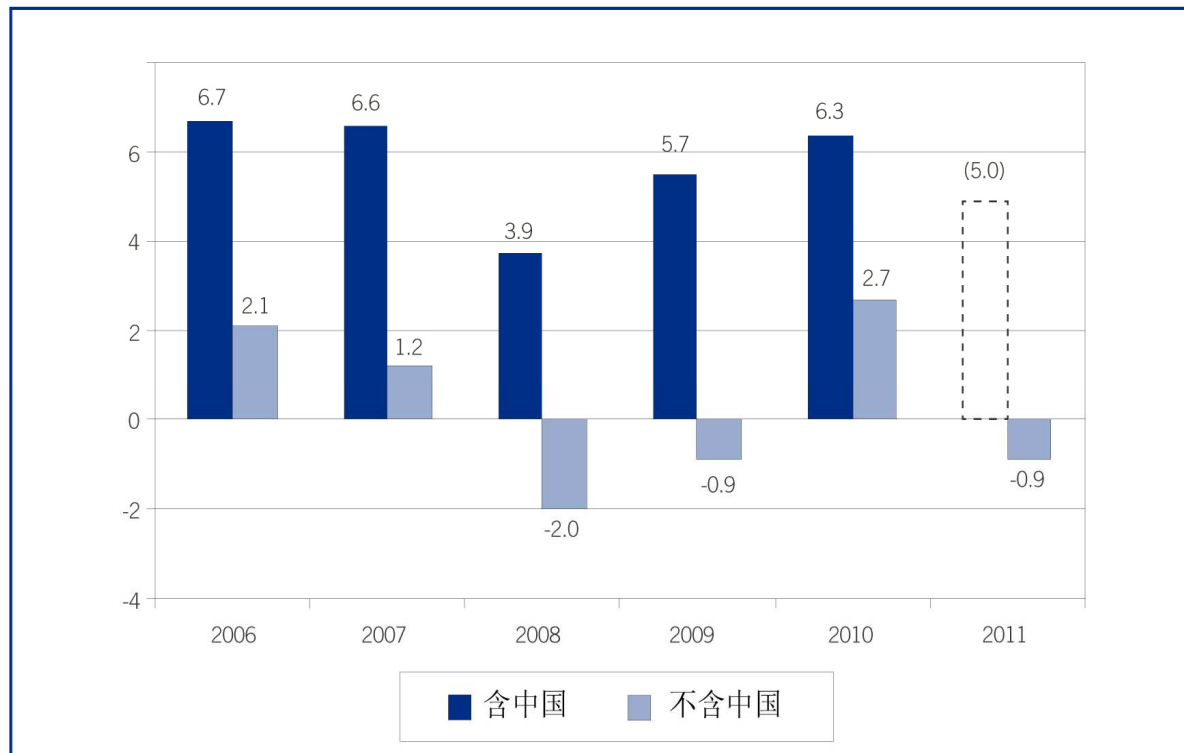
资料来源：国际劳工组织根据俄罗斯联邦统计局 2011 年数据计算。

3.4 亚洲和太平洋区域

中国主导的高增长

亚洲特别是东亚的变化趋势与其他区域形成鲜明对比。亚洲地区工资继续保持高增长（见图 7），反映了该地区在经济危机期间经济表现依然强韧。这尤其反映了中国的影响。根据《中国统计年鉴》的数据，其“城镇单位”的工资在整个十年间以每年两位数的平均增长速度增长。根据官方每年 12% 的年增长率，中国实际平均工资从 2000 年到 2010 年增长了两倍多，这也带来了中国“廉价劳动力”时代似乎即将结束的议题。在图 15 中，我们可以看到，中国的 GDP 和工资增长在过去几年中格外地高，如果没有中国，这张图看起来大不相同，这说明韩国或印度等国家在过去四年里的工资增长并不乐观。

图 15. 2006 至 2011 年亚洲实际平均工资年增长率



() 地区增长率公布但可能会发生变化（覆盖率不足 40%）

注：关于覆盖率和估算方法，参见技术附录一。

资料来源：国际劳工组织全球工资数据库

图 16 和图 17 显示，该地区多数国家在 1999 至 2007 年期间的经济年增长率平均达到了 5% 以上，其中 2002 至 2007 年期间就业年增长率东亚为 1.2%，东南亚和太平洋为 1.8%，南亚为 2.2%（ILO，2012a）。但必须强调的是，在大多数无力承受失业后果的发展中国家，就业的整体增长情况与劳动力规模的发展变化密切相关。因此，图 17 在提供领薪雇员数量增长情况同时也显示了 GDP 增长情况，图中不包括个体劳动者或家庭帮工的成员。尽管如此，在大多数国家，经济产出增长还是超过了领薪雇员数量的增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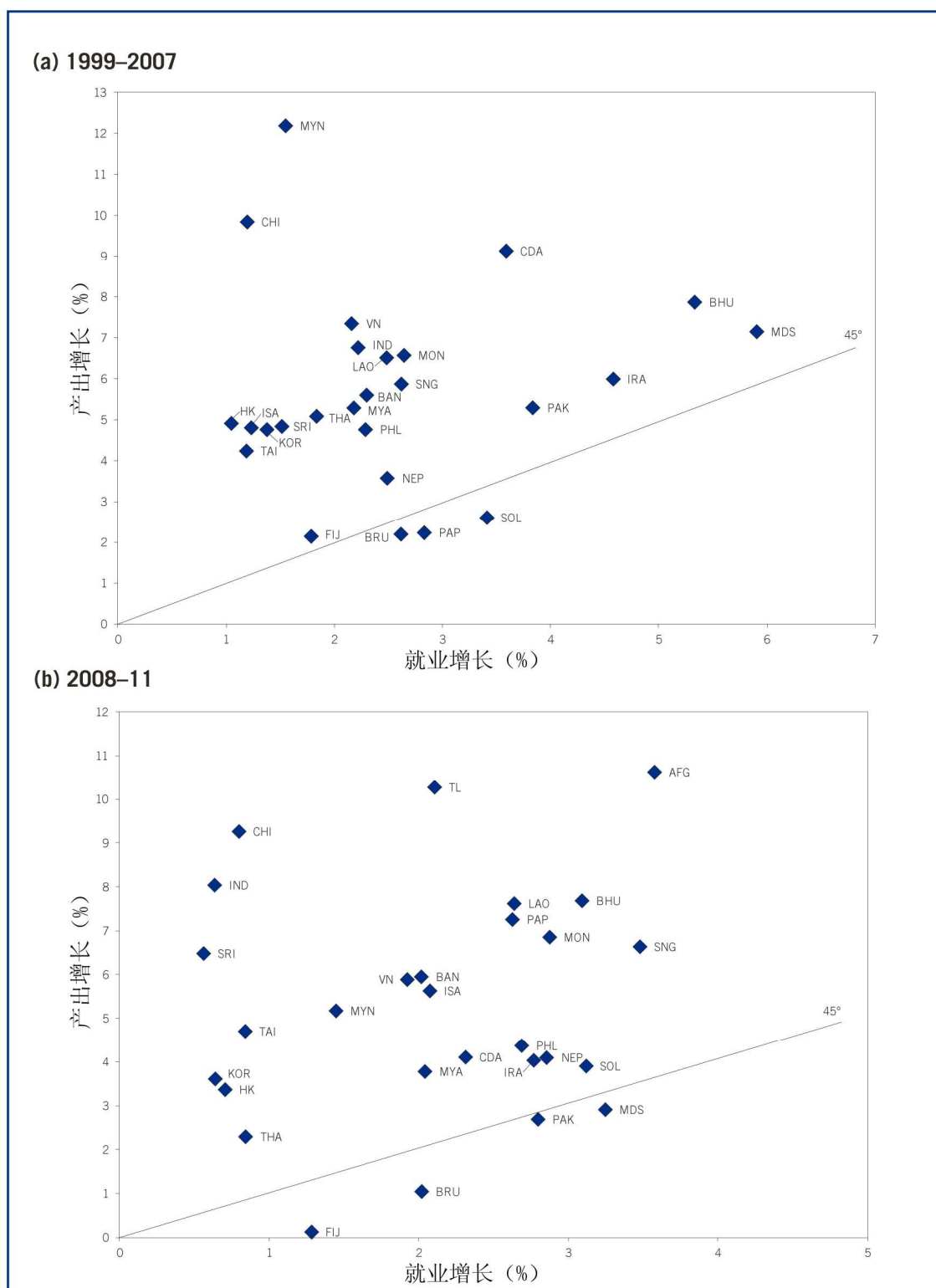
关于劳动生产率的附加说明：有薪就业的作用

这些增长率对工资造成了什么影响呢？图 18 中将平均工资增长与劳动生产率的数据进行对比，这在发展中国家必须小心解读。因为平均工资是指领薪雇员（在一些亚洲国家这一群体不足劳动者总数的 50%）的收入，而劳动生产率衡量的是所有有就业人员（包括雇员和个体劳动者）的 GDP。使用平均工资与领薪雇员的生产率进行比较是一种更好的方法，但是后者普遍缺乏相关数据。原则上，人们一般会认为，所有劳动者共同的产出增长会导致低估领薪雇员劳动生产率的生长，因为大部分领薪雇员是在更具生产力和活力的工业领域工作。此外，在比较中国的工资增长与劳动生产率增长时，我们必须记住前者只包括国有企业、集体所有制单位和其他与国家有关系的公司（见尾注 4）。本报告第二部分提到中国劳动份额下降，表明中国的工资增长实际上低于生产率增长。

购买力面临威胁

尽管如此，图 18 清楚表明，无论是在危机发生之前还是危机期间，该地区劳动生产率和实际工资总体上都是正向增长，并且涨幅明显。但是还是有一些国家，根据官方统计数据计算的 1999 至 2007 年期间的工资增长令人失望。在东亚国家，工资增长相对较低，例如泰国。在南亚同样如此，在危机发生前十年，实际平均工资停滞不前。在印度，工资发展趋势并不明朗。关于印度工资增长的权威数据来源是中央统计局的行业年度调查，实际工资指数则由劳工局发布。这两个数据来源都表明，实际工资在近年来的多数年份里是下降的，造成工资收入者的购买力萎缩。这就解释了印度劳动者对物价，特别是对食品价格，快速上涨的担忧。但是，考虑到该国过去十年间经济的快速增长，这种趋势有些令人意外。它也与国家抽样调查局（NSSO）开展的就业失业状况调查的结论相矛盾。该调查与消费者支出调查一样，每五年进行一次。在调查中，对领薪雇员和临时工的调查表明，在 2004/2005 年至 2009/2010 年这五年间，其收入增长了 150%，比消费者价格指数 52% 的增长率要高出很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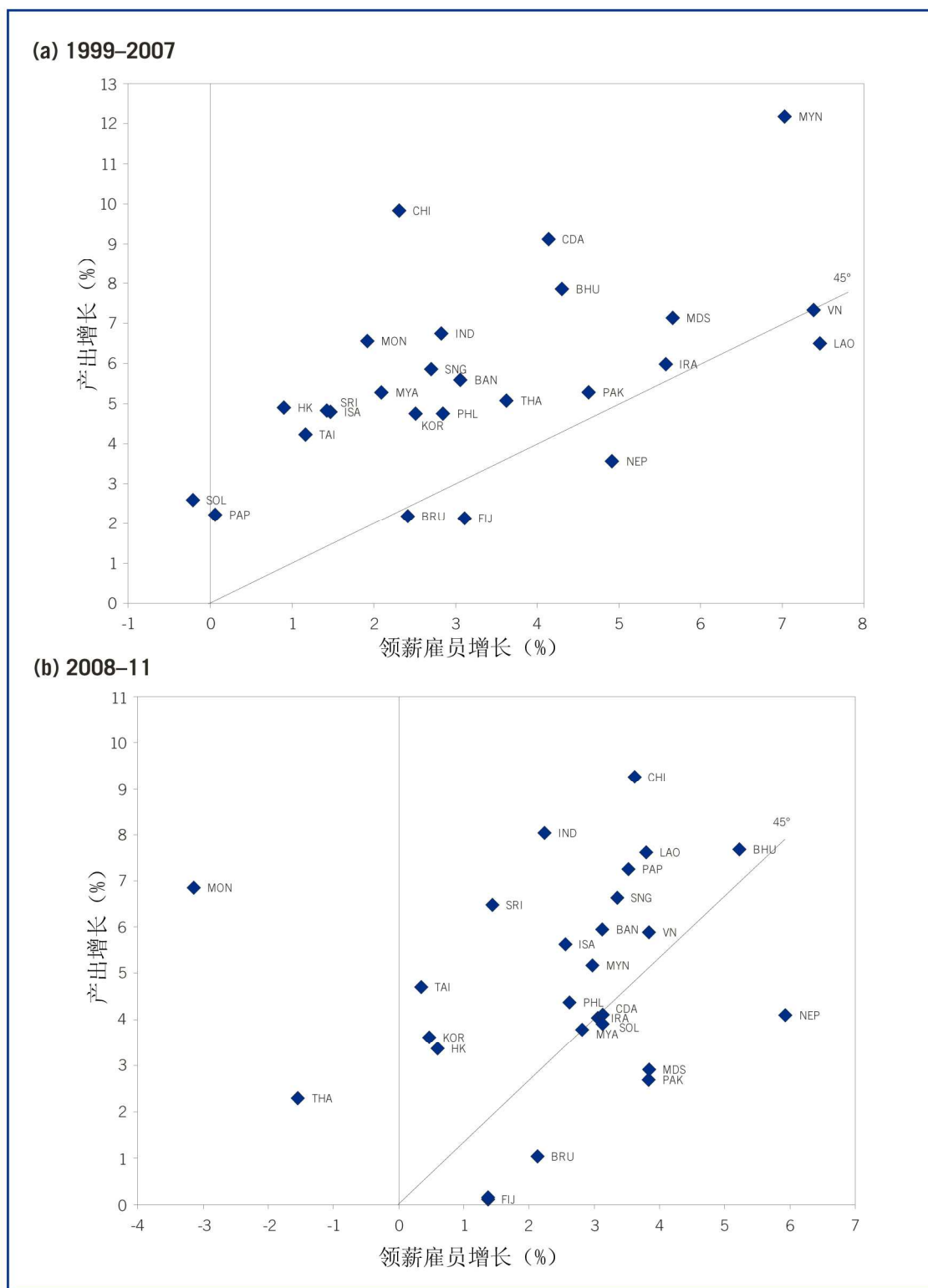
图 16. 1999 至 2007 年间和 2008 至 2011 年间亚洲产出与就业增长 (%)



注：国家缩写参见技术附录一。

资料来源：国际劳工组织，趋势计量经济模型，2012 年 3 月；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经济展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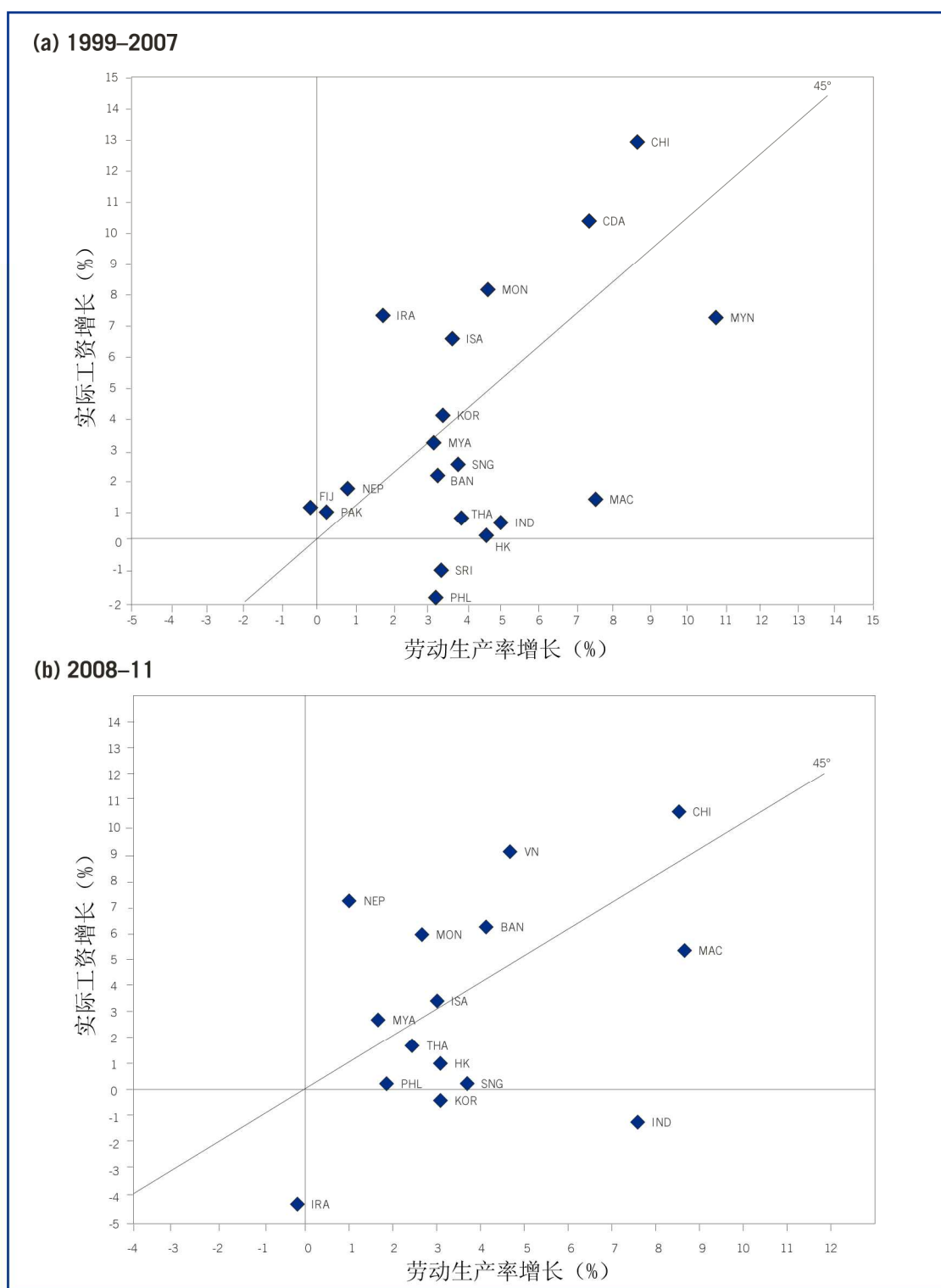
图 17. 1999 至 2007 年间和 2008 至 2011 年间亚洲产出与领薪雇员数量增长 (%)



注：国家缩写参见技术附录一。

资料来源：国际劳工组织，趋势计量经济模型，2012 年 3 月；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经济展望

图 18. 1999 至 2007 年间和 2008 至 2011 年间亚洲工资和劳动生产率增长 (%)



注：如果没有 1999 年、2007 年、2008 年或 2011 年的数据可用，那么就会用最近的下一个时间段数据来估算发展趋势。国家名称缩写参见技术附录一。

资料来源：国际劳工组织，全球工资数据库；国际劳工组织，趋势计量经济模型，2012 年 3 月

3.5 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区域

强劲表现抵御危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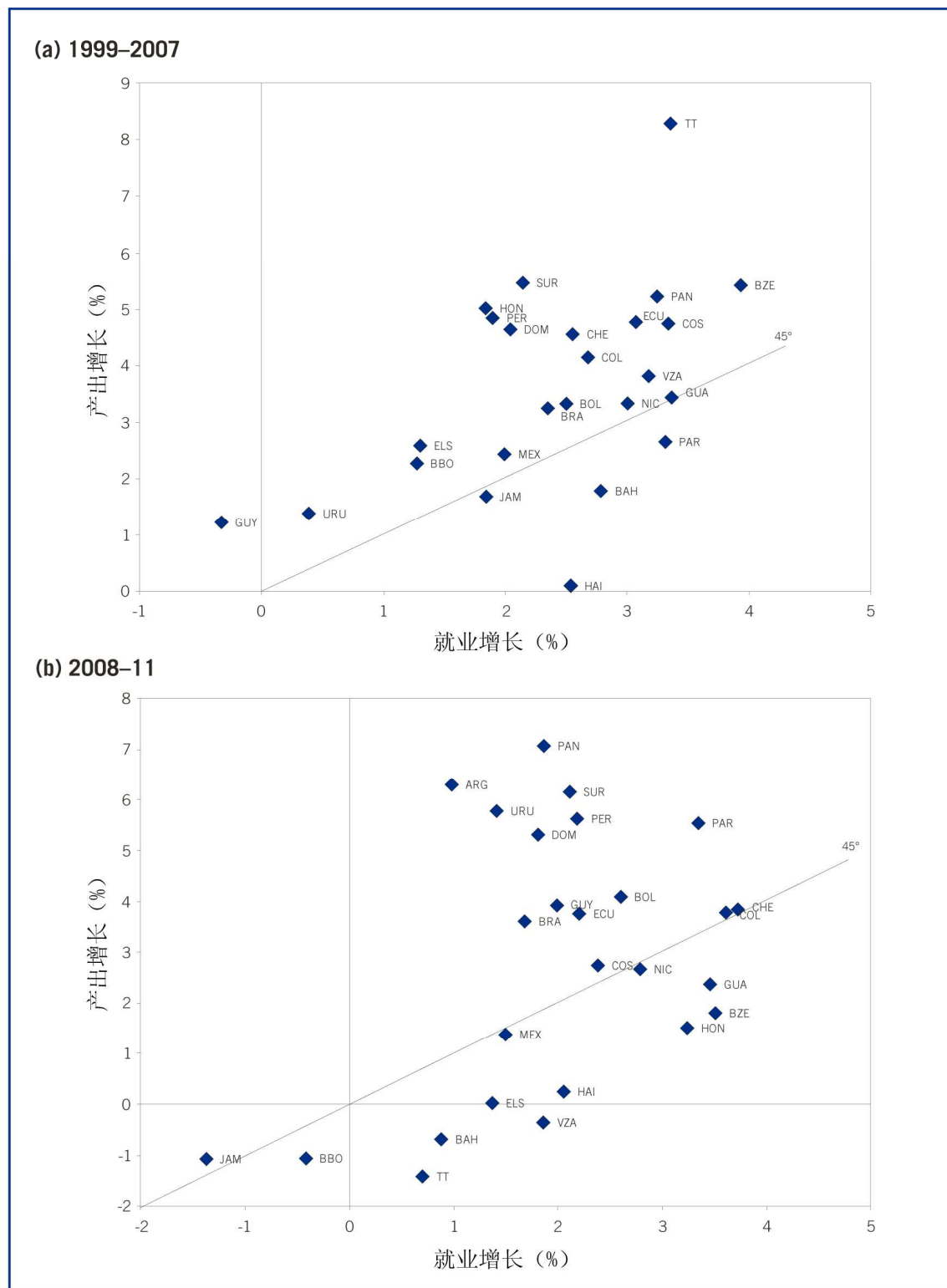
在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区域，经济危机打断了强劲的增长周期。图 19(a) 显示经济危机之前的 1999 年至 2007 年期间，该地区大多数国家的 GDP 和就业率年均增长都比较强劲。图 19(b) 显示全球经济危机在该区域持续时间相对较短。我们发现，在 2008 年至 2011 年期间，虽然该地区一些主要经济体在 2009 年出现了经济收缩，但大多数国家的 GDP 和就业率依然保持较为稳定的增速。不过，需要注意的是，中美洲和加勒比地区经济发展与北美市场联系紧密，因而其经济复苏的速度要比南美洲更为缓慢。

图 20 展示了从 2004 年到 2011 年期间的数据，2004 年是该地区经济强劲增长周期的起点，在此期间该地区的 GDP 保持了 4.4% 的年均增长速度。我们发现，拉丁美洲在 2009 年也受到全球经济危机的重创，但是却在 2010 年迅速反弹，这主要得益于其商品价格的复苏以及反周期货币和财政政策的实施。后者之所以能够成功，是因为该地区之前经过多年的增长，财政状况良好，外债也已降至可控的水平。不可思议的是，经济衰退不仅持续时间短暂，在其复苏过程中更是创造了新的就业机会，使得失业率大幅下降，从 2004 年的 10.3% 降至 2011 年的 6.8%（参见图 20）。

巴西的数据解释了地区性的增长

经济发展走向也在工资数据中得到反映。区域估计数据（图 7）显示，尽管 2009 年受到了经济危机的影响，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 2006 年至 2011 年间年实际平均工资一直呈现增长势态。同亚洲一样，最低实际工资增长率也是出现在 2008 年，即国际食品和石油价格双双上扬的通胀顶峰时刻。而 2009 年则相反，由于国际经济发展放缓，国际价格大幅下跌，该地区的通胀率平均下降了一半。由于通胀率的大幅下降，即使在经济收缩的大背景下，仍然略微提高了工资的购买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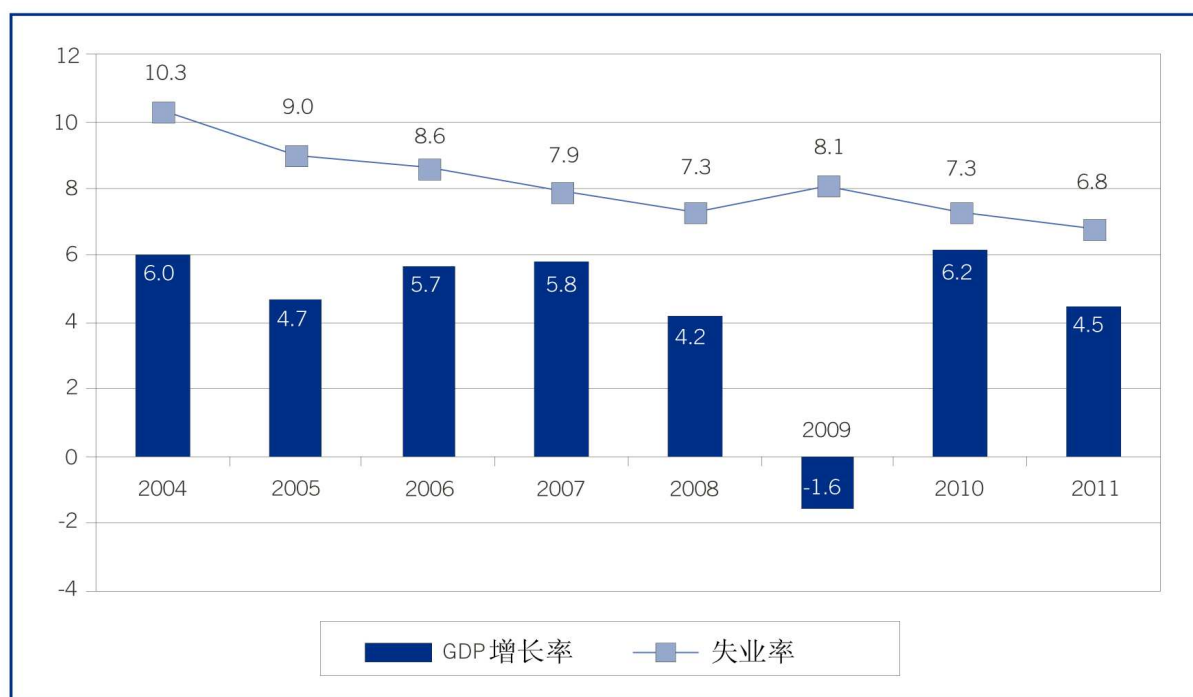
图 19. 1999 至 2007 年间和 2008 至 2011 年间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区域的产出和就业增长 (%)



注：国家缩写参见技术附录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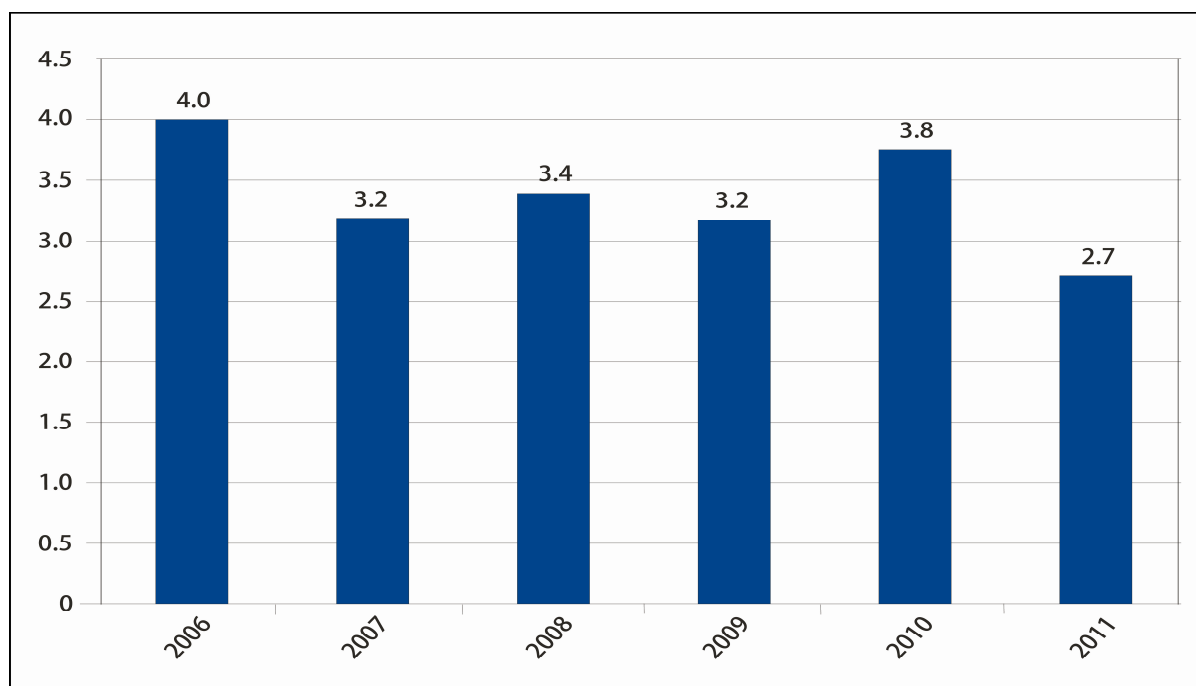
资料来源：国际劳工组织，趋势计量经济模型，2012 年 3 月；IMF，世界经济展望。

图 20. 2004 至 2011 年间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的经济增长和失业率 (%)



资料来源：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经济展望；ILO，2011e。

图 21. 2006 至 2011 年间巴西年实际平均工资年增长率



资料来源：国际劳工组织全球工资数据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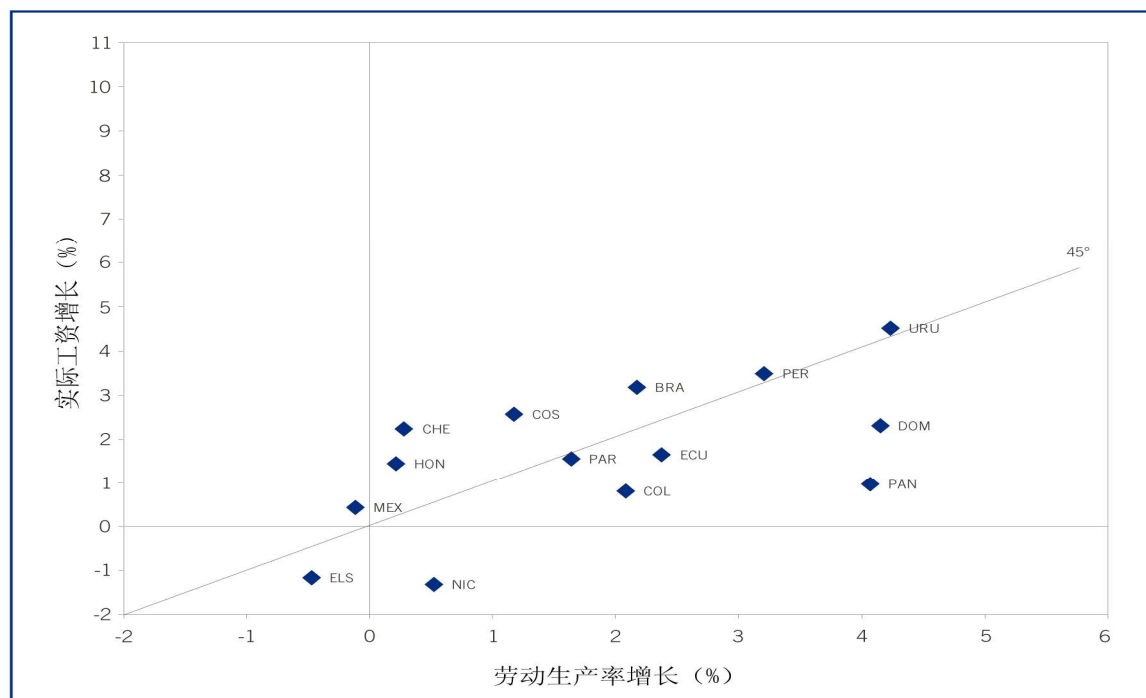
总体来说，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的工资发展趋势，主要受到该区域较大国家的影响，比如巴西，其工资在这个时期一直保持正增长（参见图 21）¹²。在我们掌握其

2005 至 2010 年期间完整数据的 14 个国家当中，我们发现很多国家的实际工资水平在 2008 年和 2010 年均出现下跌。在 2008 年，14 个国家当中有 10 个国家的实际工资出现下跌，而在 2010 年，有 6 个国家出现下跌。在这两个年度中，实际工资出现下跌的国家绝大多数位于中美洲和加勒比地区，因为它们的经济更加依赖于美国的经济表现。

生产率、就业和工资都有所增长——但并不是各国的普遍现象

图 22 提供了 2004 至 2011 年期间月实际平均工资的年度增长率数据，这一时期是该地区经济增长强劲的时期，相当多国家在这一时期内也有连续的工资数据可查。总的来说，劳动生产率增长较高的国家，实际工资也出现实质增长。例如，巴西、秘鲁和乌拉圭年实际平均工资增长率都超过 3%，智利和哥斯达黎加年增长率超过 2%。这些国家当中，绝大多数国家失业率有所下降，这意味着各项劳动力市场指标总体得到改善。与之相反的是，在这一时期人均 GDP 增长缓慢的国家，其实际工资增长也较少（如洪都拉斯和墨西哥），甚至出现了负增长（如尼加拉瓜和萨尔瓦多）。还有三个国家，虽然经济表现良好，但其实际平均工资却没有出现增长，它们分别是哥伦比亚、多米尼加共和国和巴拿马。

图 22. 部分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国家 2004 至 2011 年间工资和劳动生产率的增长 (%)



注：如果没有 2004 年或 2011 年的数据，我们采用了下一最接近年度的数据点来进行估值。国家缩写参见技术附一。

资料来源：国际劳工组织全球工资数据库；国际劳工组织趋势计量经济模型，2012 年 3 月。

3.6 中东区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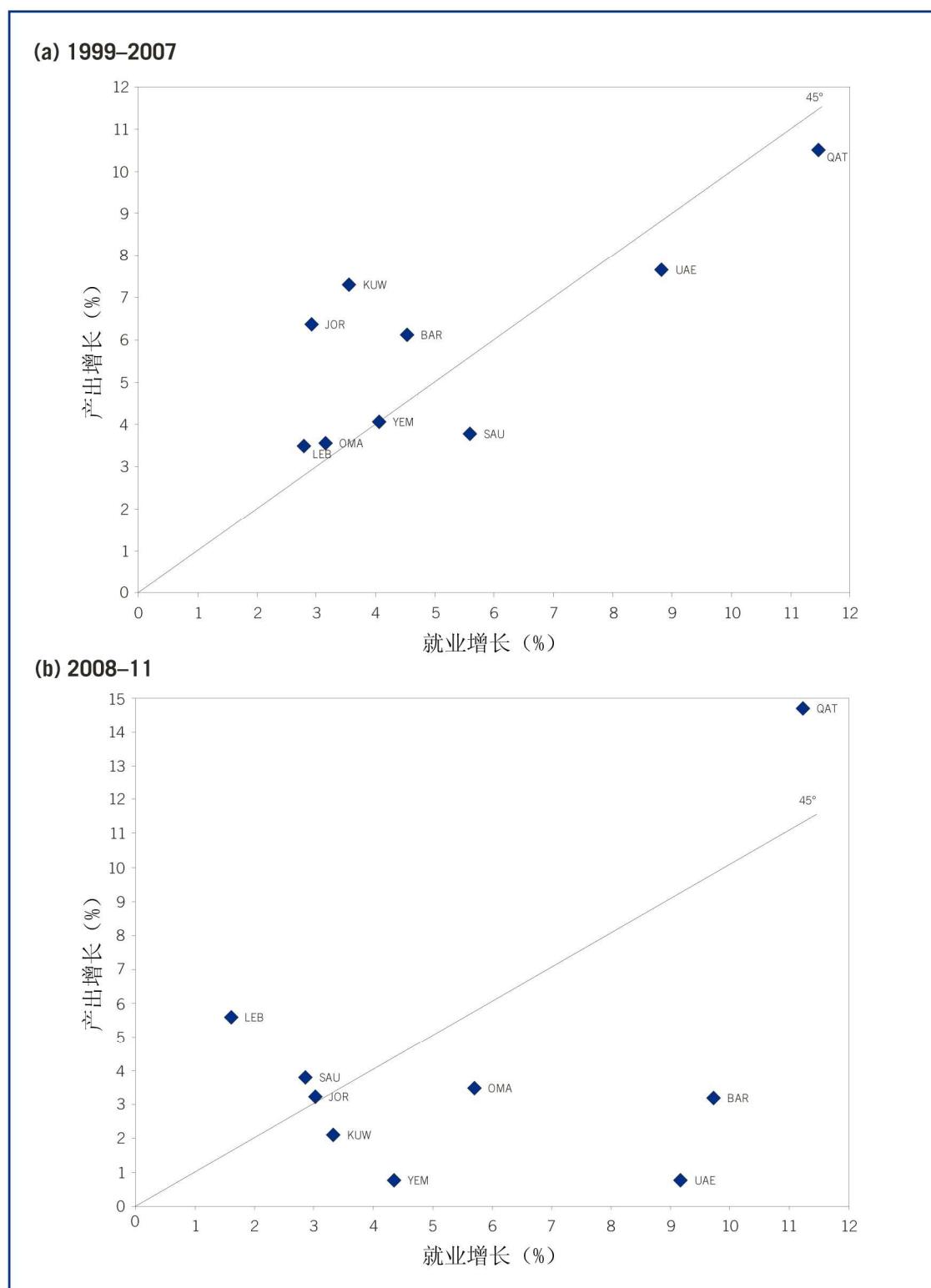
贸易放缓导致对外来务工人员的需求减少

大多数中东国家均受到全球经济危机影响，经济增长放缓。经济危机对这一区域的主要影响表现为国际贸易额的降低。中东地区欠发达经济体的出口需求大幅降低，2009 年海湾合作委员会（GCC）¹³各成员国石油出口价格暂时走低，此后石油价格和政府支出双双上扬。在海湾合作委员会的成员国家，外来劳动者的数量远超过本地劳动者，就业增长放缓可能只是临时性的（尽管缺乏相关统计数据）。唯一的例外是迪拜酋长国，其经济滑坡导致对外来务工人员需求降低，特别是在建筑行业。其他中东国家流动问题也是一个重要问题，许多叙利亚人在黎巴嫩建筑行业打工，而约旦服装行业的大多数工人来自南亚。

统计方面的挑战

在该地区，评估全球经济危机对工资的影响是困难的，至少有两个方面的原因。首先，该地区定期发布工资统计数据的国家非常少。巴林王国是中东地区唯一一个在每季度都开展工资调查的国家，该国劳动力市场监管局综合住户调查和行政数据来编制和发布所有雇员的平均基本工资数据。相比之下，沙特阿拉伯企业年度经济调查获得的年度数据总是要滞后两年才会发布，这意味着截至本报告编写时，最新的统计数据仍是 2009 年的。其次，该地区工资数据的质量往往值得怀疑，虽然在这方面已经有了一些改进。例如，突尼斯在国际劳工组织的协助下，于 2011 年进行了第一次工资调查。不管怎么说，目前已有的数据表明，大多数中东国家在过去的几年里工资并没有多少增长，甚至有所下降（图 2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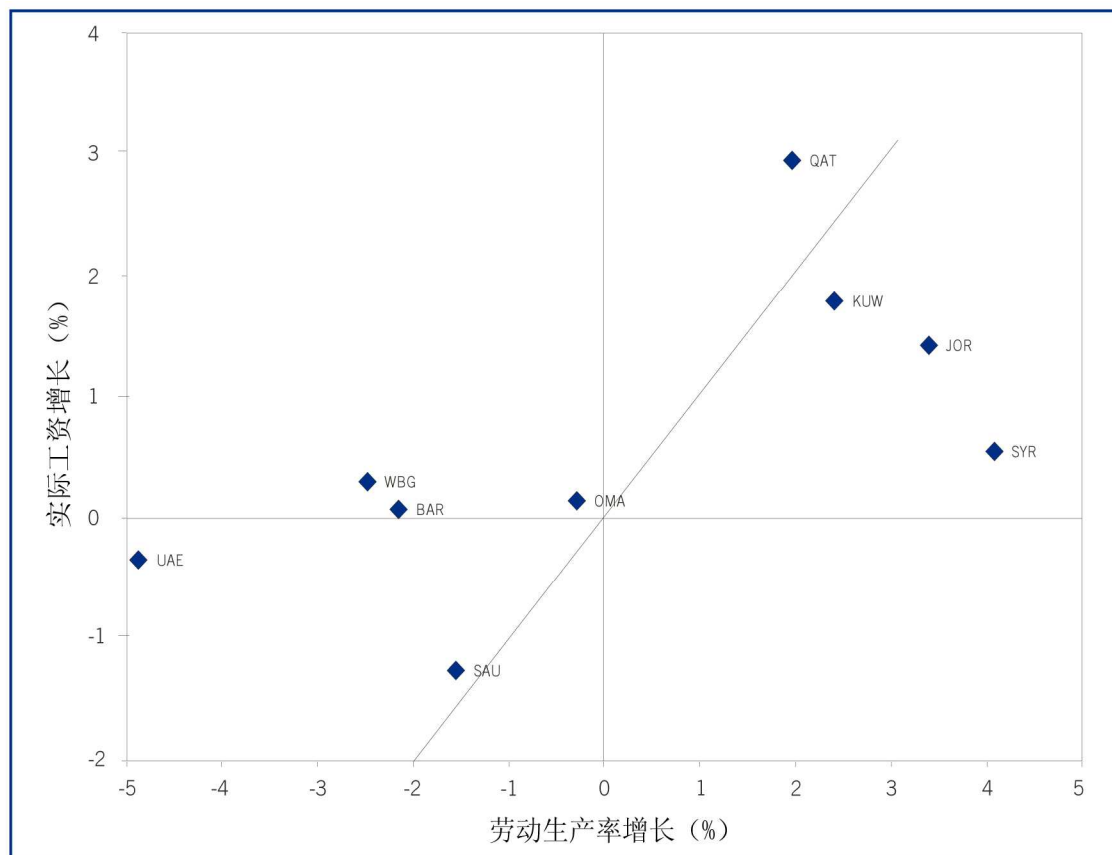
图 23. 1999 至 2007 年间和 2008 至 2011 年间中东地区产出和就业率增长 (%)



注：国家缩写参见技术附录一。

资料来源：国际劳工组织趋势计量经济模型，2012 年 3 月；IMF，世界经济展望数据库

图 24. 1999 至 2011 年间中东地区工资和劳动生产率的增长 (%)



注：如果没有 1999 年或 2011 年的数据，我们采用了下一最接近年度的数据点来进行估计。国家缩写参见技术附录一。
资料来源：国际劳工组织全球工资数据库；国际劳工组织趋势计量经济模型，2012 年 3 月。

此外，对工资统计数据的解读也存在困难，因为平均工资掩盖了本地劳动者和外来务工人员之间巨大的工资收入差距，因为这两者的工资是由两种完全不同的工资决定制度决定的。在海湾合作委员会各成员国中，外来劳动者和本地劳动者之间的巨大工资差异，是“阿拉伯化”进程中各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包括私营企业中本地劳动者的雇佣数量增加；保荐制度限制了外来务工人员自由转换工作；实施公共就业政策所产生的公共就业岗位仅面向本地人群，且支付的工资水平往往高于私营企业。事实上，由于劳动力市场上妇女劳动参与率低以及公共部门岗位中妇女的比例高，有时会导致统计数据得出负向的性别工资差距（即女性比男性的工资收入更高）。例如，在叙利亚，2010 年仅有约 13% 的女性积极参与经济活动，但其中约 74% 属于公共部门的领薪雇员，而公共部门的工资是私营部门通行工资的 1.5 倍左右（参见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中央统计局，2011a, b）。

阿拉伯之春运动：本地劳动者和外来务工人员侨汇

多项调查结果表明，“公平的工资”和高昂的生活成本是生活在阿拉伯地区的年轻人最关心的问题（ASDA’ A，2012），阿拉伯之春运动似乎已经促使好几个国家进一步提高了公共部门中本地劳动力的工资水平。而当目光投向私营部门时会发现，最低工资制度和集体谈判在阿拉伯地区没有得到充分发展。这会带来好几个意想不到的后果：例如工人和雇主之间谈判力量不对等，可能造成社会和政治动荡。尽管来自于海湾合作委员会国家的侨汇仍比预期表现得更坚挺，但是其它人员流入国可能会把经济危机的代价转嫁到外来务工人员身上。在劳务净输出国，汇款额的下降已经严重影响到了家庭收入，表现为消费总额和储蓄双双减少、失业率增加以及国内工资下调（世界银行，2011 年）。

3.7 非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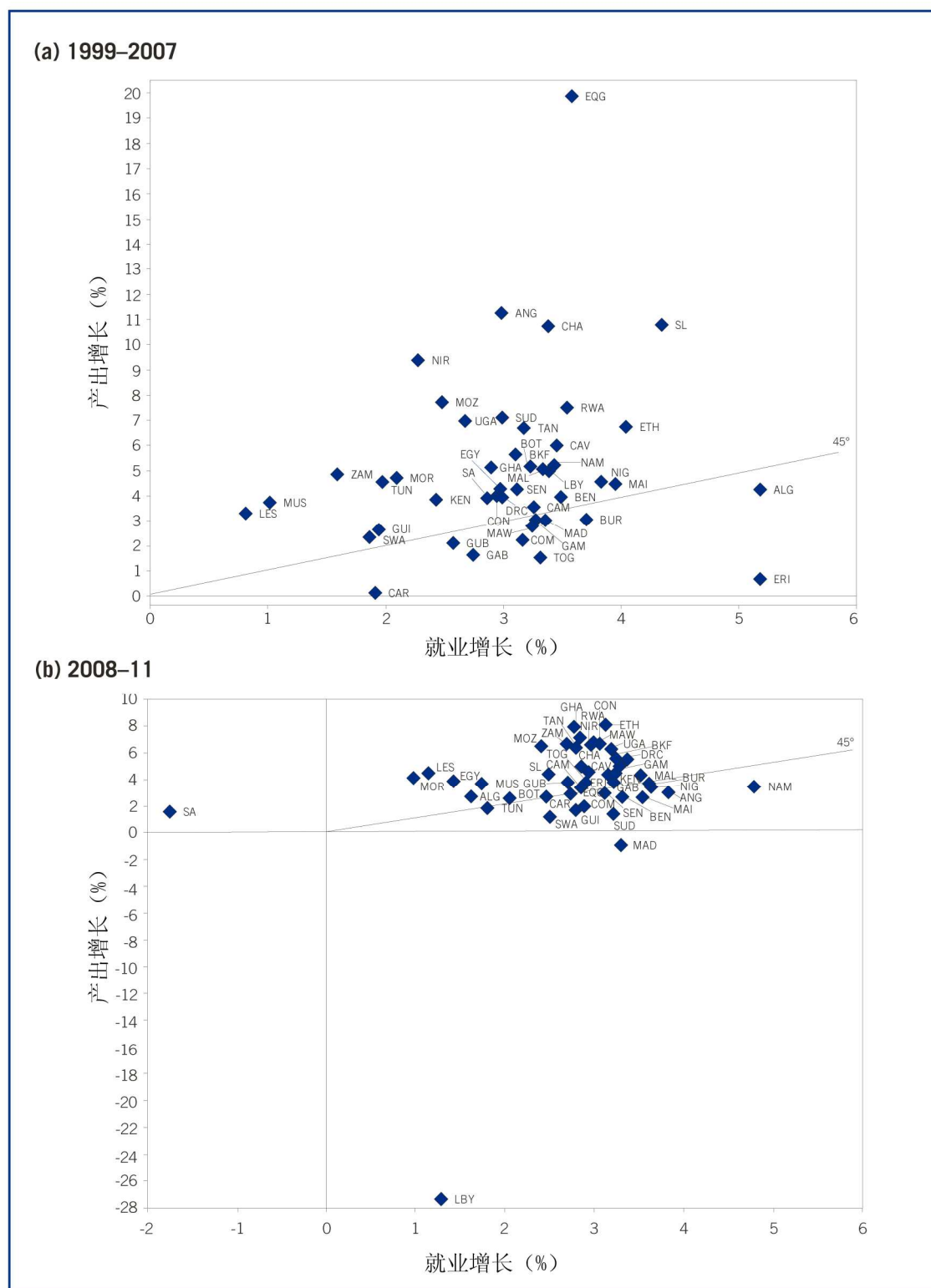
政权交替和社会动荡

经济危机之前的几年是非洲经济增长相对较快的一段时期，从 2004 年至 2008 年年均增长率达到 6.5%。2008 年开始到 2011 年，经济环境恶化，特别是北非国家面临着来自外部和内部的双重挑战。外部挑战源自与低迷的欧洲经济的紧密关系，而内部挑战是指埃及、突尼斯和利比亚等国在民主政治进程中发生的激烈动荡和政权交替。在短期内，政权交替造成了外国投资和对外贸易的减少，旅游业也受到了影响。通过图 25 产出和就业率增长可以观察到利比亚经济在 2008 年至 2011 年间遭受的严重影响。

失业：多数国家难以承受的奢侈品

图 25 突出表明，在 1999 至 2007 年间非洲大多数国家产出增长率超过就业增长率，实现了劳动生产率或多或少的提高。之前有研究估计，在 2000 至 2009 年期间，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劳动生产率的年增长率为 1.9%，（ILO，2012b）。但是，和前文对亚洲的分析一样，在贫穷的发展中国家，就业率的增长往往是随着劳动年龄人口的增长而产生的，因为国家的失业保障体系不健全，大多数人承受不起一直失业。为此，我们也（在图 26 中）展示了非洲国家 GDP 增长与有薪就业增长之间的相互关系。可以发现，经济的增长总是伴随着相对强劲的领薪雇员数量的增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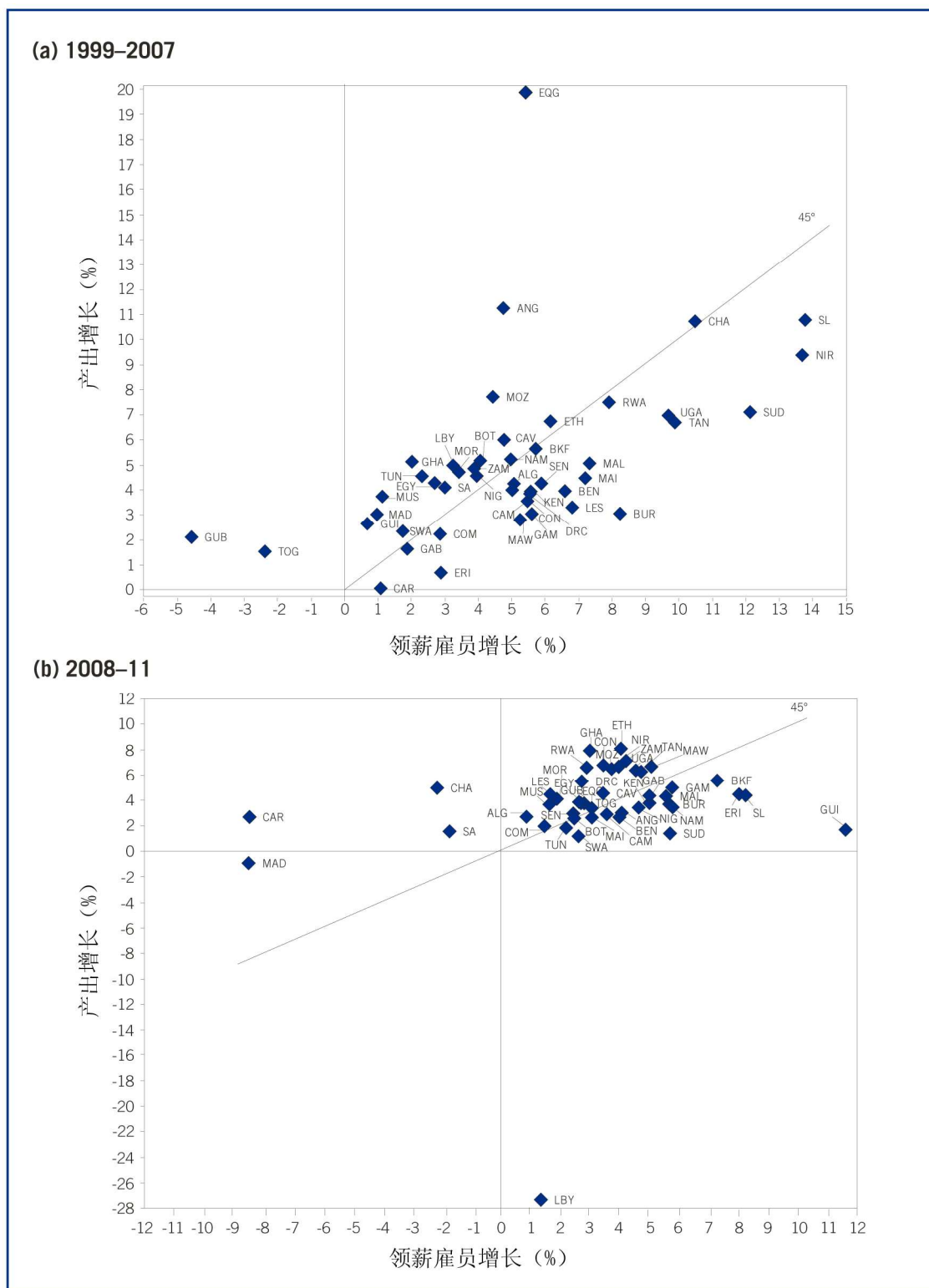
图 25. 1999 至 2007 年间和 2008 至 2011 年间非洲的产出和就业率增长 (%)



注：国家缩写参见技术附录一。

资料来源：国际劳工组织趋势计量经济模型，2012 年 3 月；IMF，世界经济展望数据库。

图 26. 1999 至 2007 年间和 2008 至 2011 年间非洲产出和领薪雇员数量的增长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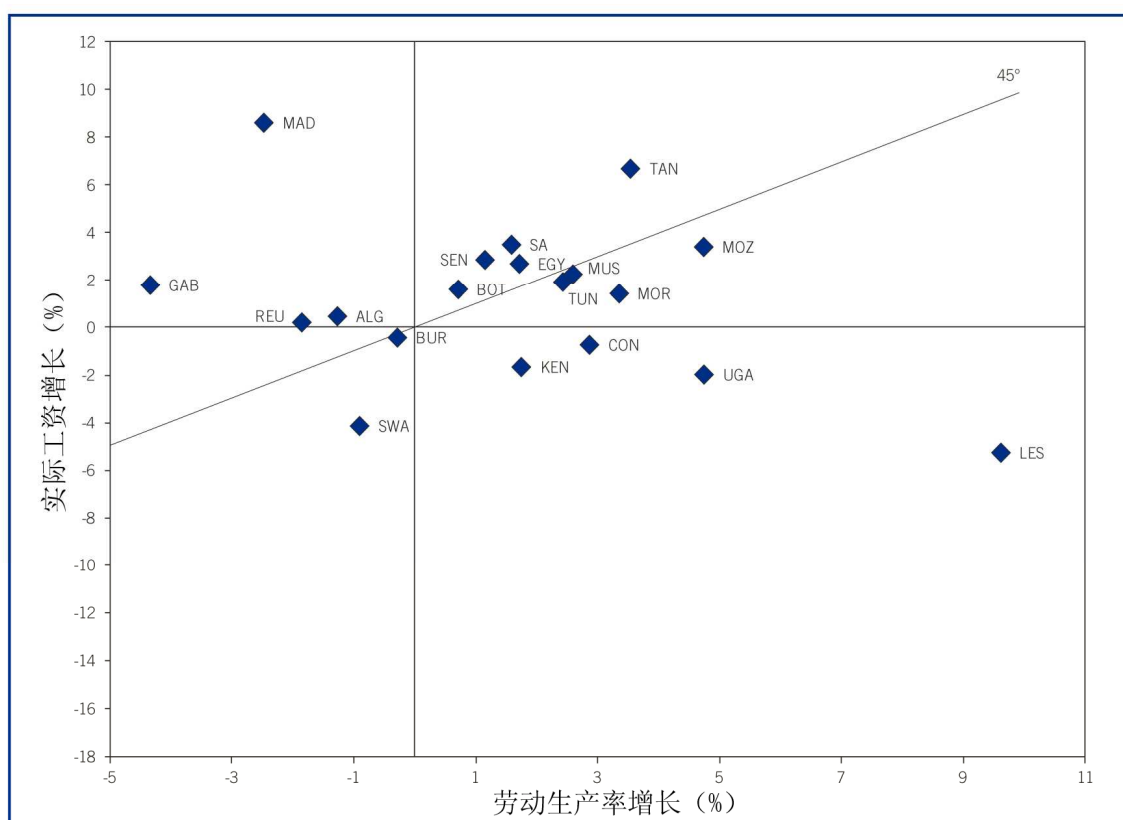
注：国家缩写参见技术附录一。

资料来源：国际劳工组织趋势计量经济模型，2012 年 3 月；IMF，世界经济展望数据库。

有限的证据表明工资温和增长

这些情况对工资有哪些影响呢？关于非洲平均工资的发展过程的数据比较缺乏。只有少数非洲国家，包括博茨瓦纳、埃及、莱索托、毛里求斯、南非和乌干达，会像发达国家一样开展季度或年度企业调查，以掌握收入的变化情况。摩洛哥会基于向其社会保障主管机构——国家安全和社部报告的收入数字，来发布名义平均工资指数。在其余大多数国家，工资数据最多是通过不定期的劳动力调查来获得，并且各年度之间不总是具有可比性。根据我们对该区域的暂时估计，如图 7 所示，自 2006 年以来，工资增长始终保持温和态势，只有 2010 年区域平均工资增幅较大，主要因为当年的估计数据中南非占了较大比重。图 27 显示了部分国家 1999 至 2011 年间实际工资和劳动生产率的增长情况。根据官方数据，南非 2010 年的实际平均工资增长了近 10%，但是工资增长分布不均。

图 27. 部分非洲国家 1999 至 2011 年工资和劳动生产率增长 (%)



注：如果没有 1999 年或 2011 年的数据，我们采用了下一最接近年度的数据点来进行估值。国家缩写参见技术附录 一。
资料来源：国际劳工组织全球工资数据库；国际劳工组织趋势计量经济模型，2012 年 3 月。

4 最低工资和有工作贫困

在目前的经济形势下，无论是在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最低工资仍是政策议程和公共领域中倍受争议的话题。国际劳工组织在其《体面劳动议程》当中，鼓励成员国通过实施最低工资标准来减少有工作贫困，为弱势劳动者提供社会保障¹⁴。国际劳工标准还建议各国政府在确定最低工资标准时与社会伙伴展开广泛协商，出台平衡措施，充分考虑劳动者及其家庭的需要和各项经济因素，包括生产率水平、经济发展的要求以及保持较高就业水平的要求¹⁵。按照同样的思路，欧盟委员会近日表示，各成员国应建立“体面和可持续的工资制度”，并且指出“确定适当水平的最低工资标准，可以扼制有工作贫困现象上升的势头，也是确保体面工作质量的重要因素。”（参见欧洲委员会 2012a，第 9 页）。关于最低工资到底应该确立在什么样的水平，争论仍在继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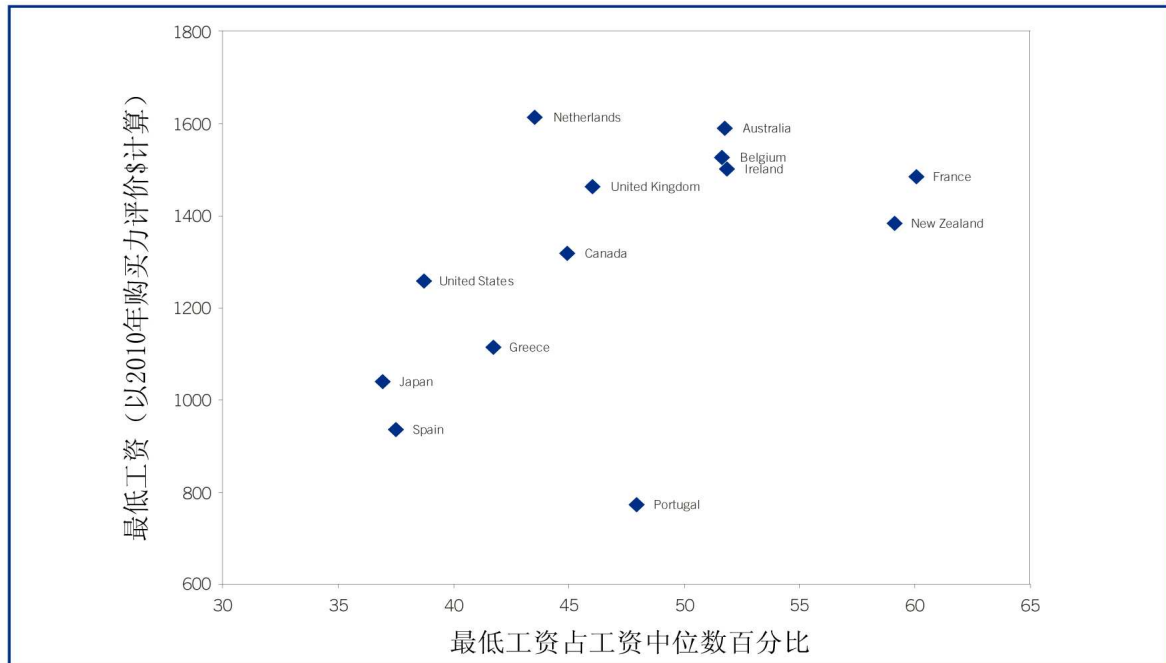
4.1 发达经济体

不同的机制，不同的观点

在发达经济体中，最低工资在全职劳动者的收入中位数中所占比例差异很大，新西兰和法国达到约 60%，而日本、西班牙和美国只有不到 40%（图 28）。各国最低工资水平的差异既反映了各国最低工资决定机制的差异（Lee，2012），也反映出各国对实施最低工资可能导致的低薪劳动者被替代或劳动力市场提供就业岗位可能减少等问题持有不同观点。以上因素，以及各国平均工资水平的差异，也可以部分解释为什么发达经济体之间最低工资标准绝对值差距如此悬殊（图 28）。

和各国对于理想的最低工资标准存在观点分歧一样，各国对经济危机期间这一政策工具能起到的作用也存在不同看法。仅以发达经济体来看，在 2009 年经济危机初期，其政策制定者曾积极利用最低工资制度对社会最弱势劳动者提供保护（参见图 29）。而此后几年中，大多数情况下，最低工资标准的调整只是为了补偿通货膨胀的影响。如图 29 所示，在 2009 年之后的几年中，发达经济体实际最低工资的增长非常缓慢（或者甚至有所下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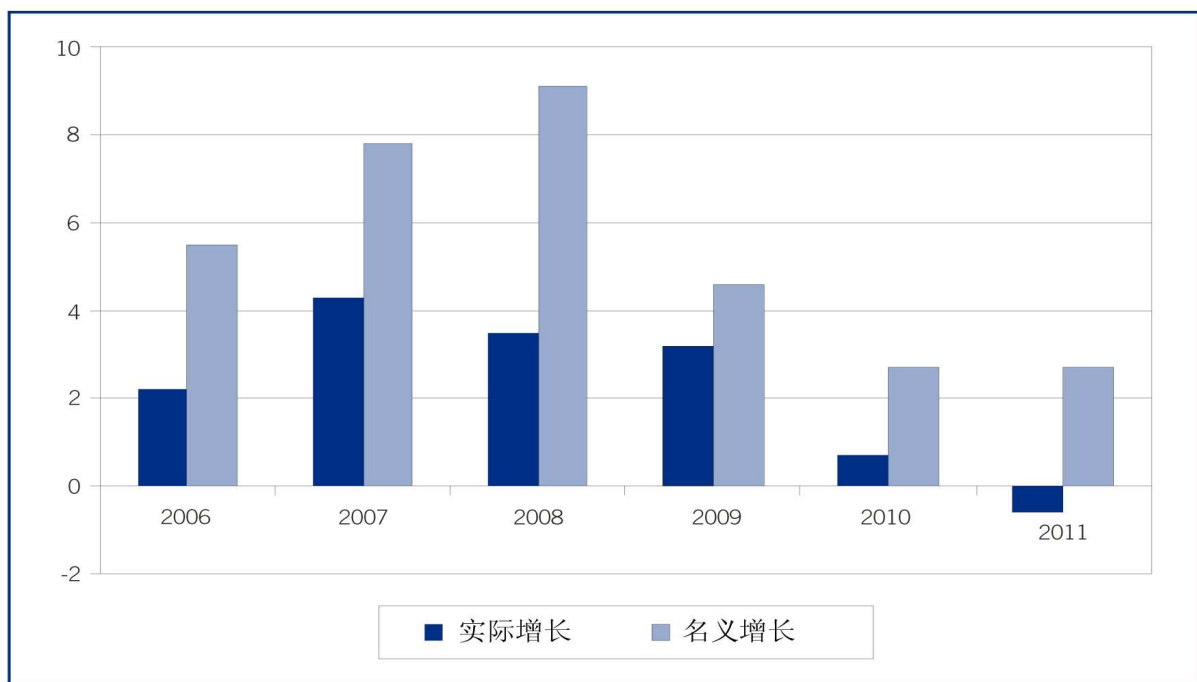
图 28. 部分发达经济体 2010 年最低工资标准（以 2010 年购买力平价计算，和与全职劳动者中位数工资的比值）



注：如果纳入 8% 的节假日补贴，荷兰的最低工资/中位数工资之比为 47.1%；如果纳入第 13 个月和第 14 个月工资，葡萄牙的最低工资/中位数工资之比为 56%，西班牙为 43.8%。

资料来源：国际劳工组织全球工资数据库；低工资委员会，2012 年。

图 29. 2006 至 2011 年间发达经济体最低工资标准的增长



注：对 26 个发达经济体的实际和名义最低工资的增长率进行非加权的简单平均得到。

资料来源：国际劳工组织全球工资数据库。

为应对危机而强制减薪

希腊大幅削减了最低工资，与之前相比降低了 22%¹⁶（图 28 中的数值是在此次调整之前的最低工资）。这种变化是根据欧洲央行、欧盟委员会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要求而作出的，是希腊政府从欧洲金融稳定基金（EFSF）获得资金救助的一个条件。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2012b）的要求，希腊如果无法通过货币贬值或利率调整重新获得竞争力和恢复经济增长，那么就必须减薪。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还认为，虽然希腊的最低工资标准并没有超出规定范围（图 26），但仍然大大高于其他发达经济体。葡萄牙也以冻结最低工资为条件，换取了欧洲金融稳定基金的救助。

4.2 发展中经济体和新兴经济体

最低工资也是发展中经济体和新兴经济体广泛运用的政策，但是在这些经济体中，我们更难以得到其最低工资标准与中位数工资或平均工资之间的相对关系的信息（因为其平均工资数值往往只覆盖正规经济部门或城市地区的部分领薪雇员）。尽管如此，最近的一项研究还是表明，和发达经济体类似，低收入和中等收入国家在经济危机期间对最低工资标准的调整幅度也不尽相同。国际劳工组织和世界银行联合组织的一项有关金融和经济危机应对政策的研究发现，从 2008 年年中至 2010 年年底期间，被调查的 55 个低中收入国家当中，有 22 个国家的最低工资标准发生了变化¹⁷。

发展中国家的有工资劳动及其优势

发展中国家对最低工资制度经常提出的保留意见之一，是他们认为所有工资收入者都属于精英群体，享有更高的生活水准以及其他群体如个体劳动者或家庭帮工成员无法企及的特权。虽然与个体劳动者或家庭帮工成员相比，有工资就业通常的确是较高的生产率、更优越的就业条件和更大的工作权利联系在一起的，但其实在许多发展中国家，有许多工薪劳动者及其家庭实际上也是生活在贫困之中，专栏 1 专门对此进行了讨论。图 30 提供了 32 个发展中国家中生活在 1.25 美元和 2 美元的国际贫困线以下的工薪劳动者的比例。这些数字显示，这 32 个发展中国家在 1997 至 2006 年间的不同时点总计有大约 2.09 亿的工资收入者，其中有大约 2300 万人每天收入低于 1.25 美元，有 6400 万人每天收入低于 2 美元。这表明，最低工资制度虽然有一定局限性，但是在消除贫困方面仍然可以发挥一定作用。

在拉丁美洲，有一个国家的最低工资制度已经发挥了显著作用，这就是巴西。虽然巴西推行最低工资再评估战略已经大约 20 年，但真正加速发展是从 2005 年开始的。从那时起，最低工资制度成为促进国内消费战略的一个组成部分，对最低工资的定期调整开始与通货膨胀率加 GDP 增长率有系统地挂钩。甚至在金融危机期间工资政策作为反周期战略的组成部分时，依然坚持类似做法。与之相对比的是，墨西哥从 2005 年至 2011 年，实际最低工资仅有微弱增长，这是因为其最低工资政策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政府能否实现财政平衡（因为最低工资决定了多项社会保障支付标准）和提高出口竞争力。结果，最低工资标准低于市场工资水平，甚至非熟练工人也是如此。这两个案例反映了两种对待最低工资制度的不同思路。

亚洲在提高最低工资和设计最低工资架构方面取得了一些积极进展。整个亚洲地区，自 2005 年以来几乎所有国家的最低工资一直是正向增长的。这种增长还伴随着该地区在同一时期内的正向经济增长和坚实的实际平均工资增长（见图 15）。出现以上这些增长的同时，还伴随着雇员人数占总体就业人数比例的增加，从而使得受最低工资直接影响的劳动者比例增加。例如，中国采取了措施，来加强各省最低工资制度的执行和协调；蒙古引入社会合作伙伴共同来改进最低工资确立机制；马来西亚于 2012 年首次发布最低工资标准；菲律宾简化了过去复杂的最低工资制度；印度通过国家农村就业促进计划（NREGS）支付最低工资，改变了私营企业不按规定支付最低工资的情况（Rani 和 Belser, 2012）。

2005 年到 2011 年间，中东地区的最低工资标准大幅下降，并且在这一地区，最低工资制度的作用总体上比较有限。2011 年雇员人数占到总体就业人数的 66%，但是即便存在最低工资标准，其覆盖面也往往十分有限。例如，在一些国家，最低工资标准仅对本国公民有效，或者歧视性地对外来务工人员实行更低的最低工资标准。而在其他一些国家，如巴林，最低工资只适用于公共部门的工作人员。

专栏 1：工薪劳动者中的贫困状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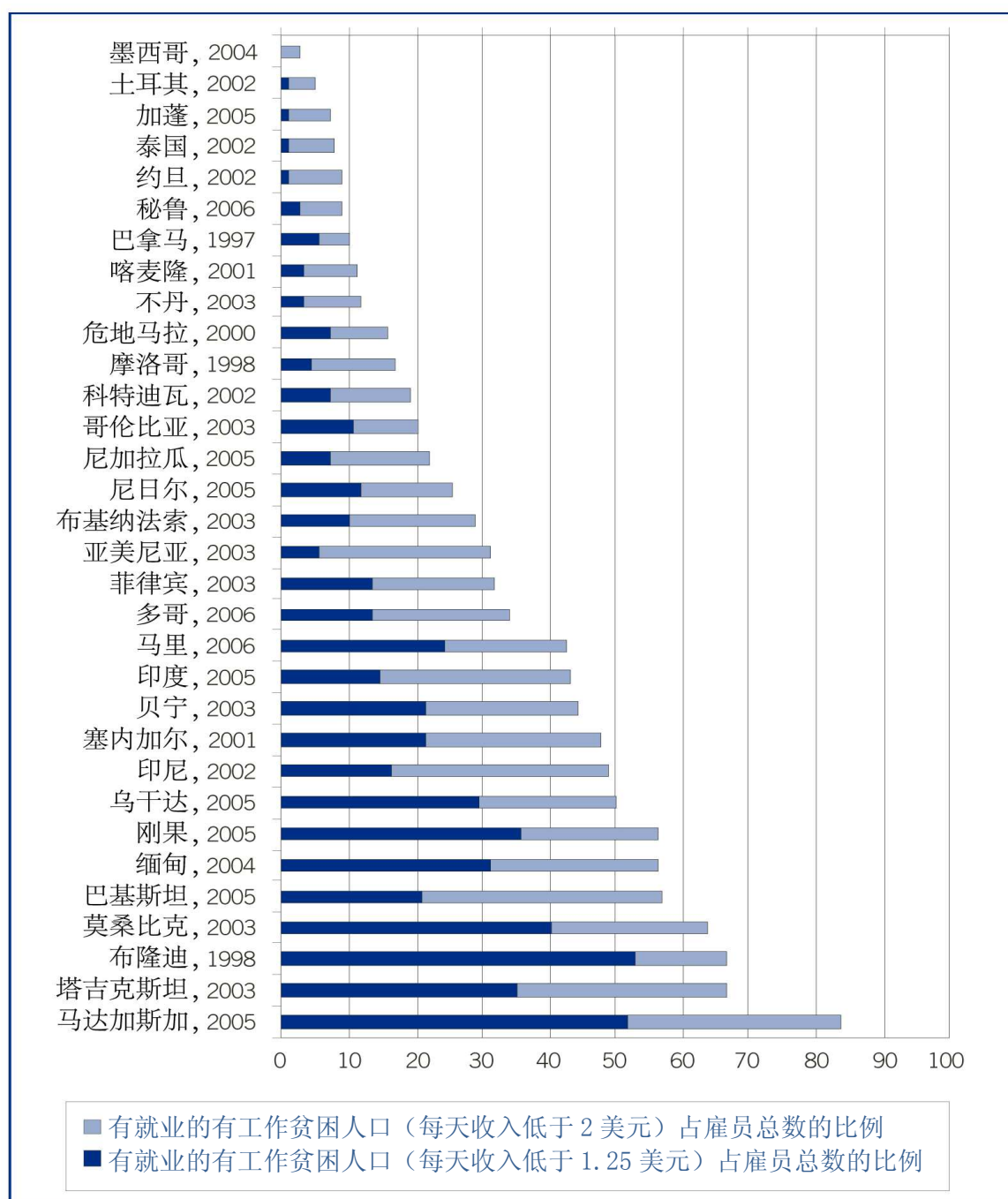
有工作贫困人群是指家庭中尽管拥有就业而其生活水准却仍然低于规定贫困线的那些成员（Kapsos 和 Horne，2011）。为便于国际比较，通常用调整后的购买力平价每天 1.25 美元或 2 美元分别作为极端贫困和中度贫困的贫困线，家庭人均日消费低于这两个标准线即被列为贫困家庭¹⁸。在发展中国家，出现极端贫困现象的劳动者往往从事的是自给自足的工作：例如从事小规模农业工作的个体劳动者或家庭帮工成员。的确有证据表明在有工作贫困和自给自足农业之间存在联系：国际劳工组织一项最新研究发现，在 53 个掌握全国住户调查数据的国家当中，有五分之四的极端贫困劳动者（1.25 美元贫困线以下）生活在农村地区，68% 的有工作贫困劳动者从事的是农业生产活动（参见 Kapsos 和 Horne，2011 年）。

不过，多项类似调查的结果也表明，如果只把目光放在个体劳动者和家庭帮工成员中存在的贫困现象，会大大低估发展中国家有工作贫困的发生程度。例如，如图 30 所示，马达加斯加 2005 年有超过 80% 的工薪劳动者处于贫困状态，而其中超过一半生活在极端贫困当中。根据最新调查数据，在莫桑比克、布隆迪和塔吉克斯坦，超过 60% 的雇员生活在贫困当中，在柬埔寨、刚果共和国和巴基斯坦，超过 50% 的雇员属于贫困人群。

那么这些数字与个体劳动者和家庭帮工成员的贫困发生率相比，情况又如何呢？在 32 个国家中，除了两个国家（巴基斯坦和塔吉克斯坦）以外，其他国家的个体劳动者和家庭帮工成员的贫困率均超过工资收入者的贫困率。因此对于多数国家，如果拥有一份带工资或薪酬的工作，那么陷入贫困的概率相比于个体劳动者和家庭帮工成员还是要低一些的。不过，在有的国家，有一份带工资的工作并不会比其他形式的就业有更大可能免于陷入贫困。例如，在柬埔寨，2004 年有 56.5% 的雇员生活在 2 美元贫困线以下，而个体劳动者和家庭帮工成员中该比例为 65.8%。

此外，在发展中国家贫困的工薪劳动者往往在有工作贫困群体中占了很大比例。在印度尼西亚，2002 年生活在 2 美元贫困线以下的工资收入者估计达 1550 万，而个体劳动者和家庭帮工成员的贫困人口总数为 2940 万，也就是说，每五个多一点贫困工薪劳动者对应着十个贫困的个体劳动者和帮工的家庭成员。在巴基斯坦，2005 年，每八个极端贫困工薪劳动者就对应着十个贫困的个体和零工资家庭帮工。因此，尽管发展中国家的有工作贫困人群的确绝大多数是在农村地区从事农业活动的人员，但是，旨在提高生产力、提高贫困人口收入和福利的政策，还必须考虑到大量生活在贫困线以下的工薪劳动者及其家庭。

图 30. 有就业的有工作贫困人口（每天收入低于 1.25 美元和 2 美元）占雇员总数的比例



资料来源：国际劳工组织根据全国住户调查的数据计算。

资料来源：Steven Kapsos，国际劳工组织劳动经济学家。

第二部分 劳动份额下降与公平增长

近期工资和劳动生产率增长的变化趋势决定了*国民收入的功能性分配*——即国民收入在劳动和资本之间的分配比例。如果 GDP 总量的增长快于劳动薪酬总量的增长，那么劳动收入份额（也称“工资份额”）相对于资本收入份额而言就会下降。而与之相反的是，当劳动薪酬总量的增长超过 GDP 总量的增长时，则劳动收入份额就会上升，而资本收入份额下降。报告的第二部分分析了劳动收入份额的变化趋势以及这些变化产生的原因，为近期关于这一课题日益增多的文献资料¹⁹做出了有益补充。

接下来，报告分析了劳动收入份额的变化如何影响了宏观经济总量，如消费、需求和净出口。在当前国际经济形势下，认识劳动薪酬与需求总量之间的因果关系显得尤为重要。尽管普遍认为工资对经济的影响至关重要，但是到目前为止，在实证研究中很少关注劳动份额变化对宏观经济产生的影响。本报告提供了统计学上的因果分析框架，并将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都纳入分析范围，为已有的文献资料提供了实证研究。

5 收入中劳动份额的降低

5.1 劳动份额的变动趋势

打破稳定性的神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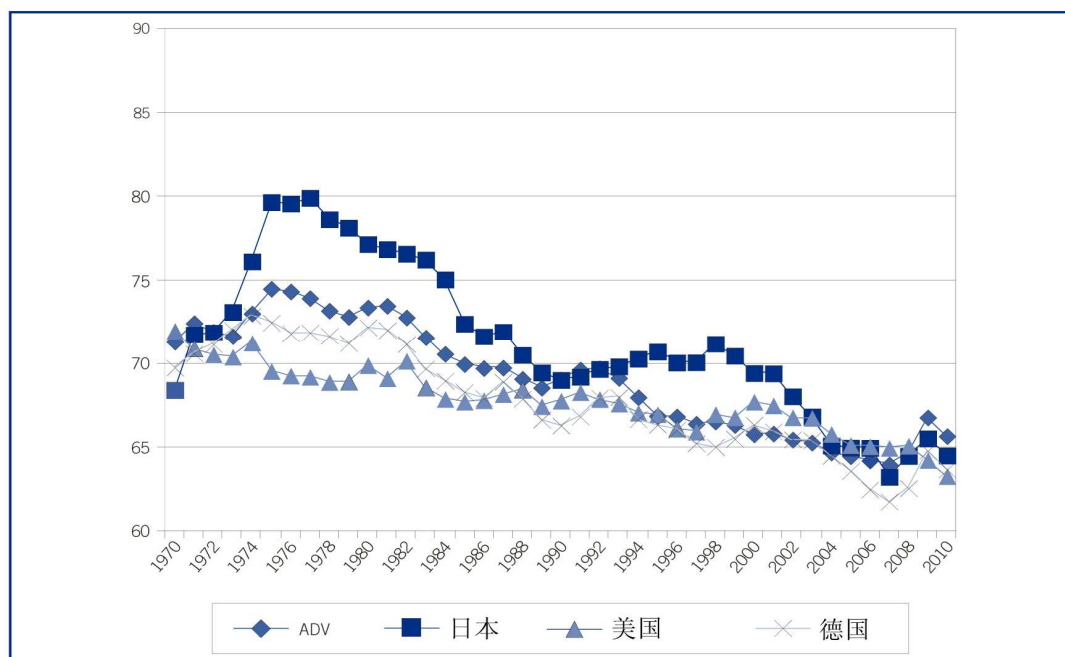
过去一个世纪的大多数时间里，普遍认为稳定的劳动收入份额是经济增长的自然结果或“既成事实”。随着工业国家变得日益富裕，劳动者和资本所有者的总收入同时以近乎一致的速度增长，因而国民收入中劳动和资本的分配比例，除了小幅波动外²⁰，在相当长的时间内都保持一个常量。就仿佛在经济学中有一个不成文的规则在保证劳动和资本均等地从物质发展过程中获益，关于国民收入的功能性分配这一话题几乎从学术研究中消失了。然而近些年来，这个长期以来的普遍共识受到了挑战。大量涌现的文献资料不断提出新的实证材料都一致表明，近几十年来，在许多有相关数据支持的国家中，劳动份额都出现了下降的趋势。

例如，OECD 的研究发现自 1990 年至 2009 年期间，在 30 个有数据的发达国家中，有 26 个国家国民收入中劳动薪酬所占份额下降了。这些国家劳动份额的中位数占国民收入份额从 66.1%下降到了 61.7 %（OECD，2012b）。这些发现与 ILO《2010/11 全球工资报告》中认为 1980 年以来大多数 OECD 国家劳动份额都在下降的判断（参见 ILO，2010a；以及 ILO，2008a）是一致的。再早些时候，一些国际组织发布的其它报告也有相同的判断（IMF，2007；欧盟委员会，2007；BIS，2006；ILO，2008a，2010a；OECD，2011，2012a）。对于发达经济体之外的国家，国际劳工组织《2011 劳动世界报告》认为劳动份额下降的现象在许多新兴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更为突出，其中亚洲和北非呈明显下降，而拉美国家的工资份额虽然相对稳定但也在下降（IILS，2011）。其它研究也指出了这一趋势明显在向全球扩展，表明世界范围内收入总量中劳动薪酬的比例都在下降。（见 ILO，2008a；Stockhammer，2012，Husson，2010；Artus，2009）

劳动份额下降的证据

图 31 和图 32 分别显示了 1970 年至 2007 年以及 2010 年个别发达国家以及三组发展中国家及新兴经济体所谓“调整后”的劳动收入份额的变化趋势²¹。在图 31 中可以看到，这个时期 16 个有相关数据的发达国家中，其劳动份额的简单平均值从上世纪七十年代中期占国民收入的 75%左右，下降到全球经济和金融危机前的 65%左右。图 32 表明，在一组 16 个发展中国家和新兴经济体中，劳动份额的均值也从上世纪九十年代早期占 GDP 的 62% 左右下降到经济危机前的 58%。即使是在中国，虽然过去十年中工资增长了两倍左右（见本报告第一部分），GDP 的增速也依然高于工资总额的增长速度——因而造成劳动收入份额下降（图 33）。中国、肯尼亚、韩国、墨西哥和土耳其（图 32）的数据表明，这组国家劳动份额的下降趋势从上世纪八十年代就已经开始显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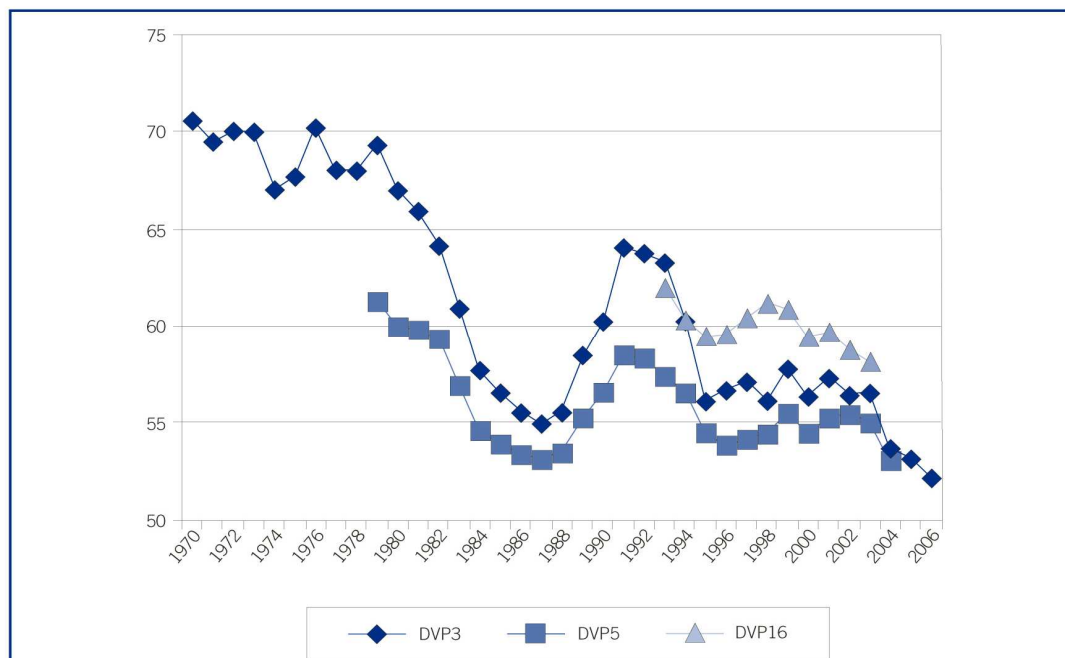
图 31. 1970 至 2010 年期间发达国家、德国、美国和日本调整后的劳动份额



注：ADV = 16 个高收入 OECD 国家的不加权平均值（澳大利亚、奥地利、比利时、加拿大、丹麦、芬兰、法国、德国、爱尔兰、意大利、日本、荷兰、西班牙、瑞典、英国、美国。不包括韩国）

资料来源：Stockhammer, 2012, 自 AMECO 数据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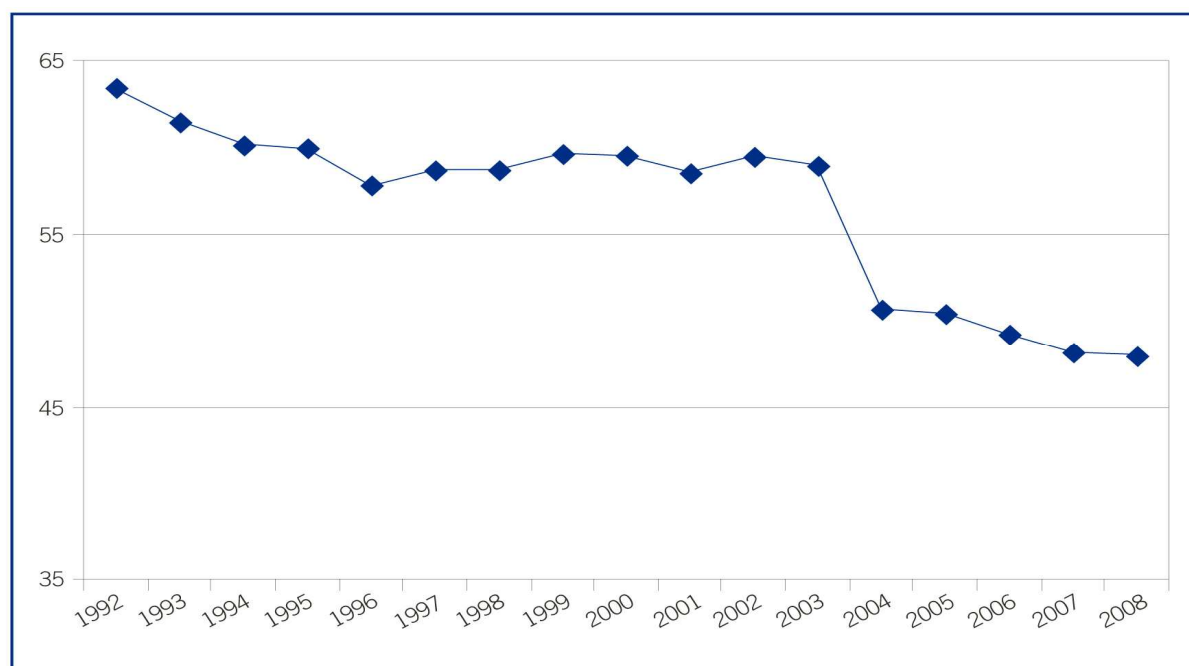
图 32. 1970 至 2007 年期间发展中国家和新兴经济体调整后的劳动份额



注：DVP3 = 墨西哥、韩国和土耳其的不加权平均值；DVP5 = 中国、肯尼亚、墨西哥、韩国和土耳其的不加权平均值；DVP16 = 阿根廷、巴西、智利、中国、哥斯达黎加、肯尼亚、墨西哥、纳米比亚、安曼、巴拿马、秘鲁、韩国、俄罗斯、南非、泰国和土耳其的不加权平均值

资料来源：ILO 全球工资数据库；Stockhammer, 2012。

图 33. 1992 至 2008 年期间中国未经调整的劳动份额



注：未经调整的劳动份额用雇员劳动薪酬总额除以增加值计算。2003 到 2004 年之间的剧烈变化可能是数据调整的原因，但这并不影响变化的总方向。

资料来源：ILO 根据《中国统计年鉴》数据计算，

<http://www.stats.gov.cn/english/statisticaldata/yearlydata/> [2012 年 9 月 17 日查阅]。

全球经济危机似乎只是暂时扭转了这一下降趋势。在发达国家，经济危机刚开始时工资份额出现向上反弹，但是自 2009 年又开始下降。这反映出了工资份额典型的“反周期”特征，因为在经济下行时，工资比利润的波动幅度要小。例如，OECD 认为：“在经济衰退过程中，（工资份额）的下降会出现暂停，但随着经济的复苏，这一下降趋势又会重新出现。最近的经济和金融危机及其之后的缓慢复苏也没有偏离这个总体格局”（OECD, 2012b, 第 112 页）。

不同的技能水平造成不同的影响

劳动份额的下降在不同教育程度和技能水平的劳动者之间是不均衡的。针对发达国家的研究表明，如果按不同类型劳动者去分解全部劳动薪酬，就能够发现近期这种下降的趋势是由于中低技能劳动者的工资份额下降造成的。例如，国际劳动研究所（IILS, 2011）对十个有数据的发达国家的情况进行了计算，发现低技能劳动者的工资份额在上世纪八十年代早期到 2005 年期间下降了 12%，同时，高技能劳动者的工资份额却增加了 7%。同样，IMF 也发现在 1980 年至 2005 年期间，美国、日本和欧洲无技能劳动者的劳动份额分别下降了 15%，15%和 10%，但是高等教育水平及以上的技能

工人的劳动份额却分别提高了 7%，2%和 8%（IMF，2007）。OECD 在最近的研究中发现，在有数据的 13 个国家中，受教育水平低的群体的平均工资份额下降了（OECD 2012b）。这种情况发生的背景是工作岗位不断分化，低技能和高技能的岗位数量不断增加，而中等技能的岗位数量越来越少。尽管原则上认为低技能岗位的增加有助于提高低技能劳动者的工资，但是实际上这些劳动者已经越来越多地被具有中等教育水平、资历超过这些岗位需要的工人所替代。

剔除最高收入者

因此，使用联合国国民经济核算体系计算的劳动份额会低估工资在中位数以下劳动者占劳动薪酬份额的下降幅度。如果计算劳动薪酬总额时剔除收入最高 1%的群体，劳动份额下降的幅度则更加突出（见 IILS，2011；OECD，2012b）。这反映出，特别是在使用英语的国家，高级管理人员工资和薪水（包括奖金和已执行的期权）增长强劲。这些人现在与资本所有者同居于收入队伍的前列（见 Atkinson，Piketty 和 Saez，2011；Piketty 和 Saez，2003；OECD，2008；Wolff 和 Zacharias，2009）²²。在日本、荷兰、加拿大、意大利、西班牙和英国等国家中，工资收入在高收入家庭总收入中所占比重也在增长，尽管涨幅各不相同，但是这不包括瑞典、芬兰和澳大利亚（Atkinson，Piketty 和 Saez，2011）。

硬币的另一面：增长中的资本份额

国民收入中劳动份额的下降对应着资本份额（也称作利润份额）的上升，通常以企业的总营业盈余占 GDP 百分比表示。ILO 和 IILS 的研究发现，如果按企业类型来分解资本份额总额，那么金融领域的资本份额增长快于非金融领域。而且，在发达经济体中，非金融企业的利润越来越多地用于支付红利，在 2007 年这部分支出达到了利润的 35%（IILS，2011），迫使企业压缩了增加值中分配给劳动薪酬的比重。

Husson 在分析了四个发达经济体（法国、德国、英国和美国）的情况后发现，1987 年至 2008 年期间，企业增加的营业盈余大部分都用于向股东支付更多红利（Husson，2010）。他计算得出，在法国红利占工资总额的比例由上世纪八十年代的 4%增至 2008 年的 13%。有意思的是，英国红利比例和劳动薪酬比例都在增长，因此高红利是以减少留存收益为代价的²³。在美国，四分之三的企业总营业盈余用于红利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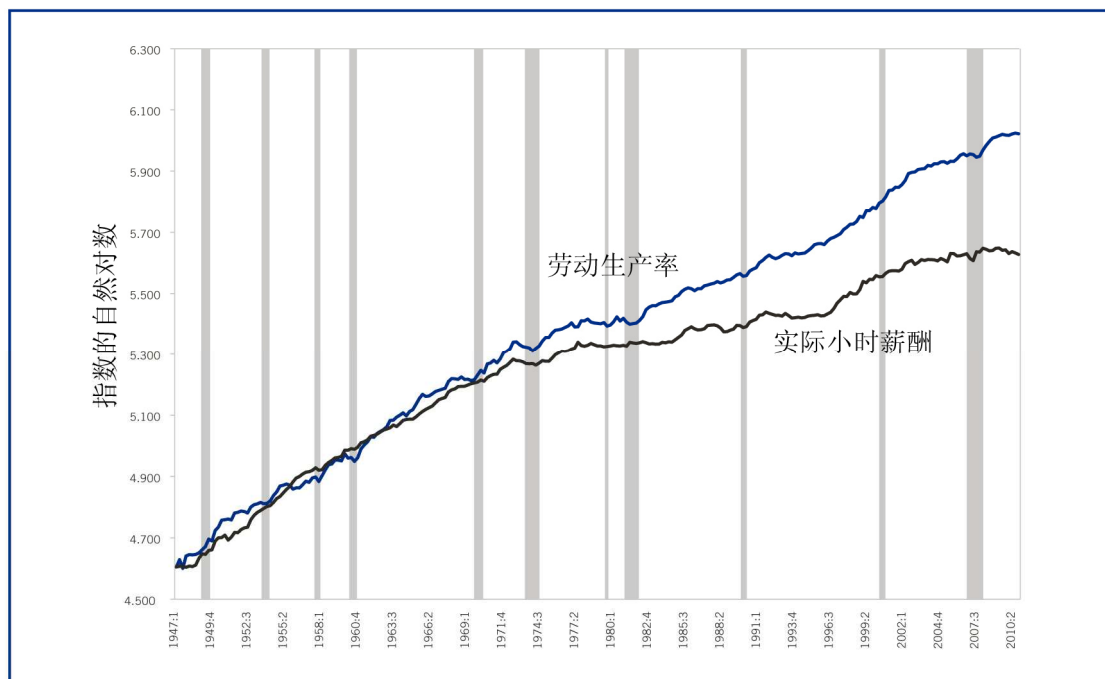
配。由于更关注资本收入而不是劳动收入，不断推高的红利收入往往导致更大的家庭收入不平等（OECD，2011；另见 Roine 和 Waldenström，2012）。

5.2 工资与劳动生产率之间的差距

对劳动份额的影响

劳动份额的萎缩几乎总是伴随着另一个实证规律，即平均工资和劳动生产率二者增速的差距日益扩大（工资、劳动生产率、单位劳动成本和劳动份额之间关系的详细解释见技术附录二）。例如，美国劳工统计局的一份出版物表明，在美国，小时劳动生产率增长率和小时劳动薪酬增长率之间的差距导致了劳动份额的降低（Fleck，Glaser 和 Sprague，2011）。这份研究表明，自 1980 年以来非农企业的实际小时劳动生产率提高了 85%，而实际小时劳动薪酬只提高了 35%（图 34）。

图 34. 1947 年 1 季度至 2010 年 1 季度期间美国小时劳动生产率和小时劳动薪酬



注：阴影部分代表衰退期

资料来源：根据劳工统计局主要行业生产率司发布的最新数字（截至 2012 年 6 月 26 日），对 Fleck，Glaser 和 Sprague 于 2011 年发布的数字重新加工后得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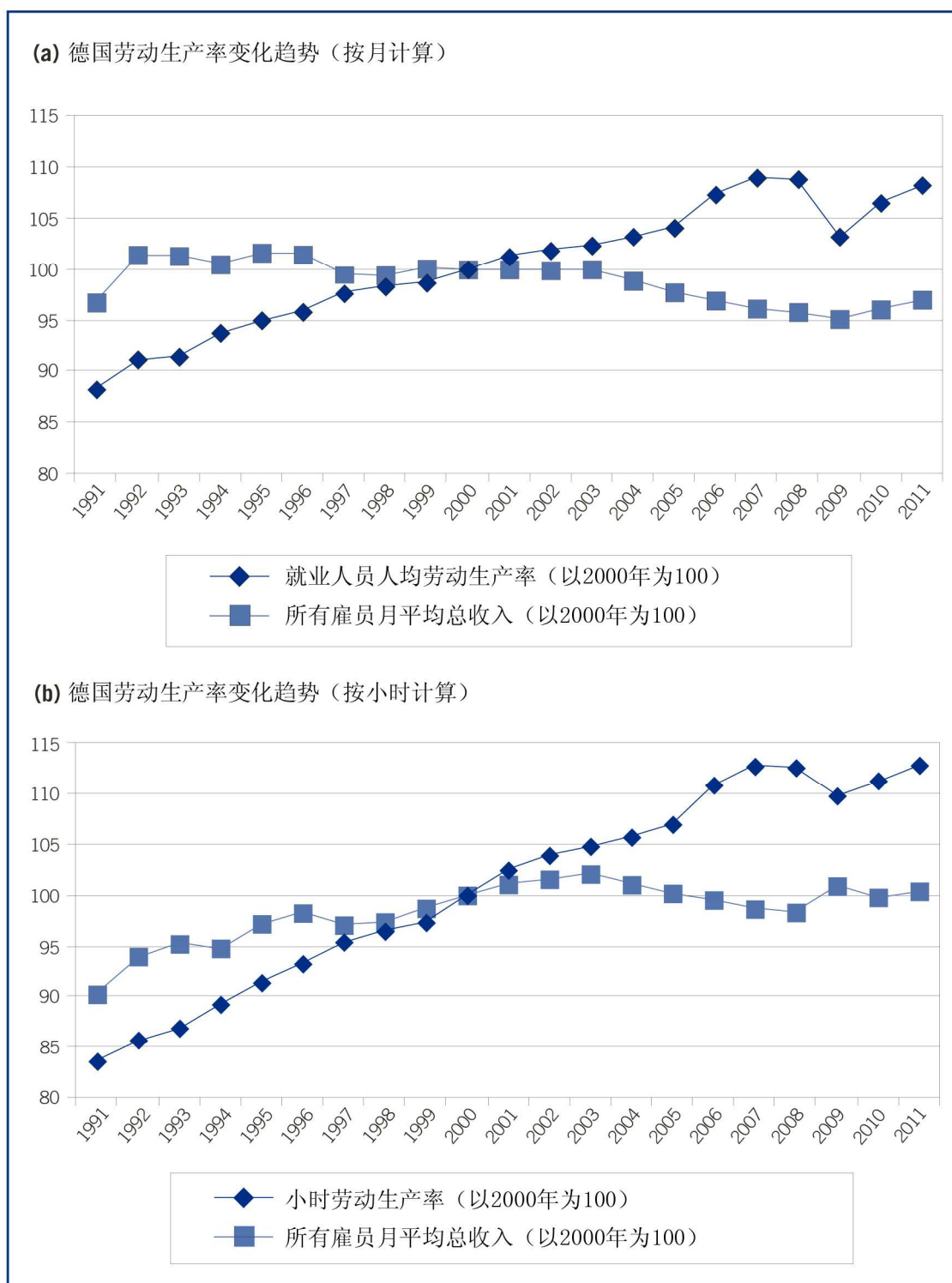
另外一个例子来自德国，过去二十年里劳动生产率（就业人员人均增加值）增长了几近四分之一（22.6%），而月实际工资同期几乎没有变化——实际上，在 2003 年至 2011 年期间，月实际工资反而低于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的水平（见图 35(a)）。月工资的下降，部分原因是兼职和非正规就业（如所谓“迷你工作”）劳动者数量的明显增加而导致的月工作时间急剧减少，从 1991 的 122.7 小时降至 2011 年的 110.7 小时²⁴（见联邦统计办公室 2009，第 8 页）。即使如此，小时劳动生产率与小时工资之间的差别依然是显而易见的（见图 33(b)）。2011 年，小时工资只比 2000 年略高一点点（高 0.4 %），而小时劳动生产率却同期增长了 12.8%。

发达经济体中劳动生产率增长超过工资增长

由于包括美国、德国和日本在内的大多数大经济体都存在工资增长滞后于生产率增长的现象，本报告认为发达经济体的整体平均劳动生产率增长已经超过了实际平均工资的增长。根据 36 个国家的工资数据，我们估计，发达经济体自 1999 年以来平均劳动生产率的增長是平均工资增长的两倍多（图 36）。

图 35. 1991 至 2011 年间德国劳动生产率和工资的变化趋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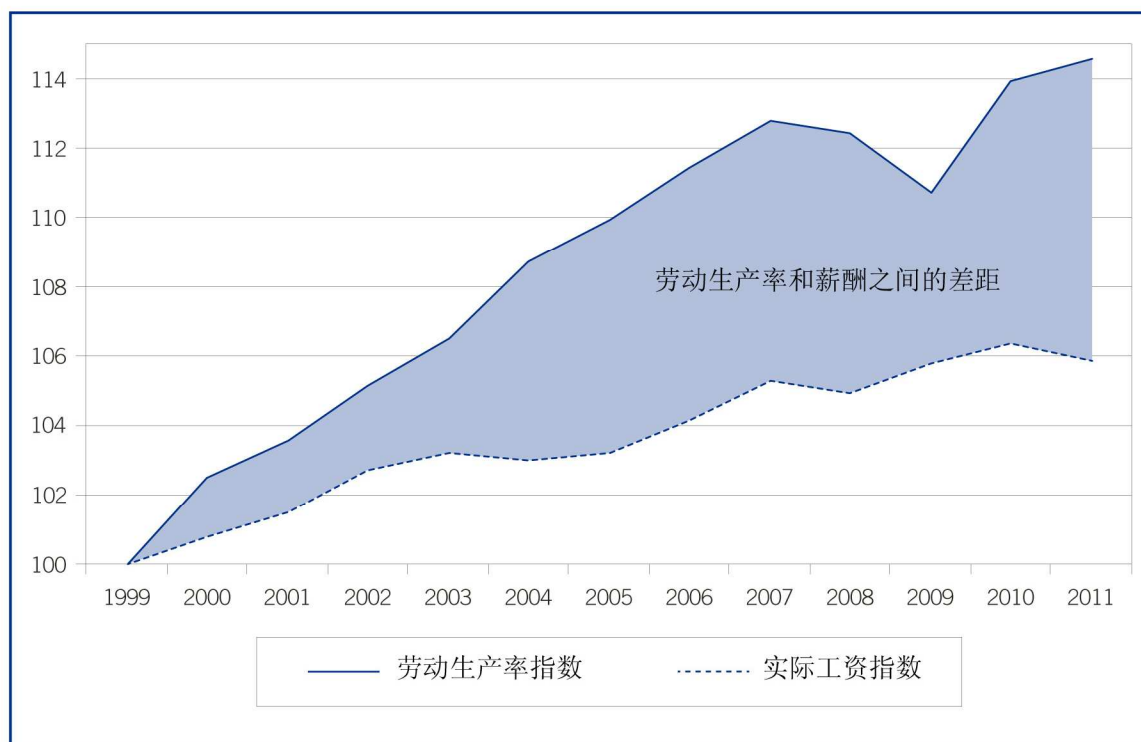
(a) 按月计算；(b) 按小时计算



注：联邦统计办公室发布的名义月平均工资和小时工资在使用该办公室发布的 CPI 调整后都有所减少。

资料来源：联邦统计办公室，国民经济核算：国内生产、季度数据，Fachserie 18, Series 1.2 (2012 年 5 月)，表 1.12；联邦统计办公室，2012。

图 36. 发达经济体平均工资和劳动生产率增长的变化趋势（以 1999 年为 100）



注：由于这些数值是加权平均数，三个最大的发达经济体（美国、德国和日本）对计算结果有重大的影响。劳动生产率是指劳动者人均产出（见尾注 9）。

资料来源：ILO 全球工资数据库；ILO 趋势计量经济模型，2012 年 3 月。

5.3 金融市场和其它因素的作用

寻找背后的原因：技术、全球化和劳动力市场制度

许多研究都发现了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劳动份额下降的现象并试图挖掘其原因。（例见 IMF，2007；欧盟委员会，2007；OECD，2012a；ILO，2008a；ILO，2010a；IILS，2012）。

上一期《全球工资报告》也分析讨论了一种可能性，就是劳动份额的变化是就业从劳动密集型转向资本密集型产业的综合作用结果，而资本密集型产业的劳动份额更低。分析表明，产业构成的变化的确是一个影响因素，但更多的劳动份额下降却是由于行业内部劳动份额下降造成的（ILO，2010a）。OECD 最近的研究也证实了这一发现，指出“1990 年至 2007 年期间劳动份额的下降绝大多数是行业内部劳动份额的下

降造成的”（OECD，2012b，第 119 页）。金融中介行业、高中端技术制造行业都出现大幅的下降，而其它服务领域、建筑业和低技术制造业的下降却不明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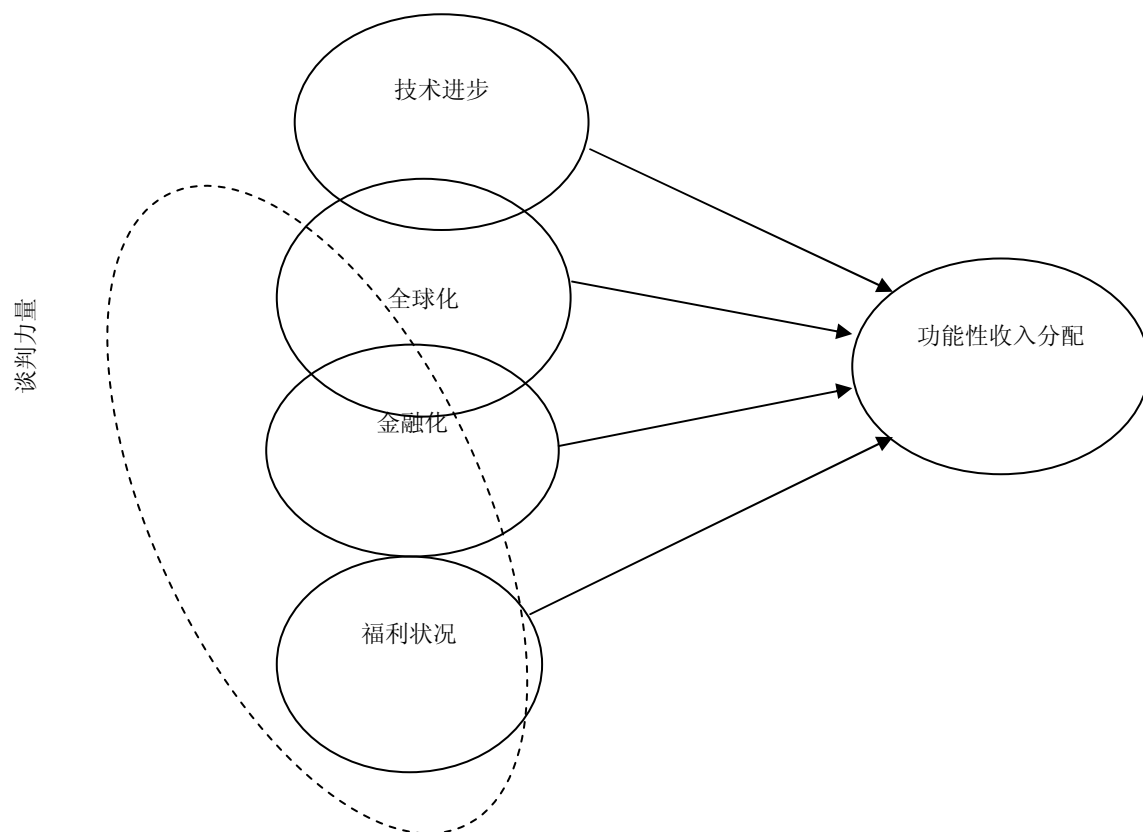
新的证据：再看“常见嫌犯”

本报告继续深入提供了一系列新的实证素材。图 37 反映了造成劳动份额下降的几个“常见嫌犯”：技术进步、全球化、金融市场、劳动力市场制度建设以及集体谈判力量的下降。在我们的示意图里，技术进步、全球化和金融市场相互交迭，反映了无论是在概念层面还是在实证层面对这些影响因素进行区分都存在难度。图形的结构也表明，劳动力的谈判力量既直接受制于劳动力市场制度建设（特别是工会的存在和它的力量强弱），也受到全球化和金融市场的影响，这二者使企业有更多的机会投资于国内外金融资产以及房地产行业（Rodrik，1997；Onaran，2011）。事实上，有很多研究在关注全球化，特别是技术进步的影响同时，却忽视了金融市场的潜在影响以及劳动力规模减小和社会制度等因素的作用。

通常认为，技术进步应对劳动份额的降低承担主要责任，因为技术“增强的是资本而非劳动”，它增加了对资本及相应的高技术劳动力的需求，而减少了对低技术工人的需求（参见 IMF，2007；欧盟委员会，2007；OECD，2012b；IILS，2012）²⁵。一个标准假设是，信息和通信技术（ICT）的传播促进了生产自动化程度，从而加快了生产率的提高和低技能工人的替代步伐。OECD 最新的研究估计，技术进步和资本积累对 1990 年至 2007 年期间发达国家行业间劳动份额变化的平均贡献率达到 80%（OECD，2012b）。

多项研究还发现，全球化对劳动份额存在负面影响，但是这种影响并不显著。一个可能的原因是，竞争加剧以及劳动力充裕国家进入全球市场都会起到缓和工资份额的变化的作用（ILO，2008a）。在一本国际劳工组织和世界贸易组织的联合出版物（Bacchetta 和 Jansen，2011）中披露了来自企业层面的最新事实，这些事实表明贸易自由化使竞争加剧，促使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企业都竞相通过“产业合理化”途径，关闭最低产能的企业，解雇剩余企业的劳动者，来提高企业生产力。还有，离岸生产和即使不变更实际生产地也有可能产生的所谓“威胁效应”都有可能造成从劳动向资本的重新分配（Epstein 和 Burke，2001；亦见 Messenger 和 Ghosheh，2010，关于服务领域的离岸生产和外包）。

图 37.影响劳动收入份额的因素



资料来源：Stockhammer，2012。

重新审视金融化

金融市场的全球化和“金融化”——其定义是在国内国际经济运行中金融动机、金融从业者和金融机构所发挥的作用不断增长（Epstein，2005）——最近才出现在大众的视野中。IILS 的一份报告发现，各金融市场在国际层面的相互融合是导致工资份额下降的主要力量，至少在发达经济体是这样（IILS，2011）。上世纪八十年代以股东利益最大化为基础的公司治理结构转变，以及一批积极以回报为导向的金融机构的兴起，包括私募股权基金、对冲基金和机构投资者等，都迫使企业追求利润，尤其是短期利润（Rossmann，2009；Lazonick 和 O’ Sullivan，2000；Stockhammer，2004；亦见 IILS，2008；Hein 和 Schoder，2011；Argitis 和 Pitelis，2001）。另外，正如前文指出，金融全球化可能还削弱了劳动者的集体谈判力量（Rodrik，1997；Onaran，2011）。一些劳动者群体，尤其是高管阶层，以养老基金或其它资本

收入的形式获得延期报酬，从而在“金融化”过程中受益。而对于普通劳动者来说，从这些形式中受益的程度和受益人员数量都是极其有限的。

劳动力市场制度建设：抑制集体谈判力量？

目前的文献研究中对劳动力市场制度建设和社会福利的范围等因素造成的影响也存在诸多争议。这些制度性因素包括工会入会率、最低工资立法、失业救济政策及其覆盖面、解雇赔偿金以及政府消费支出等。许多发达国家工会入会率（工会成员占全部雇员或全部就业人员的比重）的下降总是与工人集体谈判力量的弱化联系在一起，使工人们没有足够的能力通过谈判在劳动薪酬中争取到更大的一块“蛋糕”。最低工资标准和其他“调解”制度，包括就业保护立法、失业救济和其它社会福利和相应缴费制度（“税收楔子”），都是实证研究中会分析到的制度性因素（IMF，2007；欧盟委员会，2007；OECD，2012b）。例如，失业救济水平可能通过影响工人的“保留性工资”，即劳动者能够接受的最低的水平工资，进而影响劳动份额的变化。

深入分析

本报告通过提供新的内容补充和发展了现有的研究。我们的分析数据来自于最新的 ILO 全球工资数据库和其他补充性数据来源²⁶，覆盖的国家更多、时间跨度更大。研究涵盖了 71 个国家的年度数据（28 个 OECD 经济体，3 个非 OECD 高收入经济体，27 个新兴经济体和 13 个发展中经济体），时间跨度从 1970 年到 2007 年。尽管 2007 年至 2009 年间的历史数据也可以查到，但为了避免经济危机时期的数据对长期历史趋势产生的结构性影响，这些数据被排除在外，而且我们的研究焦点是集中于对危机前长期历史趋势的关注。图 37 介绍了我们进行估算时所使用的因素分析模型。技术附录 III 分步介绍了估算的具体方法，并总结了主要的回归结果。附录中也列出了报告涉及到的国家。

我们对模型中影响劳动份额随时间变化趋势的各种因素进行了分解，图 38(a) 中显示了分解各因素的影响后所得到的结果。分解的方法是将每一个因素分为两个特定阶段（1990/1994 和 2000/2004），对各因素在这两个阶段的变化进行加权，权数是特定模型中（见技术附录三中的表 A4）的估算系数。对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分解估计分开进行。图 38(a) 显示，所有因素都对发达国家长期以来劳动份额降低存在影响，而全球金融化产生的影响最为严重。根据这个结果，从对劳动份额下降的相对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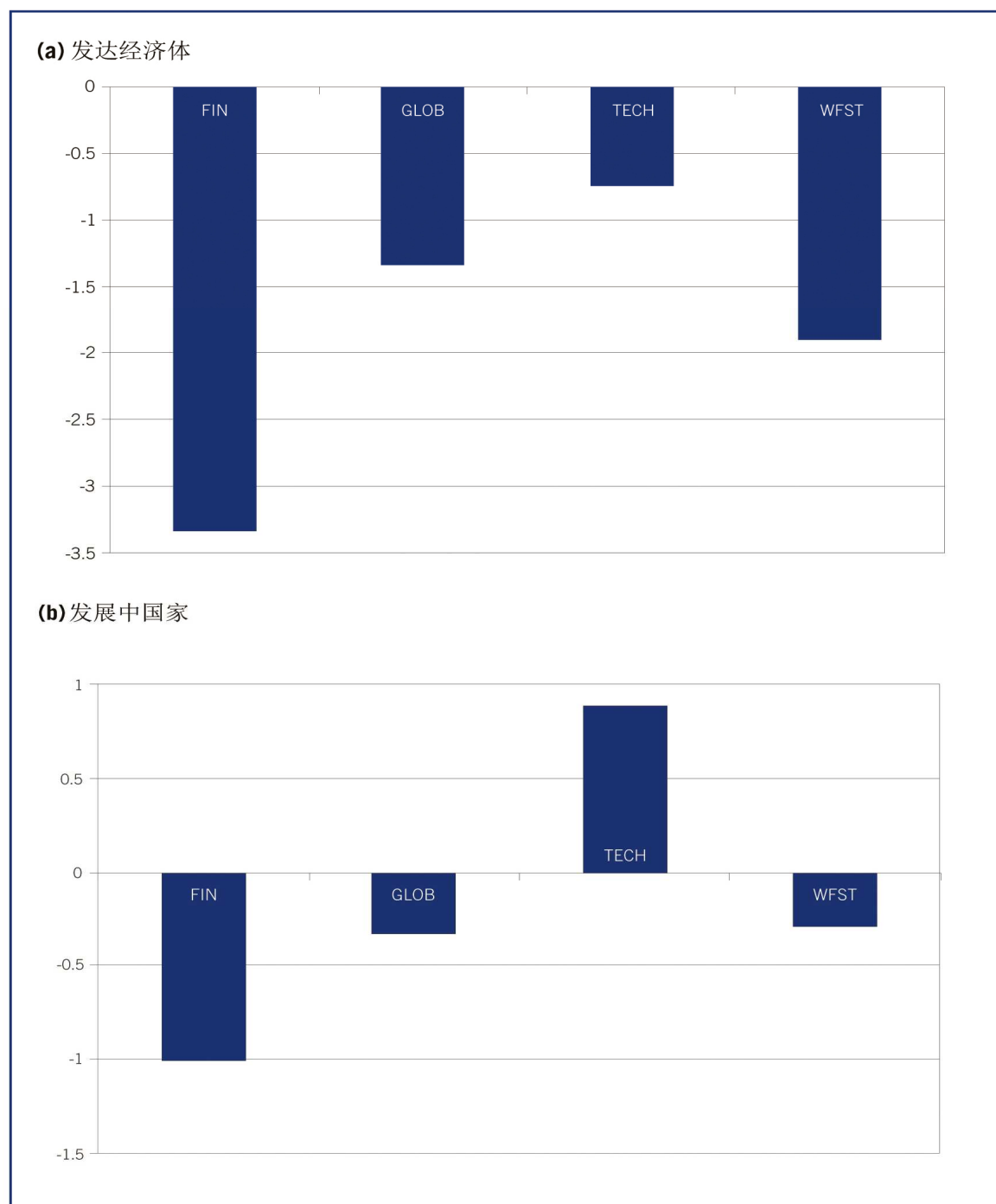
献率来讲，全球金融化的贡献率达 46%，全球化的贡献率为 19%，技术进步的贡献率为 10%，两项制度变化（政府消费和工会入会率）贡献了 25%。这些结果表明，许多过去的研究可能低估了金融的影响力，这意味着忽视金融市场的作用可能会对我们如何理解劳动份额的变动原因产生重大影响。

制度性因素给劳动份额带来了负面影响，对此的一个可能解释是，发达经济体政府平均消费支出在 GDP 中所占比重减少，以及工会入会率下降。换句话说，尽管各个变量（见表 A4）中，政府消费支出和工会入会率会对劳动份额的贡献系数呈正值，暗示二者的增加对劳动份额有正面影响，但是由于在现实生活中政府消费支出和工会入会率都是下降的，从而造成了劳动份额的下降。另一方面，金融化、全球化和技术进步长期以来都有大幅提高，因而给这两个时期内劳动份额的变化带来了负面影响。

我们再来看发展中国家的情况，图 38(b) 显示了技术进步对劳动份额的影响是正向的，这可以部分理解为收紧劳动力市场、挤出过剩劳动力带来的经济发展“追赶”效应。技术进步的这种影响部分化解了金融化、全球化和福利水平缩水造成的负面影响。尽管如此，正如对发达经济体分解的结果一样，对于我们样本当中的发展中国家而言，金融化仍然是造成劳动份额下降的唯一的最大负面因素。

除了这些因素以外，失业扩大也对劳动份额的变化产生了较强的负面影响。由于高失业率的出现必定会对工资产生下行压力，削弱工人的谈判力量，这个结果并不足为奇（见技术附录三）。

图 38. 1990 至 1994 年间和 2000 至 2004 年间各因素分解后给调整后平均劳动收入份额变化造成的影响



注：分解是根据表 A4 的中估计做出的。FIN 代表“金融化”；GLOB 代表“全球化”；TECH 代表“技术进步”；WFST 代表“福利政策和劳动力市场制度建设”。详细的分解步骤参见技术附录三。

资料来源：ILO 的估算 (Stockhammer, 2012)。

6 劳动份额对经济增长的影响

6.1 劳动份额和总需求下降：影响不确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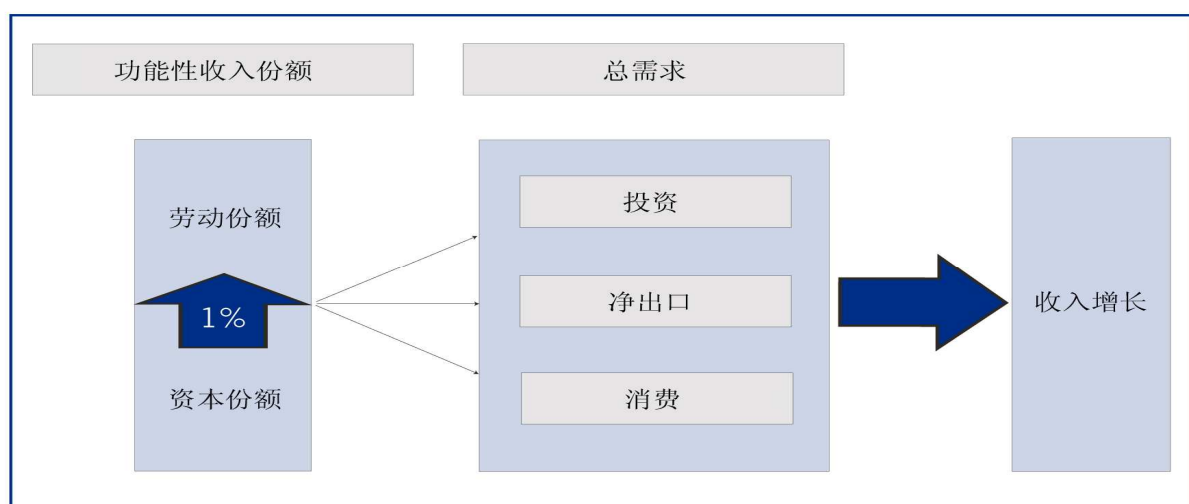
公平与经济学：劳动份额下降会带来什么？

由于各要素份额（资本份额和劳动份额）将收入与生产活动联系起来，因而常被视为衡量收入分配公平与否的指标。同时，正如 Atkinson 所言，要素份额是集体谈判中的关键议题，收入的合理分配意味着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应当反映在劳动薪酬的增长上（Atkinson, 2009）。也有评论认为劳动份额的减少会带来政治上的后果²⁷。

分析对总需求的影响

尽管这些都是重要的问题，但报告的这一部分重点分析劳动份额下降对经济产生的影响。我们特别要强调的是，劳动份额的下降对于一个经济体中构成产品和服务总需求的各个组成要素的影响是有差别的。总需求是家庭消费、私营部门投资、净出口和政府消费支出的总和。图 39 展示的经济运行机制表明，功能性收入分配两个构成部分（劳动份额和资本份额）的转换影响了总需求的核心要素，最终这些变化通过动态过程影响了国民收入的增长。

图 39. 功能性收入份额对宏观经济的影响



来源：ILO。

但是劳动份额的下降究竟是如何影响总需求的呢？到目前为止对这个问题的关注还比较少，也还没有一个简单的答案。我们研究了过去四十年里（上世纪六十年代至2000年代）可观察到的劳动份额变化和总需求各组成要素变化之间的关系，这些要素即消费、投资和净出口²⁸。我们把研究限定在数据资料比较完备的15个G20国家，另外把12个欧元区国家作为一个组。估计劳动份额对总需求影响的方法以及详细的结论详见技术附录四，主要结果见表2²⁹。

表 2 16 个经济体中劳动份额下降 1%对国内生产与服务中的私人消费、投资和净出口的影响

	私人消费	投资	净出口
欧元区	↘	↗	↗
阿根廷	↘	→	↗
澳大利亚	↘	↗	↗
加拿大	↘	↗	↗
中国	↘	→	↗↗
法国	↘	↗	↗
德国	↘	↗	↗
印度	↘	→	↗
意大利	↘	↗	↗
日本	↘	↗	↗
墨西哥	↘	↗	↗
韩国	↘	→	↗
南非	↘	↗	↗
土耳其	↘	→	↗
英国	↘	↗	↗
美国	↘	→	↗

来源：Onaran and Galanis, 2012 即将出版

消费下降, 出口上升, 投资不确定

这个表反映劳动份额每下降 1%一定会导致所有 15 个国家和欧元区 GDP 总额中私人消费比例的下降; 相反, 劳动份额每下降 1%, 所有国家 GDP 总额中净出口的比例都上升, 特别是中国(用两个箭头表示)这个明确实行出口导向型增长战略的国家。劳动份额和投资之间的关联不太明朗。劳动份额每下降 1%, 在 9 个国家和欧元区表现为 GDP 中投资份额的提高, 但是对于 5 个新兴经济体和美国无法观察到可理解的变化。

由于劳动份额与单位劳动成本(每单位产出所消耗的劳动成本, 这种关系详见技术附录一)这两个概念之间存在紧密的关联, 所以劳动份额降低对出口的正面影响可能并不令人意外。单位劳动成本下降总是被认为有助于改善外部成本竞争力, 特别是在欧元区里, 成员国不能擅自贬值货币或调节利率, 因而只能以降低单位劳动成本作为恢复经济增长和创造就业岗位的重要途径。正是这个原因, 希腊决定将最低工资降低 22%, 青年劳动者的最低工资在此基础上再降 10%, 并同时削减 5 个百分点的非工资性成本(社保缴费)(见本报告第一部分)。同样道理,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对葡萄牙、塞尔维亚和拉脱维亚的援助项目中也有类似内容, 尽管不是那么激进³⁰。

私人消费和劳动/资本份额

然而, 只关注降低单位劳动成本, 就会忽略工资下降对家庭私人消费的总体负面影响, 以及对总需求造成的不确定的影响。从资本份额向劳动份额的收入再分配对消费带来的积极影响可能会上升, 因为劳动薪酬的消费支出倾向一般高于资本收入的消费支出倾向, 因为后者主要是以红利形式再分配给较高收入人群, 而这一人群会储蓄起较高比例的收入。当然, 也应该意识到, 利润的绝大部分是流入了公司的口袋, 公司只把其中一部分用于分红, 而把留存盈余用于产生未来的劳动收入。同时, 相当一部分红利是投入到养老基金, 用于将来支付养老金, 而这些养老金也会被用于消费。此外, 国家对资本收入征税并进行转移支付, 也是消费的重要决定因素。尽管关系如此错综复杂, 我们仍发现劳动薪酬和家庭消费之间是正相关关系。

投资: “实体经济”的源泉

劳动份额与投资之间的联系更为不明朗。原则上可以预期, 较高的资本收入可以促进生产投资, 在大多数国家看起来似乎也正是如此。但是, 也有研究认为, 金融化

抽干了企业原本可用于实体投资目的的内部金融资产，企业可能会为了抬高股价和增加股东价值而提高分红比例，或者为了追逐短期利润最大化而进行风险较高的金融投资。这两种行为可能都已经对“实体经济”的股本投资产生负面影响³¹。在新兴经济体中，对于企业利润和总投资之间缺乏联系的一种可能解释是，公共产业政策和公共投资占据主导地位，成为基础建设和产业发展的主要驱动力（Akyuz et al., 1998）。当然这一假设还需要再进一步的研究。

劳动份额和总需求：微妙的平衡

总体上讲，我们的结论强调劳动份额的变化与总需求和收入增长之间存在不确定的关系。在一些国家，在某种情况下，相对于劳动生产率来说比较低的工资增长率能带来净出口、国内资本投资和国民收入的增长³²。在其它国家以及其他情形下，低工资增长和劳动份额下降可能抑制国内消费，以至于净出口和/或投资增长的效果不能补偿总需求和收入增长的下滑。而这两种结果都有可能出现，这表明国民收入在劳动和资本之间的功能性分配对一个国家整体经济表现的影响并不确定。这一现象要求决策者必须密切关注工资与劳动生产率之间的变动关系，研究其对国民收入的影响。那种认为工资调节对经济发展总是有利的假定会产生误导。

6.2 追求最佳的劳动份额

国家及全球策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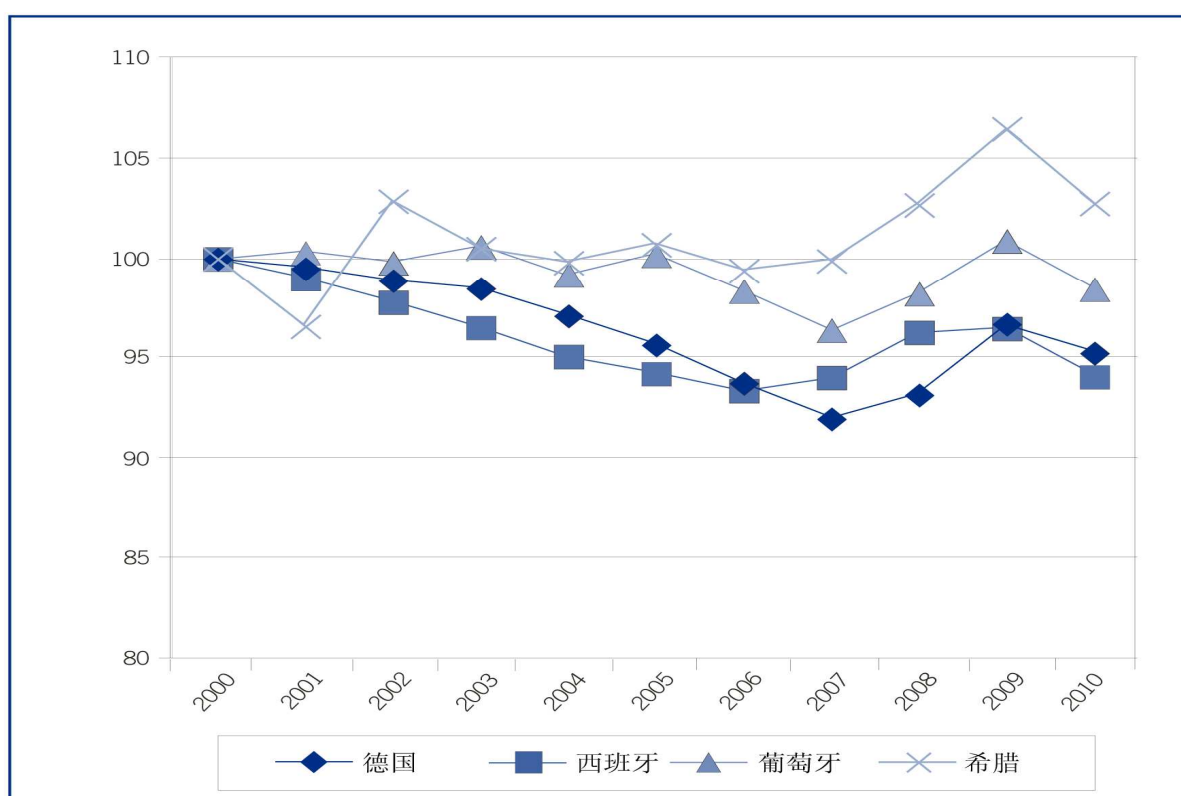
由于功能性分配份额对经济增长影响的不确定性，使得我们难以分析一个国家劳动份额变化所带来的净影响。这个净影响肯定是因国家而异，在一定时期内可能也会因内外部环境的差别而有所不同。在一些国家和一定时期，收入从资本份额向劳动份额进行再调整会促进国民收入的发展，但在另外一些国家和换另外一段时期，可能作用是相反的。在某些特定国家，劳动份额变动的净影响必然取决于国际环境和其它所有国家彼时采用的策略。

出口驱动的增长

近年来，许多国家采用降低单位劳动成本、以出口增长带动经济发展的策略。出口驱动型增长的典型例子是中国和德国，阿根廷、加拿大、日本、印度尼西亚、韩国

和俄罗斯或多或少也存在这种现象。2000 至 2008 年期间，所有这些国家都维持了贸易顺差。中国仅凭庞大的贸易顺差就保证了年均经济增长率超过 2.5%，占到了其总体经济增长率（表现为非常突出的个人家庭消费的增长和投资增长，特别是投资的增长）的四分之一。再看德国，年均经济增长率要低很多，个人消费几乎没有增长，而出口顺差占到其经济增长的 1/3 到 1/2。中国的出口增长得益于非常有竞争力的汇率。而德国作为欧元区国家，并不能单方面使其货币贬值，其出口顺差是通过低通胀和低于其它欧元区国家的实际单位劳动成本实现的（图 40）。

图 40. 2000 至 2010 年期间部分欧元区国家的单位劳动成本（以 2000 年为 100）



资料来源：根据欧盟统计局的数据计算。实际单位劳动成本是用当前价计算的雇员人均薪酬除以以当前价计算的就业人口人均 GDP。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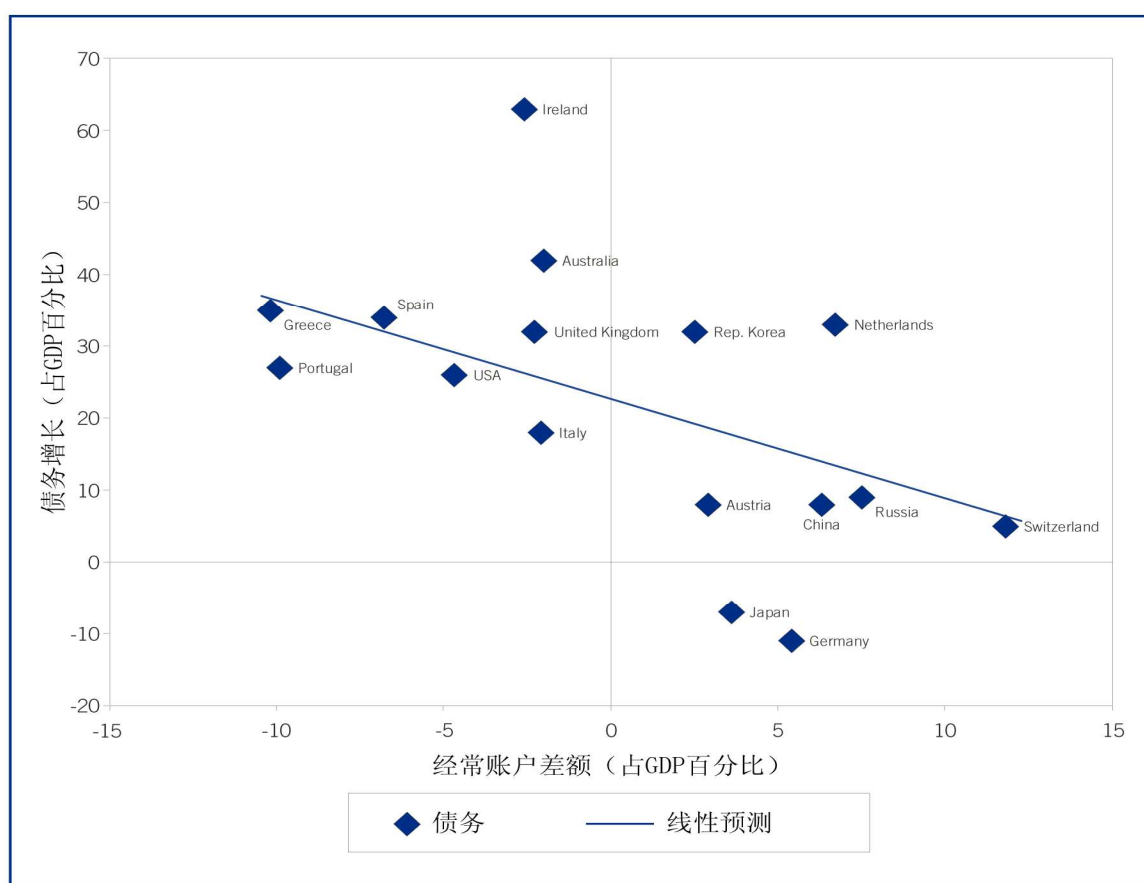
债务驱动的增长

一个国家的顺差就意味着另一个国家的逆差，不是所有国家都可以走中国和德国的道路。出口导向型的增长要求一些国家经常账户有高盈余，因此其他国家就会有赤字。在新世纪转折时，世界上一些主要“需求引擎”的消费水平飙升并不是源自工资的增长，而是建立在家庭债务猛增的基础上的。特别是在美国，工资中位数停滞和消费增长强劲并存，这只能是以财产和债务融资为支撑的消费。股票市场的繁荣和住房

价格上涨都促进了（名义）财富的增长，因而促进了消费信贷和抵押融资型的消费³³。此外，金融规则的调整、新金融工具的出现（信用卡债务、房屋净值贷款）、抵押债务证券化导致的信用标准恶化等等，尤其使得低收入低财产家庭获得了更多的银行贷款。家庭负债因而替代高工资，成为消费和需求的重要来源。

债务驱动型的增长支撑了经济危机前世界经济的增长。若不是通过债务消费的方式弥补了收入最低的 99% 美国人劳动份额下降的后果，世界经济增长的放缓或暂停可能会出现得更早。这种债务驱动型消费带来的繁荣并不只是出现在美国，也多多少少出现在英国、澳大利亚以及欧元区所谓“援助经济体”（希腊、爱尔兰、葡萄牙和西班牙）。图 41 表明在部分信贷市场门槛普遍较低的发达国家，经常账户赤字与较高的家庭负债有密切关系，这说明金融化通过引导资金进入家庭负债以满足消费需求而导致了外部的不均衡。

图 41. 2003 至 2010 年部分国家经常账户差额和家庭债务的变化情况



注：经常账户差额以 2003 至 2010 年期间的平均值计算。家庭债务的增长是以 2000 至 2008 年期间的平均值计算，其中，爱尔兰数据开始于 2001 年，瑞典数据为 1999 年至 2007 年。散点图中的线是基于 16 个观察值，可能不足以产生一个统计上可靠的估计值。

资料来源：Lavoie 和 Stockhammer, 2012, 表 13。

需求拉动的增长

其他的国家都走一条更均衡的需求拉动型的增长道路，工资的增长与生产率的增长，而不是家庭债务增长同步。法国（以及美国 and 英国）的增长由国内需求拉动。净财富收入比例和居民财产价格同时上升。但是与美国和英国不同的是，在法国，内需几乎完全是由于与生产率同步上升的工资增长带来的，而不是依赖于债务融资式的消费需求。总的家庭债务占收入比例只有小幅增长，私有家庭部门财务余额保持为正，整个私有部门的财务余额表现也是如此。在新兴经济体中，巴西可能是表现最突出的，劳动份额和国内需求对实际 GDP 增长的贡献率都是上升的。

但是，在以工资为基础的消费类型以外，巴西也还是存在债务推动型消费的迹象（Bruno, 2011）。原因在于巴西获的工资收入者普遍具有非常高的消费倾向：研究表明多数工资收入者会把全部工资都花掉，使得个人储蓄存款几乎全部来自于最高收入群体创造的利润。同时，通过金融化的作用，巴西经历了贷款的扩张期，降低了一般家庭的平均储蓄倾向。政府保持低利率以鼓励投资的政策也在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这样的环境条件使那些愿意进行资本投资的人受益，同时也使债务累积，从而刺激了以消费为主体的经济增长。

6.3 “大衰退”和更均衡增长的机会

以上不同的经济增长模式可能在某些国家和某些时候会发挥作用，但是近来的实践表明，债务推动型的消费无论是在国家层面还是在全球范围内都是不可持续的。债务推动型的增长带动了家庭债务水平的提高和金融部门的工资和风险过高。此次危机及其后痛苦的复苏过程已经显示出这种增长模式的局限性：不仅带来了内部的不均衡，而且也由于一些国家经常账户下较高的（或不断增加的）盈余意味着其它国家要处于赤字而加剧了全球的不均衡。

在闭环的全球经济环境中开展竞争

下一步应当怎么办？在许多情况下，对那些经济危机前具有高额经常账户赤字和家庭债务的经济体的政策建议是，组合使用紧缩政策和工资稳定（或工资削减）政策以提高净出口。这种建议是基于这样一种假设，即单方面下调劳动成本可以重塑一个

国家的竞争力。但这种做法能够发挥多大作用并不确定，因为竞争力并不仅仅依赖于劳动成本，也依赖于一系列的其它要素，如这个国家是否能够生产出更多元化、更高端的产品（Felipe 和 Kumar，2011）。另外还存在一个集体行动的问题：虽然单一国家原则上通过出口能提高其产品和服务的总需求，但不是所有的国家都能够同时做到这样。世界经济整体上是一个闭环经济。如果大量的国家都同时实行工资削减或工资稳定政策，竞争力的提高效果将被抵消，而全球性工资削减造成的消费下降反过来还会抑制全球的总需求。那些拥有经常项目盈余的国家仍有余地刺激国内需求增加。

此外，降低单位劳动成本的建议是基于这样一种共识，即实现经常项目盈余的国家是由于成功实施了出口导向型战略，而以债务驱动增长的国家则因为失去了出口市场的竞争力，其结果是只能依赖债务推动消费增长。这对于希腊和西班牙这些经历了经常账户高赤字的国家来说确实如此。然而，惊人的是，尽管在这样的情况下，他们的实际出口价值仍然是增长的。真正导致这些国家经常账户表现恶化的原因是 2003 年到 2008 年期间进口激增，以及所谓的经常帐户“要素收入”带来的负面冲击：即来自于国外投资者的服务性贷款和给予外国投资者的信用贷款。进一步削减单位劳动成本不可能解决这部分经常账户的赤字问题。

第三部分 对公平增长的启示

7. 内部和外部的不均衡

《全球工资报告》丰富了国家内部与国家之间分配关系和工资水平变化的文献资料，还研究了这些变化趋势的经济和社会内涵。该报告得出了一些程式化的事实。报告的主要结论之一是劳动份额呈不断下降趋势，个人收入分配不平等日益加剧。

7.1 功能性和个人收入分配

劳动者分到更小蛋糕

功能性收入分配方面，关注国民收入在劳动和资本之间的分配。本报告表明许多国家都存在工资薪酬的份额下降而利润的份额上升的长期变动趋势。这也再次证实了《2010/11 全球工资报告》(2010a)的结论，即自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24 个发达国家中有 17 个国家的劳动份额都呈现下降趋势，OECD 的《就业展望》(2012b)也反映，自 1990 年以来 30 个国家中有 26 个国家都存在相同的趋势。这说明绝大多数国家工资增长和生产率增长之间都存在矛盾。

最高工资收入者和最低工资收入者之间的差距在不断加大

个人之间的工资分配也日益不平等。1995 至 1997 年间，31 个国家中有 23 个国家工资收入最高 10%和最低 10%人群之间的收入差距在拉大（ILO，2008a），37 个国家中有 25 个国家的低工资劳动者（界定为在工资中位数 2/3 以下的人群）的比例上升（ILO，2010a）。再考虑上其它收入来源，如税收、转移支付等，那么这种越来越不平等的势头仍很强劲。

7.2 工资性消费下降，影响了经济的复苏

已对消费产生了抑制作用。一些国家消费的持续增长依赖于家庭债务的增长。也有一些国家在外部寻找解决途径，如利用出口盈余来弥补国内需求的疲软。但是，最终，依靠放松信贷的方式并不可持续，而赤字国家想要凭借贸易盈余来实施出口导向型增长战略也必须配合推行债务导向型的消费战略。

这些不均衡性在此次经济大衰退之前就已经显现。但是此次经济危机对这些外部、内部不均衡性的影响还没有完全暴露，没有理由过于乐观。2008 至 2011 年间发达国家的平均工资已经下降。经常账户出现赤字的危机国家削减劳动成本带来了经济风险：除非盈余国家能够依靠工资消费更多的国内外产品，否则只能看到经济停滞期延长，甚至衰退的后果。

紧缩和衰退的风险

至于内部的不均衡，紧缩计划和经济下行期延长不可能改善个人工资和收入的分配状况。尽管劳动份额在经济危机初期短暂反弹，但在 2009 年以后又开始下降。同时，也有迹象表明，危机可能进一步加剧不平等。美国 2010 年至 2011 年间收入不平等是 1993 年以来的最大记录，“有工作贫困”的数量在 2011 年占到了所有劳动者的 7.2%，而这一比例在 2007 年只有 5.7%（美国普查局，不同年份）。在欧洲，超过 8% 的有工作人口面临贫困的风险，根据欧盟委员会《2011 年欧洲就业和社会发展》(2012c) 可被界定为“有工作贫困”。

这些情况不仅对经济的稳定和增长产生了影响，也对社会公平的理念提出了挑战，破坏了社会和谐。不平等的分配和收入向高收入者和资本拥有者集中成为全球范围内公众不满的根源，加剧了社会动荡和社会不稳定的风险。在发达经济体中，还降低了公众对紧缩计划和财政紧缩政策的接受程度。在发展中国家，食品和能源价格的上涨，使底层工资收入者的购买力受到了冲击，因而激发了大量的罢工和抗议。

8. 重新建立工资和生产率之间的联系

8.1 统一政策措施

下一步应该采取什么措施呢？我们的分析表明应当在国家层面和全球层面共同采取行动，努力实现“再均衡”。各国决策者要避免认为能够寻找到摆脱危机的“捷径”的简单思维，而应当努力建立劳动生产率增长和劳动者薪酬增长之间的政策联系。一些国家的经常账户存在的大规模顺差，正表明其有条件采取措施，特别是通过加强工资和劳动生产率之间的联系，来刺激国内需求增长。但债务国家和欧元区国家应注意不要使劳动份额的“逐底竞赛”加速。不加限制地追求劳动成本优势以获得经济竞争力不利于经济创新和升级，而创新和升级才构成了市场经济的关键动力。来自外部和周边社会伙伴的紧缩措施会破坏有效的劳动关系。因此，为了创造实现“内部再均衡”的有利环境，避免做出低水平的选择，强烈建议开展全球层面的政策磋商。

8.2 加强现有制度

“内部再均衡”可以自强化工资决定机制开始。本报告强调，工资决定机制的弱化以及由此带来的劳动者谈判地位的下降已经破坏了功能性收入分配和个人收入分配的格局。因此，为了经济效率和社会稳定，应当采取措施，重新平衡谈判力量。特别是在当前劳动力市场分割不断加剧和技术变革加速的背景下，将劳动者组织起来更有难度，需要为集体谈判提供更多支持和更有利的环境条件，使工人们能够要求在经济产出中得到公平的份额。同时，还应注意到，这些工人，尤其是低工资工人，承担了更多的不平等的后果，在工资决定时需要更多的保护。确定合理的最低工资标准，是一个有效的政策工具。它能够提供一个体面的地板工资，为劳动者自身和家庭获得基本的生活保障。正如最新的《世界发展报告 2013：就业岗位》（世界银行，2012）所述，过去严重高估了集体谈判和最低工资对就业和其它劳动力市场表现的消极影响，应当关注如何更好地设计这些制度，来提高制度的效率。

8.3 劳动力市场之外的思考

金融监管

我们报告的结论清晰地表明，仅通过劳动力市场政策不足以达到收入分配的“再均衡”。正如其它研究中提到的（OECD，2011 和 2012a；IILS，2011 和 2012），不平等不断扩大的一个重要原因是那些使“金融全球化”不受制约的政策。金融化诱使企业追逐短期利润最大化，把内部的金融资源从实体投资转向高风险的投机性金融投资。没有监管的金融市场不仅加剧了不平等，而且带来了不满意的和不稳定的经济表现。因此，收入分配的“再均衡”要求对金融部门进行更好的监管，恢复其引导资金进入生产性和持续性投资的作用。

税收和社会保障

实现“再均衡”还有许多重要的维度值得深入研究。税收也是其中一个方面，也是存在大量争议的题目。在许多国家，目前的税收政策，相对来说，对资本收入比对劳动收入更加宽松，增加了雇主的劳动成本压力，也影响了劳动者实际得到的收入。另一个不容忽视的领域是社会保障和收入政策。我们对劳动份额的研究表明，社会保障体系的变革不仅对收入再分配格局有影响，也对初次收入分配，如劳动份额产生影响。后者以不同形式出现，包括通过降低劳动者“退一步”的位置（如失业津贴）或经济学家称之为“保留工资”的方式弱化劳动者的谈判地位。因此，完备的社会保障福利也能够为有效的工资谈判、保障劳动者必要的生活基本收入提供有利的制度环境。同时，在整个社会以及不同缴费者群体、不同受益者群体之间找到社会保障的成本和收益之间的均衡也是必要的。

8.4 发展中国家的特殊情况

以上政策同时适应于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然而后者还面临一些具体的挑战。

覆盖更多收入人群

首先，必须认识到发展中国家和新兴经济体中只有约一半的劳动者是工资收入劳动者，其余大多数只是个体劳动者或帮工的家庭成员。但这不意味着最低工资和集体谈判与他们无关。本报告用 32 个发展中国家 1997 年至 2006 年不同时点的样本表明，不少于 6400 万的工资劳动者每天的收入低于 2 美元（按购买力平价计算）。最低工资和集体谈判对这些工人和他们的家庭来说，是获得更高生活标准的途径。但是，还需要其他的措施产生更多的工资就业岗位、提高个体经营人员的生产率和收入。支付最低工资的就业保证计划可以激励私营企业为了不失去其劳动力而遵守最低工资制度。

改善劳动生产率

此外，尽管发展中国家和新兴经济体的工资增长快于发达国家，但是其平均工资仍大大低于发达国家，月平均工资一般在 150 美元至 1,000 美元之间（按购买力平价计算）。因此，提高平均劳动生产率仍是一个重大挑战，仍需努力提高教育水平，使劳动者获得适应生产力转型和经济发展所需要的技能，创造有利于经济发展和增加就业岗位的政策环境。

实施社会保障制度

最后，发展中国家和新兴经济体还面临着建立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的挑战。保障体系能使劳动者及其家庭投资于子女教育、减少预防性储蓄、以及形成中等收入阶层的消费模式。国际劳工组织研究认为，不论各国的经济发展水平如何，有效的社会保障力度是不能超过国家的承受能力的（ILO, 2010e）。

技术附录一

全球工资发展趋势：方法问题

用于估算全球性和区域性工资趋势的方法是国际劳工组织工作条件与就业司（TRAVAIL）与统计司合作为前一版《全球工资报告（2010）》而提出的，并根据一位国际劳工组织委托的顾问提出的建议和四位独立专家提出的三次评审意见而最终确定³⁴。本附录介绍了基于这个过程而形成的估算方法。

概念与定义

根据国际上关于就业状况的分类（ICSE-93），“雇员”是指那些从事“付薪工作”的劳动者，也就是说这种工作的基本劳动报酬不直接取决于雇主的收入。雇员包括全职雇员、兼职劳动者、临时工、外包工人、季节性工人和其他类型的付薪工作的工人³⁵。

“工资”是指总薪酬，包括雇员在一段确定时期内为其劳动时间或未劳动时间所获得的常规劳动报酬，未劳动时间一般是指带薪年假及带薪病假。从本质上讲，它相当于“总现金性收入”的概念，这个概念是有薪就业的主要收入组成部分³⁶。它不包括雇主的社会保险缴费。

“工资”在本报告中是指雇员的月实际平均工资。我们尽可能地收集全体雇员（而不是某一个子群体，例如制造业雇员或全职雇员）的有关数据³⁷。为了反映不同时期价格变动的影响，我们采用实际工资来考量，也就是名义工资经该国消费物价通胀指数³⁸调整后的数据。实际工资的增长是指全部雇员月实际平均工资的年度增长情况。

普查方法

全球和区域估算使用的方法是无应答普查法。该方法目的在于找到所有国家的工资数据并针对全部无应答案例进行明确的处理（详见下文“全部无应答数据的处理”）。我们尝试收集了共 177 个国家和地区的工资数据，并将其分成六个独立的区域³⁹。

为了更容易进行区域性就业趋势对比，我们所采用的区域分组与国际劳工组织的全球就业趋势（GET）模型中的分组方法保持一致（见表 A1）。但是，我们将其中几个 GET 区域合成了单一一个亚洲和太平洋地区（包括了 GET 中的东亚、东南亚和太平洋、以及南亚地区）、非洲也是如此（包括了 GET 中的北非和撒哈拉以南的非洲）。请注意，韩国和新加坡被分在了亚洲区域（不再与发达经济体一组），欧盟的 27 个成员国全部被划分到“发达经济体”中。此外，“中欧和东欧”与“东欧和中亚”之间不再区分，它们与先前所有的经济转型国家（欧盟成员国除外）以及土耳其组成一个组，命名为“东欧和中亚”区域。这些区域的重新分组意味着目前这一版《全球工资报告》中发布的区域性工资趋势不能与前一版报告中的数据进行直接比较。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中东地区的区域划分则没有任何变化。但是，由于区域内一些国家的统计局对数据进行了修正，与上一版本相比，本报告中也对这些地区的区域性工资趋势进行了更新。

表 A1 区域划分

地区	国家及地区（括号中为缩写）
发达经济体	澳大利亚（AUS）、奥地利（AUT）、比利时（BEL）、保加利亚（BUL）、加拿大（CAN）、塞浦路斯（CYP）、捷克共和国（CZR）、丹麦（DNK）、爱沙尼亚（EST）、芬兰（FIN）、法国（FRA）、德国（DEU）、希腊（GRE）、匈牙利（HUN）、冰岛（ICE）、爱尔兰（IRE）、以色列（ISR）、意大利（ITA）、日本（JAP）、拉脱维亚（LAT）、立陶宛（LIT）、卢森堡（LUX）、马耳他（MTA）、荷兰（NET）、新西兰（NZ）、挪威（NOR）、波兰（POL）、葡萄牙（POR）、罗马尼亚（ROM）、斯洛伐克（SVK）、斯洛文尼亚（SVE）、西班牙（ESP）、瑞典（SWE）、瑞士（CH）、英国（UK）、美国（USA）
东欧和中亚	阿尔巴尼亚（ALB）、亚马尼亚（ARM）、阿塞拜疆（AZB）、白俄罗斯（BLS）、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BOS）、格鲁吉亚（CRO）、乔治亚（GEO）、哈萨克斯坦（KAZ）、吉尔吉斯共和国（KYR）、摩尔多瓦共和国（MOL）、俄罗斯联邦（RUS）、塞尔维亚（SBA）、塔吉克斯坦（TAJ）、前南斯拉夫马其顿共和国（FYR）、土耳其（TKY）、土库曼斯坦（TUR）、乌克兰（UKR）、乌兹别克斯坦（UZB）
亚洲	阿富汗（AFG）、孟加拉共和国（BAN）、不丹（BHU）、文莱（BRU）、柬埔寨（CDA）、中国（CHI）、斐济（FIJ）、中国香港（HK）、印度（IND）、印度尼西亚（ISA）、伊朗（IRA）、朝鲜（NK）、韩国（KOR）、老挝（LAO）、中国澳门（MAC）、马来西亚（MYA）、马尔代夫（MDS）、蒙古（MON）、缅甸（MYN）、尼泊尔（NEP）、巴基斯坦（PAK）、巴布亚新几内亚（PAP）、菲律宾（PHL）、新加坡（SNG）、所罗门群岛（SOL）、斯里兰卡（SRI）、泰国（THA）、东帝汶（TL）、越南（VN）
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	阿根廷（ARG）、巴哈马群岛（BAH）、巴巴多斯岛（BBO）、伯利兹（BZE）、玻利维亚（BOL）、巴西（BRA）、智利（CHE）、哥伦比亚（COL）、哥斯达黎加（COS）、古巴（CUB）、多米尼加共和国（DOM）、厄瓜多尔（ECU）、萨尔瓦多（ELS）、瓜德罗普岛（GDP）、危地马拉（GUA）、圭亚那（GUY）、海地（HAI）、洪都拉斯（HON）、牙买加（JAM）、马提尼克岛（MAR）、墨西哥（MEX）、荷属安的列斯（NAN）、尼加拉瓜（NIC）、巴拿马（PAN）、巴拉圭（PAR）、秘鲁（PER）、波多黎各（PR）、苏里南（SUR）、特立尼达和多巴哥（TT）、乌拉圭（URU）、委内瑞拉玻利维尔共和国（VZA）
中东地区	巴林（BAR）、伊拉克（IRQ）、约旦（JOP）、科威特（KUW）、黎巴嫩（LEB）、阿曼（OMA）、卡塔尔（QTA）、沙特阿拉伯（SAU）、叙利亚（SYR）、阿拉伯联合酋长国（UAE）、约旦河西岸和加沙地带（WBG）、也门（YEM）
非洲	阿尔及利亚（ALG）、安哥拉（ANG）、贝宁（BEN）、博茨瓦纳（BOT）、布基纳法索（BKF）、布隆迪（BUR）、喀麦隆（CAM）、佛得角（CAV）、中非共和国（CAR）、乍得（CHA）、科摩罗（COM）、刚果（CON）、科特迪瓦共和国（COI）、刚果民主共和国（DRC）、埃及（EGY）、赤道几内亚（EQG）、厄立特里亚（ERI）、埃塞俄比亚（ETH）、加蓬（GAB）、冈比亚（GAM）、加纳（GHA）、几内亚（GUI）、几内亚比绍（GUB）、肯尼亚（KEN）、莱索托（LES）、利比里亚（LIB）、阿拉伯利比亚民众国（LBY）、马达加斯加（MAD）、马拉维（MAW）、马里（MAL）、毛里塔尼亚（MAL）、毛里求斯（MUS）、摩洛哥（MOR）、莫桑比克（MOZ）、纳米比亚（NAM）、尼日尔（NIG）、尼日利亚（NIR）、留尼旺岛（REU）、卢旺达（RWA）、塞内加尔（SEN）、塞拉利昂（SL）、索马里（SOM）、南非（SA）、苏丹（SUD）、斯威士兰（SWA）、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TAN）、多哥（TOG）、突尼斯（YUN）、乌干达（UGA）、赞比亚（ZAM）、津巴布韦（ZIM）

总体上看，我们成功地获得了 124 个国家和地区的工资数据，这些区域的数据覆盖率见表 A2。我们获得了所有发达经济体、以及东欧和中亚区域所有国家的数据。在其他一些区域，尽管我们不断尝试从国家统计局和各种国际机构获取工资数据，但是在一些情况下，工资数据依然无法得到。这些区域的数据覆盖率从 41.2%（非洲）到

75%（中东）不等。但是，由于数据库收录了来自最大最繁荣国家的工资数据，从雇员数量和工资总额上讲，覆盖率要比国家数量的简单统计所反映的数值要高。总体而言，我们的数据库涵盖了世界上 94.3%的雇员信息，这些雇员的工资总额约占世界工资总额的 97.7%左右。

表 A2 2010 年全球工资数据库的覆盖率（%）

区域划分	覆盖国家	覆盖雇员	工资总额的大致覆盖率
非洲	41.2	59.5	79.3
亚洲	69.0	98.3	99.3
东欧和中亚	100.0	100.0	100.0
发达经济体	100.0	100.0	100.0
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	64.5	85.3	83.9
中东地区	75.0	76.4	91.3
全球	70.1	94.3	97.7

注：“覆盖国家”指我们掌握工资数据的国家数占该区域国家总数的比例；“覆盖雇员”指掌握工资数据的国家的雇员总数占该区域所有雇员数的比例（截至 2010 年）；“工资总额的大致覆盖率”是用 2005 年购买力平价（\$）来表示的，推算过程基于“各国的工资水平由于劳动生产率水平的差异而不同”的假设（截至 2010 年就业人口人均 GDP）。

无应答数据的处理

对于有些取得工资数据的国家，我们发现其统计序列是不完整的，其中一些年度的数据存在缺失现象。表 A3 显示了 2006 年到 2011 年期间各年度的数据覆盖信息。正如之前所料，由于一些统计局仍然在处理这些数据，数据库在最近几年的覆盖率变得较低（这种现象中国最为明显，2011 年的工资数据尚无法获取）。最终，2011 年我们实际得到的工资数据仅占全部世界工资数据的 74.5%左右，而 2010 年为 94.3%。

对于发达经济体以及东欧和中亚区域，最近几年的数据覆盖度较好；而对于中东地区，由于 2010 年和 2011 年的真实数据非常少，不足以进行可靠估计，因此报告中中东地区近些年来的工资趋势很可能还需要修改。我们对区域增长率也进行了标识以引起大家的注意：“初步估算值”是基于 75%的覆盖率，而“暂时估算值”是基于 40%-74%之间的数据库覆盖率，将来一旦获得这些数据，有可能重新进行估值和修正。

表 A3 2006 年至 2011 年期间全球工资数据库的覆盖率 (%)

区域划分	2006	2007	2008	2009	2010	2011
非洲	79.6	78.1	65.2**	64.8**	64.9**	43.2**
亚洲	95.8	96.0	96.2	96.4	96.5	(38.1)
东欧和中亚	98.4	99.0	98.9	98.7	98.6	97.2
发达经济体	100.0	99.2	100.0	99.2	99.4	86.7
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	84.9	84.7	84.4	84.0	82.6	79.0
中东地区	91.7	91.9	91.7	68.0**	(22.4)	12.0
全球	97.4	96.8	96.9	95.6	94.3	74.5*

注：

* 表示地区增长率为“初步估算值”（覆盖率为 75 %）

** 表示地区增长率为“暂时估算值”（覆盖率为 40 - 74%）

() 表示地区增长率公布但可能会发生变化（覆盖率不足 40%）

请查看关于覆盖率估计的正文内容。一个国家被确定为覆盖的标准是该国家有真实的工资数据，不管这个数据来源是第一手的还是第二手的。

为处理数据无应答的情况（覆盖国家出现数据缺口），我们使用了建立模型的办法去预测缺失的数据⁴⁰。这对于保持采集数据国家的时间连贯性，避免样本不稳定带来的干扰都是非常必要的。根据缺失数据的性质，我们使用了几种补充性的方法，这些方法在 2010/11 版《全球工资报告》的技术附录一中有详细的阐述。

全部无应答的处理

应答权重

为了调整全部无应答情况（当某一国家没有任何关于工资的时间序列数据），我们将之作为一个取样问题，建立了“设计框架”来加以处理。与有应答国家相比，无应答国家的工资可能存在不同的特点，因此无应答可能会使最终估算结果出现偏差。为减少无应答的不利影响，有一个标准的方法是计算不同国家的应答倾向，然后以应答倾向⁴¹的倒数对有应答国家进行加权。这意味着无应答国家不会带来不利影响。

在此框架内，每个国家对应一个概率 ϕ_i ，并假设各个国家都独立应答（泊松抽样设计）。基于应答概率 ϕ_i ，那么可以预测其中任何变量 y_i 的总数 Y ：

$$Y = \sum_{j \in U} y_j \quad (1)$$

估计量：

$$\hat{Y} = \sum_{j \in R} \frac{y_j}{\phi_j} \quad (2)$$

其中 U 是总人口， R 是受访者集合。如果假设前提为真（见 Tillé, 2001），这个估计量就是无偏差的。在我们的研究中， U 代表表 A1 中列出的所有国家和地区， R 代表其中有时间序列数据的“应答”国家。

然而，难题在于一般不知道国家 j 的应答倾向 ϕ_j ，这个数值本身必须从估算得出。现有文献中关于应答倾向估算的方法很多（例如 Tillé, 2001）。在我们的报告中，将某一国家有应答或无应答与其雇员数量和劳动生产率（或用 2005 年购买力平价 \$ 表示的就业人口人均 GDP）联系起来进行估算。这是由于我们观察到工资统计从富国和大国比从穷国和小国更容易获得。我们选择雇员数量和劳动生产率，因为这些变量也可以用作定标和规模权重计算⁴²（见下文）。

为此，我们进行固定效应回归测算如下：

$$\text{prob}(\text{response}) = \Lambda(\alpha_h + \beta_1 x_{j2010} + \beta_2 n_{j2010}) \quad (3)$$

其中， x_{j2010} 是国家 j 在 2010 年用 2005 年购买力平价（\$）表示的雇员人均 GDP 的自然对数， n_{j2010} 是在 2010 年的雇员人数的自然对数， Λ 代表逻辑累积分布函数（CDF）⁴³。固定效应 α_h 是对数据不完整地区（亚太地区、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中东地区和非洲地区）的虚拟数据，而两个有完整数据的地区构成数据基础不再提及。本式回归了 177 例，并得出了假设值 $R^2 = 0.380$ 。这个估计参数被用来计算国家 j 的应答倾向 ϕ_j 。

国家 j 的应答权重 φ_j 是该国应答倾向的倒数：

$$\varphi_j = \frac{1}{\phi_j} \quad (4)$$

定标因数

最后的调整过程一般被称为定标（见 Särndal 和 Deville, 1992），是为了确保估算数据与已知数据的一致性。这个步骤可确保在最终的全球估算中，不同地区数据的代表性。本文使用单一变量“雇员数量” n ，在给定的年份 t 进行定标。在这个简单的办法中，定标因数 γ_j 是通过以下公式得出：

$$\gamma_{jt} = \frac{n_{ht}}{\hat{n}_{ht}}, j \in h \quad (5)$$

其中 h 代表国家 j 所属的地区， n_{ht} 是该地区在年度 t 的已知雇员数量，而 $\hat{n}_{ht}$ 是该地区当年估计的雇员数量总和，这一数字是用某一区域内未定标权数和应答国家就业数据汇总得出⁴⁴。

2010年得出的定标因数，发达国家以及东欧和中亚地区是1.00，亚洲和太平洋地区是0.975，拉美和加勒比海地区是1.045，非洲是1.042，中东是1.086。鉴于所有定标因数都接近或等于1，这些结果说明了估计值 $\hat{n}_{ht}$ 与已知的雇员数量 n_{ht} 在每一个地区都是很接近的。需要注意的是定标过程对每一年都要重复进行，因此每个地区在全球估算中的权重都会随着时间随着该地区在全球工资总额中的大致比重产生变化。

定标后的应答权数

那么可以通过用原始的应答权数乘以定标因数得出定标后的应答权数 φ'_{jt} ：

$$\varphi'_{jt} = \varphi_j \times \gamma_{jt} \quad (6)$$

根据定标后的应答权数得到的区域雇员数量估算值等于该地区在某一年度内已知雇员数量总和。因此，定标后的应答权数可以调整地区间无应答情况带来的差异。所有国家都有工资数据的区域（发达国家、东欧和中亚地区），其定标后应答权数为1。较小国家和劳动生产率较低的国家该权数大于1，因为这些国家的数据在所有的应答国家的样本中不具有代表性。

估算全球和区域趋势

一个直观看待全球（或区域）工资趋势的方法是考查全球（或区域）平均工资的变化。这也与其它为人熟知的测算方法是一致的，如（世界银行发布的）地区人均 GDP 增长，或劳动生产率（或就业人口人均 GDP）的变化。

在时间点 t 的全球平均工资 $\bar{y}_t$ ，可以通过用各国工资总额除以全球雇员数量得到：

$$\bar{y}_t = \frac{\sum_j n_{jt} \times \bar{y}_{jt}}{\sum_j n_{jt}} \quad (7)$$

其中 n_{jt} 是国家 j 的雇员总量， $\bar{y}_{jt}$ 是相应的该国家 j 的雇员平均工资。二者皆指时间段 t 的数值。

可以对接下来的时间点 $t+1$ 重复采用同样办法，使用折算工资 $\bar{y}_{jt+1}^*$ 和雇员总量 n_{jt+1} 来获得随后时间点 $t+1$ 的数据 $\bar{y}_{t+1}^*$ 。这里，*是指实际工资。然后就可以直接计算出全球平均工资的增长率 r 。

虽然理论上讲这是一个令人心动的预测全球工资趋势的方式，但是它涉及到一些目前我们不能克服的困难。特别是加总各国的工资，如公式（7）所示，这需把各国工资转换成同一货币计价形式，例如购买力平价\$。因此，这样估算的结果会对购买力平价这一转换因素的修改产生敏感性。另外还需要各国工资数据能够统一到一个概念下，以便直接进行横向比较⁴⁵。

更重要的是，国与国之间的雇员比例发生变化而引起“结构效应”也会对全球平均工资的变化产生影响。例如，如果一个高工资国家的雇员数量减少，而另一个规模差不多的低工资国家的领薪雇员数量却扩大（或保持不变），这将导致全球平均工资下降（在所有国家的工资水平都保持不变的条件下）。这种效应使得我们难以解释全球平均工资的变化，因为我们必须区分哪些部分是由于国家层面的平均工资的变化引起的，哪些部分是“结构效应”的结果。

因此，我们倾向于选用另一种分析模型来计算全球工资趋势，既能保证前面提到的直观方法的吸引力，同时也避免了实际操作时的挑战。为了更便于解读，我们也希望剔除由于世界雇员数量构成的变化而引起的效应。这样就能避免产生因为就业往低工资国家转移（即便国家间的工资实际是增长的）而导致全球平均工资下降的统计假象。

当每一个国家的雇员数量保持不变时，全球工资增长率可以表示为单个国家工资增长率的加权平均数：

$$r_t = \sum_j w_{jt} \times r_{jt} \quad (8)$$

其中， r_{jt} 是指国家 j 在时间 t 的工资增长，该国家的权数 w_{jt} 是指国家 j 在全球工资总额中的比重，可以根据下式得出：

$$w_{jt} = n_{jt} \times \bar{y}_{jt} / \sum_j n_{jt} \times \bar{y}_{jt} \quad (9)$$

尽管我们已经通过国际劳工组织全球就业趋势模型⁴⁶获得了所有国家在所有相应时间点的雇员数量 n_{it} ，但是我们无法直接估算公式（9），因为我们的工资数据不是同一货币单位。不过我们还是可以再次根据标准经济理论，认为不同国家的平均工资与其劳动生产率的变动大体保持一致⁴⁷。因此，我们估算 $\bar{y}_i$ 可以作为劳动生产率 LP 的一个固定比例，则：

$$\hat{\bar{y}}_{jt} = \alpha \times LP_{jt} \quad (10)$$

其中， α 是指工资与劳动生产率的平均比率。这样我们可以测算出权数：

$$\hat{w}_{jt} = n_{jt} \times \alpha \times LP_{jt} / \sum_j n_{jt} \times \alpha \times LP_{jt} \quad (11)$$

它等同于：

$$\hat{w}_{jt} = n_{jt} \times LP_{jt} / \sum_j n_{jt} \times LP_{jt} \quad (12)$$

用 $\hat{w}_{jt}$ 代替 w_{jt} ，再引入定标应答权数 ϕ'_j 到公式（8），可以得出测算全球工资增长率的最终公式：

$$r_t = \frac{\sum_j \phi'_j \times \hat{w}_{jt} \times r_{jt}}{\sum_j \phi'_j \times \hat{w}_{jt}} \quad (13)$$

还有区域性工资增长率的计算公式：

$$r_{ht} = \frac{\sum_j \phi'_j \times \hat{w}_{jt} \times r_{jt}}{\sum_j \phi'_j \times \hat{w}_{jt}}, j \in h \quad (13')$$

其中， h 代表国家 j 所在区域。由方程（13）和（13'）可以看出，全球和地区工资增长率是各国工资趋势的加权平均值，其中 ϕ'_j 调整了国家间的应答倾向差异。

技术附录二

劳动生产率和工资的背离如何影响单位劳动成本和劳动份额

《2010/11 全球工资报告》曾强调在很多发达国家，劳动生产率提高和实际工资增长之间的差距越来越大。劳动生产率衡量的是生产过程中投入（这里指劳动力投入）和产出之比。它通常用就业人员人均增加值或每个劳动小时的增加值来衡量。用小时计算劳动生产率的优点在于它不受劳动小时增减所造成的产出变化的影响。但是，一般找不到可靠的劳动小时数据，因此，就业人员人均增加值往往是首选的衡量指标（例如，在千年发展目标中的“劳动生产率”指标就是这样计算，见 Luebker，2011）。一些组织，像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则同时发布这两种指标（见 McKenzie 和 Brackfield，2008）。劳动生产率总是以实际角度来计算，所以增加值也需要按照不变货币价格来计算（即，采用投入和产出均以不变价来计算的双紧缩方法，来剔除通胀因素的影响）。然而，由于 GDP 所惯用的紧缩指数可能与（用来折算工资的）消费价格指数不同，有时候也会使用名义增加值和名义工资进行比较。

“工资”和“雇员薪酬”这两个概念非常接近。在《全球工资报告》中的“工资”是指总薪酬，包括雇员在一段确定时期内为其劳动时间或未劳动时间所获得的常规劳动报酬，未劳动时间一般是指带薪年假及带薪病假。从本质上讲，它相当于“总现金性收入”的概念，是有薪就业的主要收入组成部分。它不包括雇主的社会保险缴费。这是它与国民经济核算体系（2008）中的“雇员薪酬”指标最大的区别。雇员薪酬由“工资和薪水”（相当于《全球工资报告》中工资的概念）以及“雇主向养老金和其他社会保障项目支付的社会保险缴费”两部分构成。劳动份额（LS）指的是雇员薪酬（CoE）和总增加值（GDP）的比值。未经调整的劳动份额就是用国家层面或部门层面的总雇员薪酬除以总增加值，即：

$$LS = \frac{CoE}{GDP} \quad (1)$$

或者，我们可以用劳动者(worker)人均薪酬除以劳动者人均 GDP 来计算劳动份额，如：

$$LS = \frac{CoE/worker}{GDP/worker} \quad (1')$$

可以发现，分母——劳动者人均 GDP——对应于前面定义的劳动生产率。但是，分子与《全球工资报告》中平均工资的概念并不完全对应。首先，雇员薪酬 CoE（不同于工资）还包含了雇主的社会保险缴费；其次，“平均工资”仅涉及雇员（不是指所有的劳动者，因为劳动者还包括个体劳动者）。上面的公式（1'）可以改写成公式（1''），使平均工资与劳动生产率建立起直接联系：

$$LS = \frac{\alpha}{\beta} \times \frac{wage/employee}{LP} \quad (1'')$$

在公式（1''）中， α 代表“雇员薪酬 CoE/工资”， β 则指“劳动者/雇员”， $wage$ 代表工资， $employee$ 代表雇员。常用的一个方法（在本报告的第二部分中也使用了该方法）是根据总就业人数中雇员所占比重将劳动份额进行调整。调整后的劳动份额（LS'）可以写作：

$$LS' = \alpha \times \frac{wage/employee}{LP} \quad (1''')$$

对于分析者来说比较幸运的是，系数 α 在长期来说相当稳定。即使象德国，在过去 35 年中经历了大幅结构调整、国家统一、降低雇主社保缴费改革，情况依然如此。从 1976 年到 2011 年，雇员薪酬 CoE 与工资和薪水的比值系数一直保持在一个比较小的范围内，即 1.21-1.24 之间（见联邦统计办公室 2012，表 1.8）。这表明劳动份额的变化几乎可以完全由平均工资和劳动生产率之间的关系变化来决定。因此，在跟踪研究许多国家过去十年中这两个变量分离的情况时，劳动份额是一个比较方便的统计量。

劳动份额又与单位劳动成本（ULC）密切相联。单位劳动成本一般定义为每单位产出的平均劳动成本。尽管这一指标常被用来反映一个经济体的竞争力，但经合组织（OECD）警告说“单位劳动成本不应被理解成是一个全面衡量竞争力的指标，而是反映了成本的竞争力”⁴⁸。

单位劳动成本通常是以名义形式出现，是把名义劳动成本和实际增加值联系起来：

$$nULC = \frac{nCoE}{rGDP} \quad (2)$$

在公式（2）中 n 和 r 分别表示名义值和实际值。实际 GDP 由名义 GDP 除以价格指数 P 得到。所以，另外一个计算名义单位劳动成本的方法是，用价格指数 P 乘以名义雇员报酬 CoE 和名义 GDP 的比值，即：

$$nULC = \frac{nCoE}{nGDP} * P \quad (2')$$

从以上两个公式中可以看到，如果名义雇员报酬 CoE 增长快于名义 GDP，或者价格上涨，都会导致名义单位劳动成本 ULC 提高。因此，高通胀率国家的名义单位劳动成本通常要比低通胀国家的增长要快。这使得使用不同货币的国家间很难比较名义单位劳动成本。

还有一个办法是计算实际单位劳动成本，用来反映实际劳动成本（即剔除了通胀影响）与实际产出的关系。即雇员薪酬 CoE 和 GDP 都需要使用价格指数 P 进行折算，如公式（3）所示：

$$rULC = \frac{nCoE * \frac{1}{P}}{nGDP * \frac{1}{P}} = \frac{nCoE}{nGDP} \quad (3)$$

由于价格指数相互抵消，因此，实际单位劳动成本通常可以用名义值来计算（OECD，2008）。这可以避免由于使用消费物价指数（CPI）来折算劳动成本，却用生产者物价指数（PPI）来折算 GDP 所带来的错误结果（见 Fleck, Glaser 和 Sprague, 2011）。为了表达的方便，单位劳动成本通常以基年（即 2005 年）的数值为 100 所得到的指数来表示。

可以看到，公式（3）中的实际单位劳动成本与公式（1）中的劳动份额是完全一样的。这并不偶然，实际上“劳动份额”和“实际单位劳动成本”通常被作为同义词

使用（见 McKenzie 和 Brackfield, 2008）。这意味着降低实际单位劳动成本的政策实际上会导致工资与生产率脱钩，因而降低劳动份额（从而增加了资本份额）。

名义单位劳动成本当然也会因价格指数 P 的下降而降低。但是，几乎没有哪个政策制定者会致力于彻底的通货紧缩——这曾使得 20 世纪 30 年代的大萧条更加恶化，也会提高现有债务的实际值。当价格持续上涨，要降低名义单位劳动成本就不仅仅是降低实际单位劳动成本，还要把工资份额降得更多。

虽然一些经济评论员普遍建议降低人工成本，但是，并不清楚这种建议是否考虑到了它对功能性收入分配的影响，而我们也并不清楚，以牺牲工资来增加利润为什么会是一个好的经济政策（本报告的第二部分对这个问题进行了说明）。

劳动份额的决定因素

专栏 A1 数据选择和估算过程：计量经济方法

估计不同变量对劳动份额影响的方法是基于因果分析框架，共有四个基本步骤。第一步通过合并数据集构造因变量（劳动份额）和自变量（内部和外部因素）；第二步仔细分析误报和内生性问题；第三步根据图 37 列出的各个要素将劳动份额的决定因素进行分组；第四步合并各决定因素，得到表 A4 和 A5 的估计值。

步骤 1：合并以下资料来源，构造因变量和自变量：

- 因变量：使用 ILO/ILIS 数据库构造工资份额主要指标，以此作为劳动份额的代理变量
- 确定因素：AMECO 数据库，经合组织（OECD）数据库，中国国民经济核算体系，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UNIDO）的工业指数，世界银行的世界发展指数（WB-WDI），联合国佩恩表，欧盟 KLEMS 数据库。
- 补充数据引自以下研究：Aleksynska 和 Schindler (2011)，Bassanini 和 Duval (2006)，以及 Lane 和 Milesi-Ferretti (2007)

数据的处理和特点：基于 71 个经济体 1970 至 2007 年间的年度数据对因变量和因变量的确定因素进行估算。

步骤 2：因变量是工资份额总额，它等于工资总额除以国民收入。它需要进行以下两个方面的调整：

- 调整 1（控制误报）：自雇型就业的收入数据包含工资和利润。为避免高估来自于自雇型就业的影响（通过剔除利润），工资总额是用“领薪雇员”的工资总额再加上按照自雇型就业占劳动力的比例增加的一块工资来得到的。即以雇员作为参照物，假设自雇劳动者是工资收入者的情况下应该得到的工资收入 (Gollin, 2002)。

- 调整 2（控制内生性）：工资总额包含与政府消费支出（GC）密切相关的公共部门工资，而变量“政府支出（GC）”已包含在方程式右边，以反映福利状况对总工资份额变化的影响。因此，调整后的总工资份额必须再通过从工资总额中扣除政府支出来进一步进行调整：第二步调整可以保证方程右边的政府支出（GC）变量对于方程左边的“总工资份额”是外生的。

运用调整 1 和 2：最终的因变量是对自雇型就业调整之后的私营部门的工资总额占国民收入的百分比。

步骤 3：估计过程中把五类自变量作为劳动份额发生变化的决定因素。

- 我们纳入实际 GDP 增长率这个变量来控制可能影响功能性收入份额长期变动趋势的结构性和周期性变化。实际 GDP 增长能够解释一个国家内部随时间变化的异质性。
- 技术进步：工业在 GDP 中的比重，农渔业在 GDP 中的比重，平均劳动生产率（发达国家使用资本-劳动份额）以及信息与通信技术-资本份额等。其中资本-劳动份额指标专门用于超发达经济体，因为在这些国家使用平均劳动生产率无助于解释因经济体之间和长期以来平均劳动生产率趋同带来的技术进步的影响。因此，仅就超发达经济体而言，“资本-劳动份额”用某一经济部门中总资本贡献价值与该部门雇员总数的比值来表示：因此，它是排除了资本因素之后衡量平均劳动生产率的方法。
- 金融化（全球金融化）：金融化表示为一个经济体中外部资产加对外负债总额占 GDP 的比重。这是在文献中用来衡量一个经济体中金融业重要性的标准方法（见 EC, 2007; Rodrick, 1997; Stockhammer, 2012）。
- 全球化：贸易开放度（出口和进口总额占 GDP 的比重）和贸易条件（出口的单位价值比进口的单位价值）。
- 福利状况：政府支出占 GDP 的比重。
- 劳动力市场制度：工会入会率、最低工资指数、失业福利指标（替代率和覆盖率）、失业提前通知期、遣散费和对供给方（劳动力和人口）影响的控制等。

步骤 4：该模型假定各变量之间存在静态因果关系。使用一个不均衡面板中的可用数据（71 个国家，每个国家最多 37 年的观测值）构造，再控制个体的固定效

应进行估计。该模型表示如下：

$$WSAP_{it} = F[FIN_{it}, GLOB_{it}, TECH_{it}, WFST_{it}, LMI_{it}; e_{it}]$$

- i* 表示 *n* 个国家中的一个
- t* 表示观测值的时间
- e* 表示随机项
- FIN* 表示金融化
- GLOB* 表示全球化
- TECH* 表示技术进步
- WFST* 表示福利状况
- LMI* 表示劳动力市场制度

包含或排除特定变量组会产生两个明显不同的分析模型：

- 基线分析模型：忽略劳动力市场制度的各个变量（LMI），来更好地理解全球化和雇员谈判能力的共同作用（表 A4）
- 扩展的基线分析模型：将步骤 3 确定的 5 个劳动力市场指标变量逐个代入基线分析模型，得到一组新的估计值（表 A5）。

结果和解读

表 A4 展示了所有 71 个经济体、工业化经济体（28 个 OECD 经济体）和发展中经济体（9 个经济体）等三个国家组别基线分析模型的估计结果。这种区分无论从概念层面还是实践层面都很重要。高收入 OECD 经济体拥有更同质化的劳动力市场和产业结构，也拥有更长时间跨度和更高质量的数据。这些条件使得我们能够扩大模型，把所有潜在要素都纳入考虑当中，而不必担心会产生太大的统计误差和不可靠性（例如统计“噪声”）。因此，对工业化经济体采用的是完整的分析模型。全球化的影响是通过“贸易开放度”和“贸易条件”这两个变量来考量的，前者衡量一个国家在全球化市场中的参与程度，而后者则用来衡量一个国家在国际贸易中的相对竞争力。“金融全球化”的影响通过对外资产和对外负债之和占 GDP 的比重来表示（来自 Lane 和 Milesi-Ferretti，2007）。模型中还包括了政府支出和工会入会率这两个变量。

但是，在发展中国家，由于现有数据有限，特别是有关工会入会率的数据有限，导致以上这种方法不适用。因此，我们使用了另外一个模型，纳入了一些新的变量，例如工业部门占比、农林部门占比以及劳动生产率，以控制技术进步和结构变化产生的影响。当把所有 71 个国家一并回归计算时，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国家差异表明，工业部门占比、农林部门占比以及劳动生产率这三个变量足以解释技术进步和结构变化对劳动份额的影响。但是，在发达国家中，这三个变量同质性太高，以至于无法识别同组别中这些国家在技术差距方面存在的差异。因此，在用基线模型对 28 个高收入 OECD 国家进行估算时，用资本-劳动比率和资本-服务比率等变量来替代计算这些差距。最后，方程中考虑了实际经济增长，来控制短期经济周期调整对工资决定行为的影响；方程计算出的系数为负，这与我们得出的工资呈反周期变化的结论是一致的。

所有估计结果的影响大小（得数的数值）和影响方向（正负号）都可以从表 A4 中看到。估计结果明确指出，不管是在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国际贸易和金融市场中的技术进步和全球化都造成了劳动份额的降低。有意思的是，对每一个国家组别来说，影响程度都是相似的。提高政府支出（福利状况）使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劳动份额都有所增加。但是，当涵盖所有 71 个经济体的时，影响程度要小一些，这可能表明，政府支出作为劳动份额的决定因素时，其作用在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是有差异的⁴⁹。同样，OECD 国家的工会入会率系数表明谈判力量对于劳动份额有正向影响⁵⁰。

使用基于 71 个国家的估计结果可以发现，工业化水平的提高和资本-劳动比率的上升（这两个指标都用来衡量技术进步带来的资本增加）都对劳动份额的变化产生了负面影响，这与预期结果和之前的研究发现是一致的（见 IMF，2007；Kumhof 和 Ranciere，2011；IMF，2010；OECD，2012b）⁵¹。然而，在针对发展中国家的估计中，工业化和劳动生产率的估计系数表明在技术进步和劳动份额之间存在着正向关系。这可能反映了这些国家至少在 2007 年以前所经历的“追赶效应”的结果，在 IMF 有关劳动力全球化的报告中对此进行了解释（IMF，2007）。在这个追赶时期，一个国家将其发展重心由农业部门转向工业部门，由于劳动生产率提高以及技术升级带来的劳动力市场紧缩可能会推动工资上涨。其他研究也有相似的发现（OECD，2012b）。

基线模型可以进一步进行扩展，将劳动力市场制度指标（LMIs）包含进来，即，加入一些能够直接反映谈判力量强弱的变量（包括工会入会率在内的更多变量），这

些变量决定了收入分配中劳动份额能占多大比重。表 A5 展示了每一项劳动力市场制度指标（LMI）作为额外要素加入到表 4 的基线模型后形成的不同分析模型的估计结果。分别单独加入每一项劳动力市场制度指标的有两个。首先，由于工会入会率对劳动工资份额有正向作用，加入一些可能是促进工会入会率的原因的独立指标可以更好地理解工会入会率（谈判力量）和收入中劳动份额之间可能存在的转换关系。其次，这些劳动力市场制度指标可能是高度相关的，因此逐个分别加入方程可以避免多重共线性问题，进而影响到估计参数。

这些估计是基于样本中所有 71 个经济体而做出的。在实践中，估计结果显示，没有任何一个变量能够与劳动份额的改变产生独立的因果关系：也就是说，各国在每一变量上的差异性意味着，任何一个劳动力市场制度指标都不具备显著性。必须指出，即使不对法律条款（例如，最低工资和失业保障）进行实质改变，随着越来越多的劳动者被排除在法律保障范围之外，这些劳动力市场制度的有效性仍有可能随之降低。事实上，随着非正规劳动者的数量越来越多，劳动力市场的进一步分割，许多国家已经开始放松管制。这也许可以解释表 A5 中劳动力市场制度变量不显著的原因。必须指出，本报告中使用的劳动力市场制度变量并不是第一次被使用，先前的大量实证分析研究中已经采用了这些变量（IMF，2007；欧盟委员会，2007；OECD，2012b）⁵²，并且其结论与该报告的结论类似，这些劳动力市场制度变量在统计上是不显著的。

必须要指出的是，在表 A4 中工会入会率对劳动份额有正效应。由于发展中国家没有工会组织化的指标，因此无法在表 A5 中提供的不同分析模型下确定这种正效应。为了解表 A5 中的结果是否是由于发展中国家数据质量较差所导致的，我们仅仅针对 28 个高收入 OECD 国家的数据构建了另外一种分析模型，即同时引入所有七个劳动力市场制度指标并增加了“工会入会率”这一变量。由此估算出的系数没有改变之前的结论：控制劳动力市场制度强度的 5 个变量不具备统计学上的显著意义，只有“工会入会率”对决定劳动份额具有较为显著的正影响。因此，可以非常清楚的看出，是工会化，而不是工会化导致的结果，为全球化和金融化背景下劳动份额的下降提供了一个缓冲。

最后，我们还试着通过加入一些其他的控制结构变动的变量，如失业率、汇率的波动和金融改革等，来做出更多分析模型⁵³。失业的增加对劳动份额有非常强烈的负效应，这个发现毫不奇怪，因为较高的失业率会带来工资下行的压力，并且会削弱工人的谈判地位。同样，国际贸易风险度的增加（用汇率波动表示）可能会降低劳动份

额：这也与一些早期的研究是一致的（例如 Jayadev, 2007; IILS, 2011）。最后，金融自由化会使功能性收入分配从劳动向资本倾斜。在模型中使用 Abiad 等人开发的“信用控制指数”（用来衡量信贷控制的自由化程度），能够发现它使劳动份额下降（Abiad, Detragiache 和 Tressel, 2008），这与（Obstfeld 和 Rogoff, 2009）的预测是一致的。当在基线模型中加入其他金融改革指标（如信贷控制、利率管制、进入壁垒、私有化、国际资本流动和证券市场等）之后，也得到相似的结果（虽然显著性有差异）。

表 A4 影响调整后劳动份额的因素

因素	因变量：调整后的劳动收入份额		
	所有经济体（28 个 OECD, 3 个非 OECD 高收入, 27 个新兴经济体, 13 个发展中）	工业化经济体（28 个 OECD 国家）	发展中经济体（9 个）
实际 GDP 增长率	-11.2** (2.97)	-16.4** (3.2)	-26.6** (13.0)
金融全球化 ⁽¹⁾	-3.1** (0.59)	-2.4** (0.7)	-5.0 (3.6)
贸易开放	-6.2** (1.40)	-5.9** (1.8)	-5.9** (6.8)
贸易条件	-4.2** (1.30)	-4.5** (1.8)	••
政府支出（占 GDP 的%）	0.4** (0.19)	0.9** (0.2)	0.8** (0.4)
工业部门（占 GDP 的%）	-0.3** (0.07)	••	0.6** (0.2)
农林部门（占 GDP 的%）	-0.1 (0.10)	••	-0.07 (0.2)
平均劳动生产率 ⁽¹⁾	-2.4 (2.08)	••	23.7** (9.4)
工会入会率		0.1* (0.06)	
资本-劳动比率 ⁽¹⁾		-7.0* (3.7)	
资本服务（占 GDP 的%） ⁽¹⁾		1.4 (0.9)	
分析判断			
观察值个数	1,450	470	101
调整后的 R ²	0.98	0.94	0.99
Durbin-Watson D 统计量	1.72	1.81	2.04

注：所有模型均使用混合面板数据采用固定效应模型进行估计。金融全球化由外部资产加上对外负债乘以 GDP；贸易开放程度是出口加进口占 GDP 的比重，贸易制度用出口单位价值除以进口单位价值；平均劳动生产率是用 PPP 转化的按可比价格计算的劳动者人均 GDP；政府支出是其占 GDP 的比重；工业部门用所有工业部门的增加值占 GDP 的百分比表示；农林部门占 GDP 的比重是林业、狩猎、捕鱼、作物种植和畜牧业生产的增加值占 GDP 的比重；工会入会率衡量参加工会的劳动人口比例；资本 - 劳动比率是用劳动者人数除以总资本贡献价值；资本服务是信息与通信技术的投资额除以增加值总额。

(1) 变量以对数的形式进入方程。**表示在 5%的水平上显著，*则指在 10%的水平上显著；括号内的数字为标准误差。

资料来源：ILO 估算（Stockhammer, 2012）。

表 A5 外部因素对调整后劳动份额的影响

	因变量：调整后的劳动收入份额				
基线模型逐项加入劳动力市场制度指标（LMI）	所有经济体（28 个 OECD，3 个非 OECD 高收入，27 个新兴、13 个发展中）	观察值个数	变量个数	调整后的 R ²	Durbin-Watson D-统计量
最低工资指数	-0.5 (1.7)	718	8	0.97	1.7
失业福利替代率	-2.5 (1.9)	1,007	8	0.98	1.7
失业福利覆盖面	0.5 (0.8)	878	8	0.98	1.7
服务 4 年后的提前通知期限	-1.2 (0.8)	1,026	8	0.98	1.7
服务 4 年后的解聘费用	0.1 (0.4)	1,026	8	0.98	1.7
劳动力规模	5.0 (3.7)	1,242	8	0.98	1.7
人口规模 ⁽¹⁾	-9.7 (6.5)	1,450	8	0.98	1.7

注：所有模型均使用 1970 至 2007 年的非均衡面板数据，采用固定效用模型估算。最低工资指数指的是最低工资和平均工资之间的比率（Kaitz 指数）。

(1) 变量以对数的形式进入方程。**表示在 5%的水平上显著，*则指在 10%的水平上统计显著；括号内的数字为标准误差。

资料来源：ILO 估算（Stockhammer，2012）。

表 A6 表 A4、A5 和专栏 A1 中所包括的国家的情况

组别	包含国家
高收入的 OECD 成员国（28 个国家）	标准：人均收入 12,276 美元以上及 OECD 成员国 澳大利亚、奥地利、比利时、加拿大、捷克共和国、丹麦、爱沙尼亚、芬兰、法国、德国、希腊、匈牙利、冰岛、爱尔兰、意大利、日本、卢森堡、荷兰、新西兰、挪威、波兰、葡萄牙、斯洛伐克、西班牙、瑞典、瑞士、英国、美国
非 OECD 高收入国家及地区（31 个国家）	标准：人均收入 US\$12,276 美元 上面列出的 28 个高收入 OECD 成员国，以及香港、科威特和阿曼
上中等收入（27 个国家）	标准：人均收入 3,976–12,275 美元 阿尔及利亚、阿根廷、阿塞拜疆、白俄罗斯、博茨瓦纳、巴西、保加利亚、智利、中国、哥伦比亚、哥斯达黎加、伊朗、约旦、拉脱维亚、立陶宛、毛里求斯、墨西哥、纳米比亚、巴拿马、秘鲁、俄罗斯、南非、韩国、泰国、突尼斯、土耳其、委内瑞拉
中低收入国家（9 个国家）	标准：人均收入 1,006–3,975 美元 亚美尼亚、科特迪瓦、埃及、印度、摩尔多瓦、蒙古、尼日利亚、菲律宾、斯里兰卡
低收入国家（4 个国家）	标准收入：人均 1,005 美元或以下 肯尼亚、吉尔吉斯斯坦、尼日尔、坦桑尼亚

资料来源：ILO 估算（Stockhammer，2012）。

图 38 中有关劳动份额分解的解释

1. 假设一个特定模型，把一组协变量与 1970 至 2007 年间观察到的 71 个经济体（i）的工资份额（WS）相联系。这些变量包括 GDP 增长率 R 、技术 TH 、全球化 G 、金融化 F 和以政府支出 GC 表现的福利变量，还有工会入会率 U ：

$$ws_{it} = \beta_1 R_{it} + \beta_2 G_{it} + \beta_3 F_{it} + \beta_4 TH_{it} + \beta_5 GC_{it} + \beta_6 U_{it} + residual_{it} + f_i \quad (1)$$

其中：

i 代表国家， t 代表时间， f_i 代表固定效应

2. 运行模型得到方程（1）中的系数。这样使得我们可以放入所有观测值。一旦模型有了估计结果，我们可以把方程（1）放入方程（2）来解读：

从方程（1）导出

$$ws_{it} = -16.4 \times R_{it} - \underbrace{(5.9 \times OPEN_{it} + 4.5 \times TOT)_{G_{it}}}_{G_{it}} - 2.4 \times F_{it} - 7.0 \times TH_{it} + 0.9 \times GC_{it} + 0.1 \times U_{it} + \hat{e}_{it}$$

其中 OPEN：贸易制度 TOT：贸易条件。 导出：

$$ws_{it} = -26.6 \times R_{it} - 5.9 \times TOT - 5.0 \times F_{it} + \underbrace{(0.6 \times IND_{it} + 23.7 \times LP_{it} - 0.7 \times AG_{it})}_{TH_{it}} + 0.8 \times GC_{it} + \hat{e}_{it}$$

其中 IND：工业部门 LP：劳动生产率 AG：农业生产

(2)

3. 图 38 中所展示的是基于方程（2）中的设定和分析模型而进行的分解。下面以发达国家为例：

- a. 选择两个时间段：1990 至 1994 年；2000 至 2004 年
- b. 对每一个时期估算每一个变量（G、F、TH、C 和 U）的均值，把这些国家间均值假设成一个“假想国”。“实际 GDP 增长”在两个时间段中保持不变，所以它对最终分解的贡献率为零，也就是说是可以忽略的。
- c. 每一个平均值都可以按照方程（2）中对应系数的估算结果进行加权。例如，F 指的是对外资产和对外负债总额的对数。我们假设对所有经济体来说，他们

在 1990 至 1994 年期间的 F 均值为 0.04，在 2000 至 2004 年期间则平均为 1.5。然后，每个均值都用同样的系数值-2.4 进行加权。

- d. 两个加权值之间的差异，即 $(1.5) (-2.4) - (0.06) (-2.4) = -3.3$ ，表明金融化（或称国际金融化）这个变量在图 38 中的贡献。
- e. 对每一个变量都采取同样做法，再把结果相加，就得出各时期之间工资份额的“预测”差值。这一数值（大约）是-7.1，即从 1990 至 1994 年和 2000 至 2004 年这两个时期，工资份额下降了 7.1%。可以用同样的方法来分析图 38 中的第二张图发展中国家的情况：对发展中国家而言，其“假想国”工资份额平均下降了 2%。

劳动份额对总需求的影响

专栏 A2 数据、估计和模拟

我们关于劳动份额降低对总需求各组成部分的影响的模拟是基于弹性估计的，假设用单方程来（独立）解释总需求的每一个构成要素，即 GC（政府支出）、C（国内对货物和服务的私人消费）、I（总私人投资）和 NX（总净出口，即出口值减去进口值）。假设功能性收入分配的份额影响国民收入 Y 中的每一个构成部分（即， $Y=GC+C+I+NX$ ），但是在计算最终模拟效应时不考虑各构成部分之间的相互影响。这种简化的思路减少了使用未经验证的假设可能给方程带来的问题，避免这些假设使得结果能对政策有一个清晰的启示。估计过程由三个步骤组成：

步骤 1：选择国家样本、时间跨度和数据库

- 16 个经济体：欧元区（12 个核心高收入经济体）、阿根廷、澳大利亚、加拿大、中国、法国、德国、印度、意大利、日本、墨西哥、韩国、南非、土耳其、英国、美国。
- 时间跨度：发达国家从 1960 至 2007 年，发展中国家从 1970 至 2007 年，中国从 1978 至 2007 年。危机时期被剔除。
- 因变量：私人消费、投资和净出口的增长
- 自变量（原因）：劳动份额和利润份额指标。其中，劳动份额（或劳动工资份额，LWS）是采用技术附录三步骤 2 中所描述的方法进行了同样调整。资本（或利润）份额（CIS）由 LWS 构建得来： $CIS = 1 - LWS$ 。其他指标包括工业比重(IND)、农业比重(AGR)、贸易条件(TOT)、世界 GDP(wGDP)、进口价格(MP)、出口价格(XP)、国内价格(P)、单位劳动成本(ULC)。
- 数据库和来源：ILO/IILS、世界银行世界发展指数、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UNIDO）、阿根廷和南非数据使用 Lindenbaum 及其他人报告，（2011），Charpe（2011）和联合国国民核算体系；中国的数据见 Zhou 及其他人 报告（2010）。

步骤 2：界定劳动份额、资本份额与其他因变量（消费 C、投资 I 和净出口 NX）之间的长期关系。

以下分析模型单独运用于每一个经济体：

$$\text{消费: } C_t = F[LWS_t, CIS_t, IND_t, AGR_t; e_t]$$

$$\text{投资: } I_t = F[CIS_t, IND_t, AGR_t; e_t]$$

$$\text{出口: } X_t = F[TOT_t, wGDP_t, MP_t, P_t, ULC_t; e_t]$$

$$\text{假设: } \text{进口: } M_t = F[TOT_t, wGDP_t, MP_t, P_t, ULC_t; e_t]$$

- 单方程模型
- 劳动份额 LWS 和资本份额 CIS 的长期关系对于总需求来说是外生的

步骤 3：模拟

劳动份额 LWS 每下降 1%（资本份额 CIS 每上升 1%）对消费、投资和净出口（C、I、NX）的影响

所有变量使用对数形式，估算步骤 2 中每一个因果关系，来算出分析模型中每个变量的弹性（系数）。

把弹性系数放入反映每一个需求要素（C、I、NX）相对于国民收入的边际变化的方程中。把消费、投资和净出口的中数均值变化作为这一时期观测值的中数平均变化（从实际角度）。

LWS 同时下降 1%时（即 CIS 同时上升 1%时），每一个国家总私人需求的变化：

假设在 n 个经济体中，经济体 i 是所有 n 个经济体中其他 j 个经济体的贸易伙伴。如果所有 n 个经济体中劳动份额 LWS 同时变化 1%时，对一个经济体 i 的总需求（AD）的联动影响由以下四个要素的和来表示：

$$\% \Delta AD_i = \left\{ \begin{array}{c} \% \Delta GDP_i \\ + \\ \% \Delta AD_i \text{ given a } \% \Delta LWS_i \\ + \\ \text{National Multiplier effect on } AD_i \\ + \\ \sum_j (\% \Delta NX_j \text{ given a } \% \Delta LWS_j) \end{array} \right\}$$

结果和解读

我们的估计方法是根据 1960 至 2007 年的时间序列数据，使用动态框架来估计 16 个经济体中每一个经济体和总需求三个要素中的每一个要素的劳动份额弹性。这些弹性指标反映了每一个需求要素是如何随着劳动份额的变化而变化的。从国民收入需求方解释的假设是，总需求和劳动份额之间存在一个长期的、稳定的均衡。另一方面，建模方法假设总需求的各组成要素（消费、投资和净出口）与劳动份额的变化之间不存在相互影响关系。这种简化会带来弹性估计中的不精确。另一方面，对每个经济体采用单方程估算也有其优点，就是避免无法检验的假设导致政策建议更加复杂化⁵⁴。需要重点指出的是估计过程的二元性：弹性是测量劳动份额每增加或减少 1% 对总需求任一构成要素（如，投资）变化的影响大小，它等于同一要素相对于资本（即收入）份额每减少或增加 1% 时的变化。由于，政府支出从定义上讲等同于公共部门就业收入份额，因此此处忽略政府支出指标。在这方面，实证研究中的工资份额按照上述描述的方法进行了调整。

实证分析中估算弹性的使用有两种方式。第一，用来模拟劳动份额下降 1% 所带来的消费、投资和净出口（相对于 GDP）的变化；只需要用估计的弹性乘以经过要素价格加权之后的相应需求要素的均值。第二，把弹性放在更普遍的框架中，来模拟（在 16 个经济体之中）所有其他 15 个经济体的劳动份额同时下降 1% 时，某一个经济体总需求的变化：模拟这个反馈效应的假设前提是每个国家劳动份额的下降都对其净出口有一个可测量的收入影响。

图 A1 展示了劳动份额下降 1% 对每一个总需求构成要素的模拟效果。相对于投资和净出口，在所有经济体中，国内私人消费的反应都是负的，并且是实质性的：在这种情况下，区分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差别是不可能的，因为他们都看上去损失程度都相同。除阿根廷、澳大利亚和南非外，所有国家和欧元区整体上的国内私人消费都降低了 0.3% 以上。在拥有大量人口以及内部市场的经济体中（欧元区、中国、德国、墨西哥、土耳其和美国），消费的下降幅度更大，在 0.4%-0.5% 之间。

与消费下降相反，除了其中六个经济体之外，其他所有经济体的劳动份额的下降都给投资带来了正面影响。这六个受到影响但是不显著的经济体包括阿根廷、中国、印度、韩国、土耳其和美国。在新兴经济体中，投资对劳动份额下降（即利润份额上升）不敏感的一个可能的原因是，企业利润和总投资之间的相关性差。因为在这些国

家公共产业政策和公共投资是基础设施和工业发展的驱动力。因此，对绝大多数新兴经济体来说，高投资率是政府为了在全球化中追赶步伐、努力创造最佳商业环境所带来的结果，因而短期私人利润份额对投资率只产生微弱的影响（Akyuz et al., 1998）。利润份额的增加对投资的影响为 0 的唯一的超发达经济体是美国：Onaran et al. (2011) 早先的研究曾指出，美国将利息和分红收入纳入对“投资”的定义带来了混淆视听的效果，使得无法将资本份额增长（劳动份额下降）对投资的影响明显区分出来。同样的情况也可能发生在本报告的估计中⁵⁵。对所有其他发达经济体来说，劳动份额下降 1%（即资本份额增长 1%）将会带来 0.1%以上的投资增长。这种效应在欧元区、德国和日本最大，分别达到 0.3%、0.38%、0.29%。

至于净出口，图 A1 (c) 显示了所有国家劳动份额每下降 1%带来的净出口增加。需要重点注意的是，在净出口方面，影响程度的大小依赖于出口和进口的相对价格、经济的开放度和国内价格弹性等复合弹性⁵⁶。墨西哥、南非和中国等发展中国家，影响更大一些。而中国作为全球市场上出口势头最强劲的经济体，这种影响就分外地高。有必要指出的是，对于中国来说，2%的净出口增长（在劳动份额下降 1%时）是由 1.1%的出口份额（占 GDP）增长和 0.9%的进口份额（占 GDP）下降所构成的。这些显著影响与中国劳动力市场的一些代表性特点相关。首先，中国单位劳动成本的价格弹性是全世界最高的，这意味着高度劳动密集型、高加价的出口结构。第二，相对价格的出口弹性也是世界最高的，反映了中国的出口需求严重依赖于消费品，如纺织品，具有高价格弹性的特点。最后，相对价格的进口弹性仅次于南非，位居世界第二。这一点可能也解释了南非劳动份额下降 1%对净出口的影响在 16 个经济体中排行第二的原因。（图 A1 (c)）

如果试图将每一个经济体的每个自变量的效应加起来分析劳动份额每下降 1%对私人需求的总影响，就可能产生误导。因为图 A1 和对图中结果的估算过程中并没有考虑消费、投资和净出口之间的相互作用。但不管怎样，图 A1 中所呈现的估计结果还是提供了丰富的信息：在我们研究的绝大多数经济体中，劳动份额的降低——例如把工资降低到平均劳动生产率以下以获得竞争力——可能会给国内消费（国内交易的产品和服务）带来负效用，必须通过国内投资和净出口的大量增加来抵销其对总需求的消极影响。这些发现与 Felipe 和 Kumar 的研究是一致的，他们发现单位劳动成本的降低（劳动份额的下降），对于那些在全球市场上没有大量出口的经济体是不利的：在与中国竞争出口类似商品的时候，这些经济体降低单位劳动成本也不会有好处，因为对

他们而言，单位劳动成本的缩减只会对消费（有效需求降低）和投资（扩大技术差距）产生负作用而进一步加深这些国家的经济衰退（Felipe 和 Kumar，2011）。

图 A1 劳动份额下降 1%对国内产品和服务的私人消费、投资和净出口的影响：a 为产品和服务的私人消费；b 为投资；c 为净出口

	私人消费	投资	净出口
欧元区 12 国	↘ (-0.439)	↗ (0.299)	↗ (0.057)
阿根廷	↘ (-0.153)	→ (0.015)	↗ (0.192)
澳大利亚	↘ (-0.256)	↗ (0.174)	↗ (0.272)
加拿大	↘ (-0.326)	↗ (0.182)	↗ (0.266)
中国	↘ (-0.412)	→ (0.000)	↗↗ (1.986)
法国	↘ (-0.305)	↗ (0.088)	↗ (0.198)
德国	↘ (-0.501)	↗ (0.376)	↗ (0.096)
印度	↘ (-0.291)	→ (0.000)	↗ (0.310)
意大利	↘ (-0.356)	↗ (0.130)	↗ (0.126)
日本	↘ (-0.353)	↗ (0.284)	↗ (0.055)
墨西哥	↘ (-0.438)	↗ (0.153)	↗ (0.381)
韩国	↘ (-0.422)	→ (0.000)	↗ (0.359)
南非	↘ (-0.145)	↗ (0.129)	↗ (0.506)
土耳其	↘ (-0.491)	→ (0.000)	↗ (0.283)
英国	↘ (-0.303)	↗ (0.120)	↗ (0.037)
美国	↘ (-0.426)	→ (0.000)	↗ (0.037)

注：纵轴表示每项要素的变动百分比：包括商品和服务私人消费、投资、净出口影响的百分比变化，商品投资的百分比变化，出口价值减进口价值的百分比变化

资料来源：ILO 估算（Stockhammer，2012）

1. 各国失业率数字见 ILO 报告，2011c。
2. “领薪雇员”不包括个体劳动者、家庭帮工成员、工人合作社成员以及无法按就业状态归类的工人。工资定义见技术附录一。
3. 见 ILO 报告，2012b。另一种工资的衡量单位原本应该是小时工资，但是只有少部分拥有较发达统计系统的国家才有这方面的数据。
4. 估算中包括中国多少会夸大全球工资增长情况，因为覆盖 2006 年到 2012 年的工资数据只涉及“城镇单位”，实际上大多是国有企业、集体所有制单位以及与国家有关的其他类别公司。《中国统计年鉴》目前单独发布对“城镇私营单位”雇员的年工资收入数据，但是这一系列数据从 2009 年才开始发布，没有覆盖所有类别雇员的相关数据。
5. 工作分享计划也被称作“短期工作”、或被视为“部分”或“技术性”失业（见 Messenger，2009）。
6. 实施工作分享计划的国家包括阿根廷、奥地利、保加利亚、加拿大、智利、克罗地亚、捷克共和国、比利时、法国、德国、匈牙利、墨西哥、荷兰、波兰、罗马尼亚、塞尔维亚（只在公司层面）、斯洛伐克、斯洛文尼亚、南非、瑞士、土耳其和乌拉圭；美国的各别州实施了小型工作分享计划（见 ILO，2011a）。要了解更多关于中等收入国家工作分享措施的信息，见 Messenger 和 Rodríguez，2010）。
7. 来自有数据可查的 30 个发达国家的初步季度数据表明，在发达经济体，实际平均工资在 2012 年有可能是零增长。
8. 图 9 也证明了 2008 年通胀率较高不是由于名义工资需求较高造成的，因为名义工资和 2007 年的增速是一样的（甚至略慢）。相反，较高的物价水平传递到工人身上，结果工人得到的实际工资较低。该图还表明，2009 年工资正向上升避免了物价更进一步的紧缩。
9. 虽然衡量劳动生产率有很多不同方式，但都是相对于劳动力投入来定义经济产出（见 OECD，2001）。与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一致，本报告采用就业人口人均 GDP 来简化计算劳动生产率。经调整后以工作小时数计算的方法更加精确，但这种方法往往只适用于研究单一国家（参见美国劳工统计局在网页 <http://www.bls.gov/lpc/> 上发布的劳动生产率数据 [2012 年 9 月 17 日查阅]），而我们采用的这种简单计算方法更适合全球工资报告这种覆盖大量国家的研究项目，因为许多国家没有可靠的工作小时数据。

10. 关于乌克兰在 1992 至 2002 年间的发展趋势，见 Ganguli 和 Terrell，2006 年；关于更近期发展趋势，见 ILO，2011d。
11. 能够全职工作但要缩短工时的人员比例从 2007 年的 4.4% 激升至 2008 年的 10.6% 和 2009 年的 19.4%，然后再次降至 2010 年上半年的 12.3 %。
12. 阿根廷的工资统计中存在不一致，这些不一致无法在本报告发布之前得到解决；因此决定不在此报告中发布其数据。
13. 海湾合作委员会的成员包括巴林、卡塔尔、科威特、阿曼、沙特阿拉伯和阿拉伯联合酋长国。
14. 2008 年国际劳工组织《关于争取公平全球化的社会正义宣言》强调，作为《体面劳动议程》的一部分，要推进“与工资和收入、工作时间和其他工作条件相关的政策，确保所有人公平分享发展成果，确保所有劳动者和需要此种保护的人群能够获得最低生存工资”（ILO，2008a，第 10 页）。2009 年《全球就业契约》还鼓励各国政府“考虑采用最低工资等方式减少贫困和不平等现象，提升需求，促进经济稳定”（ILO，2009，第 7 页）。
15. 见《确定最低工资公约》，1970 年（第 131 号）。
16. 从每月 877 欧元（即按 14 个月每月支付 751 欧元计算）降至每月 684 欧元。
17. 在 2010 年年初，国际劳工组织和世界银行开展了一项联合调查，调查内容为在 77 个国家和地区在超过两年的时间里（2008 年年中至 2010 年年底）所采取的对经济危机的政策措施。调查数据和联合报告可登陆 <http://www.ilo.org/crisis-inventory> [2012 年 9 月 17 日查阅]。最低工资是 62 项接受调查的政策应对措施之一。报告从几个方面解释了各国之间的差别，包括最低工资标准的制度性特点使得调整最低工资标准更加容易，甚至能够强制性地进行调整。（Bonnet，Saget 和 Weber，2012）。
18. 1.25 美元的国际贫困线相当于 15 个最不发达国家（LDC）的国家贫困线的平均值，而 2 美元的国际贫困线相当于 75 个发展中经济体贫困线的中位值。国家贫困线是对一揽子满足规定的最低营养需求的基本消费品的价格进行估算得出的数值。参见 Ravallion et al，2008。
19. 包括前两期《全球工资报告》（ILO，2008a，2010a）；欧盟委员会，2007；IMF，2007；World Bank，2011；OECD，2011，2012a；UNCTAD，2011 和 2012；以及 ILS，2011，2012 等等，在此不一一列举。有关工资份额对宏观经济总量的影响方面的研究，UNCTAD（2011）的报告认为目前很多此类研究只是进行描述性的相关分析，而不是研究其因果关系，本报告做到了这一点。

20. 这些实证研究可以追溯到二十世纪的早期，Arthur Bowley 最先使用英国十九世纪至二十世纪的数据分析其规律性，提出了“Bowley’s 定律”。Paul Douglas 研究美国的劳动份额也有类似的发现，并与数学家 Charles Cobb 推导出著名的科布一道格拉斯生产函数。该函数假设劳动与资本之间的国民收入功能性分配比例为常数，从而简化了经济模型（见 Mankiw, 2003）。凯恩斯把这个实证的常数描述作“一个奇迹”（Keynes, 1939）。此后，Solow 质疑了实证材料的可靠性（Solow, 1958）（La Marca and Lee, 即将出版）。
21. 概括地讲，（未调整的）劳动收入份额等于雇员的总劳动薪酬除以 GDP，而调整后的劳动收入份额是假定个体经营劳动者与雇员有相近的平均收入并把他们的收入也加到劳动者总薪酬当中。使用这种标准调整方法有利有弊：一方面，不同经济体中个体经营人员的实际情况是不同的：发达国家个体经营人员更有可能属于正规就业部门，其薪酬可能比从事雇员工作更高，因而调整后的劳动份额可能会低估实际劳动份额。而欠发达经济体的情况恰恰与之相反，个体经营人员更有可能是弱势劳动者，其薪酬低于他们在正规部门就业的收入。但是，如果不调整个体经营人员的劳动份额则会导致 GDP 中就业产生的报酬的比例被低估。此外，即便使用不同调整方法，变化趋势（这是该报告的关注焦点）也不会出现明显改变（见 ILO, 2010a）。使用调整后劳动份额还可以保持与其它多数相关研究之间的可比性。
22. 参见巴黎经济学院（Paris School of Economics）世界顶级收入数据库，<http://g-mond.parisschoolofeconomics.eu/topincomes/>
23. 留存收益定义为总营业盈余减去红利分配部分。
24. 德国联邦统计办公室，国民经济核算：国内生产总值、季度数据，Fachserie 18, Series 1.2（2012 年 5 月），表 1.11。
25. 一份欧盟委员会报告得出结论：“对有数据的时期（即 1980 年代中期至 2000 年代初期）的估测结果明确表明，技术进步对劳动收入份额总额的降低应承担最大责任”（见欧盟委会报告，2007 年，第 260 页）。然而，这一结论在发展中国家证据不足。
26. 数据来源的详细介绍见 Stockhammer, 2012。
27. 联邦储备银行前总裁 Alan Greenspan 在 2007 年接受《金融时报》采访时明确表示，美国工资份额的下降、工资与劳动生产率的差距拉大可能危及对自由市场的政治支持（Guha, 2007）

28. 如上所述，总需求是消费、投资、净出口和政府消费支出之和。政府支出被排除在分析范围之外，这是由于政府支出的定义等同为公共部门就业人员的劳动份额。
29. 所有表中具体的计量经济学推导结果可见 Onaran 和 Galanis, 2012 即将出版。
30. 见 IMF, 2012c。注意，将单位人工成本的概念作为成本竞争的衡量指标并非不存在争议。例如，Felipe 和 Kumar 认为，当单位人工成本上升时，从定义上讲资本的单位成本必然下降，那么对于外部竞争力的影响就是不确定的（Felipe 和 Kumar, 2011）。
31. 只有美国一个发达经济体的例子表明，利润份额的增长对投资的影响为零。早先 Onaran et al. (2011) 的研究表明，美国在对投资的界定中包含利率和分红因素，难以清晰地区分资本份额的增长（劳动份额的下降）对投资的影响力。在我们的回归计算中也是相同的情况。亦见 Hein 和 Vogel, 2008，他们的研究中发现，在美国，资本收入对投资没有影响，与本报告的结论一致。
32. 这种情况下存在的一个问题是，可能由较低的收入份额带来的经济增长应该如何的人群当中进行分配。但这一问题超越了本报告的研究范畴。有关改变功能性收入分配对微观经济影响分析的重要性，请见 Atkinson, 2009。
33. 几个案例研究专门分析了美国的这一现象。特别见 Barba 和 Pivetti, 2009; Cynamon 和 Fazzari, 2008; Guttmann 和 Plihon, 2010; van Treeck Hein 和 Dünhaupt, 2007; 以及 and van Treeck, 2009)。计量经济学研究显示（金融和地产）财富对消费的决定性影响在统计学上是显著的，并不仅仅是在美国。见 See Ludvigson 和 Steindel, 1999; Mehra, 2001; Onaran, Stockhammer 和 Grafl, 2011; Boone 和 Girouard, 2002; Dreger 和 Slacalek, 2007。
34. ILO 委托 Farhad Mehran 完成报告《全球工资趋势的估计：方法问题》，国际劳工局；对该报告提出评审意见的独立专家包括 Neuchatel 大学统计研究所 Yves Tillé 教授出具了专家报告；HEC 蒙特利尔大学和乔治华盛顿大学 Yujin Jeong 教授和 Joseph L. Gastwirth 教授提出了建议；韩国劳动研究所的 Joyup Ahn 教授给出了答复。
35. 国际劳工组织有关就业状况分类标准（ISCE）的决议，第 15 届国际劳动统计大会通过（日内瓦，1993 年 10 月）。
36. 见 ILO 有关与就业相关收入的考量方法决议，第 16 届国际劳动统计大会通过（日内瓦，1998 年 10 月）。见

http://www.ilo.org/global/What_we_do/Statistics/standards/resolutions/lang--en/docName--WCMS_087490/index.htm

37. 我们致力于尽可能扩大覆盖范围，是因为我们认为体面劳动及足够收入应该让所有劳动者都能够享受到，而统计指标应该涵盖所有与该指标相关的人群。详见国际劳工组织，2008b
38. 我们采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发布的该国物价指数（CPI）。对巴西和美国，我们在这两国的合作伙伴建议采用不同的物价指数，我们采用了巴西地理和统计研究所（IBGE）和美国劳工统计局的相应数据。如果某些国家的统计局直接为我们提供了数据，或者藉此国家提供了名义和实际工资数据，我们也会采用该国的 CPI 或实际工资价值。
39. 我们的调查范围包括所有在国际劳工组织就业趋势模型（GET 模型）中就业数据齐全的国家和地区，排除了那些对全球性或者区域性趋势影响不明显的小的国家和地区（如海峡群岛或梵蒂冈）。
40. 这与标准调研方法是一致的。用建立模型框架来估算无应答数据，而用建立设计框架的办法来处理调查问卷的无应答情况。
41. 有关缺失数据问题，详见 ILO 2010c，第 8 页。
42. 另一种分析模型采用人均 GDP 和人口规模指标，得出的结论非常相近。
43. 就业人数和雇员总数都是基于 KILM 的数据得出，用 2005 年购买力平价 PPP\$ 表示的 GDP 来源于世界银行发布的世界发展指标。
44. 估算区域 h 的雇员总数 是由区域内有数据国家的雇员数量乘以未标定权数。然后再求跨区域总和。
45. 见美国劳工统计局主要针对工业化国家的国际劳动比较研究 (<http://www.bls.gov/fls/>) [2012 年 9 月 17 日查阅]。由于我们不比较水平，只关注一个国家长期以来的变化，所以对数据要求不很高。
46. 因为 KILM 还未发布相关数据，我们用 2008 年雇员占就业人数的比例计算出 2009 年的雇员数，再用这个比例乘以 2009 年的就业人数。KILM 的主要数据来源是 Laborsta。
47. 见 ILO（2008b，第 15 页）工资水平和人均 GDP 的关系。尽管如此，工资发展在中短期内可能偏离劳动生产率变化趋势。
48. OECD 统计术语词汇表，stats.oecd.org/glossary/ [2012 年 9 月 17 日查阅]。
49. 政府支出作为福利指标表明政府福利随时间变化呈驼峰形发展：政府支出在 GDP 中的比重在上世纪 80 年代达到顶峰，从那以后一直下降。政府支出和慷慨的福利支出的作用在以往的文献中已经得到了大量的印证，尤其强调了后者对劳动年龄人口的保留工资的影响上，参见 Pierson, 1994; Korpi 和 Palme, 2003。还有，上世纪 80 年代一些高福利国家的福利水平被大量缩减，这正是劳动工资份额下降

的起点。有关 GDP 中政府支出减少对劳动工资份额下降的影响的研究见 Harrison, 2002; Jayadev, 2007。

50. 欧盟（2007）和世界货币基金组织（2007）均发现工会入会率的作用非常小甚至可以忽略不计。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发现其他的劳动力市场制度指标对劳动工资份额没有显著影响后，加入了工会入会率和“税收楔子”指标。
51. Bentolila 和 Saint-Paul（2003）和欧盟（2007）的研究中，使用资本-劳动比例和 ICT 资本，或二者结合的指标考察了技术进步的影响。ICT 资本（或 ICT 服务）是对于技术进步来说是一个更明确的代理指标，因为它反映了已经实现的技术进步，而与实现的动机无关。
52. 特别是，这些研究指出了政府开支和社会福利在决定参保者保留工资（即使个体愿意进入劳动力市场的水平）时影响的显著性。社会福利状况的改善会导致保留工资水平提升（通过劳动力市场的负激励产生收入效应），因此，会带来工资分布向右移动，使所有人的工资的增加：在保持其他要素不变的情况下，这会带来劳动份额的提高。
53. 失业由经济中的失业率表示，汇率变动则是实际汇率方差的函数。金融改革是一个衡量进入壁垒、国际资本流动、利率管制、私有化、证券市场发展和金融改革指数的变量。有关基线模型之外更多分析模型的详细介绍，可参考 Stockhammer（2012）。
54. 在近似的总需求框架是使用单方程是文献中普遍使用的方法，如 Onaran, 2011; Hein 和 Vogel, 2008; Nasstepad 和 Storm, 2007。另一种单方程方法是用 VAR 系统估计弹性，但其潜在的问题是先任意假定消费、投资和净出口之间的关系。使用 VAR 方法的优势在于考虑了劳动份额的内生性。在单方程方法中，长期趋势的假设有助于克服内生性问题，即模型假设在因果框架下有长期稳定均衡关系。
55. 亦见 Hein 和 Vogel, 2008：他们发现利润份额对美国的投资没有影响，这与我们的报告结论是一致的。
56. 更多信息参见 Onara 和 Galanis 报告，预计于 2012 出版。

参考书目

Abiad, A.G.; Detragiache, E.; Tressel, T. 2008. 《关于金融改革的新数据库》，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工作论文，08/266 期。数据可参见：

<http://www.imf.org/external/pubs/ft/wp/2008/Data/wp08266.zip> [17 Sep. 2012]]).

Aleksynska, M.; Schindler, M. 2011. 《低、中、高收入国家的劳动力市场规制：一个新的面板数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工作论文 第 11/154 号（华盛顿特区）。数据可参见：

<http://www.imf.org/external/pubs/cat/longres.aspx?sk=25015.0> [2011 年 9 月 27 日].

Akyuz et al. 1998. [[to be included]]

Anderson, L. 2011. 《揭开神秘的阿拉伯之春：解析突尼斯，埃及和利比亚之间的差异》，《外交事务》，90 卷，第 3 期 5 月-6 月，2-7 页。

Anspal, S.; Kraut, L.; Rõõm, T. 2010. Sooline palgalohe Eestis: empiiriline analuus. Uuringuraport (《爱沙尼亚工资性别差距：经验分析》) Eesti Rakendusuurigute Keskus CentAR, Poliitikauuringute Keskus PRAXIS, Sotsiaalministeerium. 可参见：

http://www.sm.ee/fileadmin/meedia/Dokumendid/V21jaanded/Publikatsioonid/2011/Gender_pay_gap_Estonia_analysis.pdf [2012 年 9 月 17 日].

Arandarenko, M.; Avlijas, S. 2011. 《统计数据的面纱背后：揭露塞尔维亚的结构性不足》，选自 V. Schmidt 和 D. Vaughan-Whitehead 编辑的《危机对东南欧工资的影响》（布达佩斯：国际劳工组织体面工作技术支持团队及中东欧国家办公室），第 123-158 页

Argitis, G.; Pitelis, C. 2001. 《货币政策和收入分配：美国 and 英国的情况》，《后凯恩斯经济学》第 23 卷，第 4 期，617 - 638 页。

Artus P. 2009. L' équilibre macroéconomique du Monde, Natixis 特别报道 第 286 号(巴黎)。

ASDA' A Burson-Marsteller 阿拉伯青年调查，2012 年，“前十名的发现”，可参见：<http://www.arabyouthsurvey.com/english/> [2012 年 9 月 24 日].

Assaad, R. 1997. 《公共部门雇佣和薪酬政策对埃及劳动力市场的影响》，载于《世界银行经济评论》，第 11 卷. 第 1 期，1 月，第 85 - 118 页。

- Atkinson, A. 2009. 《要素份额：政治经济的主要问题？》，《牛津经济政策评论》，第 25 卷，第 1 期，第 3 - 16 页。
- Atkinson, A. ; Piketty, T. ; Saez, E. 2011. 《最高收入的历史发展》，《经济文献期刊》，49 卷，第 1 期，3 - 71 页。
- Azam, M. 2009. 《1983 - 2004 年印度城镇工资结构的变化：四分位回归分解》，IZA 系列讨论报告 第 3963 号（波恩），1 - 48 页。
- Bacchetta, M. ; Jansen, M. (主编). 2011. 《促进全球化的社会可持续性》（日内瓦，国际劳工组织）。
- 国际清算银行（BIS）。2006 年第 76 次年度报告，巴塞尔。
- Barba, A. ; Pivetti, M. 2009. 《不断增长的家庭债务：原因和宏观启示——一个长期分析》，《剑桥经济学杂志》，第 33 卷，第 10 期，第 113 - 137 页。
- Bassanini, A. ; Duval, R. 2006. 《世界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国家的就业模式：重新评估政策和机构的作用》，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经济部工作论文 486 号（巴黎，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
- Belser, P. ; Rani, U. 2011. 《扩大印度最低工资的覆盖范围：使用家庭数据模拟》，《经济和政治周刊》，第 46 卷，第 22 期，5 月 28 日，第 47 - 55 页。
- Bentolila, S. ; Saint-Paul, G. 2003. 《关于劳动份额变动的解释》，《对宏观经济学的贡献》第 3 卷，第 1 期，第 1 - 31 页。
- Bleaney, M. 1976. 《消费不足理论：历史和批判的分析》（纽约国际出版商）。
- Boily, L. 2011. “在纽约市主要行业团体支付奖金”，载于《每月劳动评论》，美国劳工统计局，华盛顿特区，10 月，第 22 - 28 页。
- Bonnet, F. ; Saget, C. ; Weber, E. 2012. 《社会保障和最低工资对 2008 年金融和经济危机的反应：国际劳工组织/世界银行的调查结果》，就业工作论文，第 113 号（日内瓦，国际劳工组织）。可参见：http://www.ilo.org/employment/Whatwedo/Publications/working-papers/WCMS_175204/lang--en/index.htm [2012 年 9 月 17 日]。
- Boone, L. ; Girouard, N. 2002. 股票市场、住房市场和消费者的行为，经合组织《经济研究》第 35 期（巴黎），第 175 - 200 页。
- Borbely, J.M. 2011. 《2007 - 2009 年失业工人的特征：形象短评》，《月度劳动评论》，美国劳工统计局，华盛顿特区，9 月，第 3 - 15 页。
- Brown, D. ; Deardorff, A. 2011. 《服装产业和约旦的经济：计算行业增加值中的国内市场份额》，为“约旦的更好工作：制衣业第三次综合合规报告”所准备的论文，（日内瓦，国际劳工组织）。

- Bruno, M. 2011. Regime de crescimento e acumulacao de capital no Brasil: Uma caracterizacao preliminar do periodo 1995 - 2010, 国际劳工组织工作论文 (日内瓦).
- Centre de Recherche et d' Etude sur la Sécurité Sociale [Tunisia]. 2011. Enquête sur la structure des salaires Tunisie 2011, 最终报告, République Tunisienne/国际劳工组织, 未出版
- Charpe, M. 2011. 提供工资份额的数据 [[[to be provided]].].
- Crimmann, A.; Wiessner, F.; Bellmann, L. 2010. 德国的工作分享计划: 应对危机的手段, 工作条件和就业系列研究, 第 25 期(日内瓦, 国际劳工组织).
- Cynamon, B.; Fazzari, S. 2008. 《消费时代的家庭债务: 增长的源泉 - 崩溃的风险》, 《资本主义和社会》, 第 3 卷, 第 2 期, 第 1 - 30 页.
- Dougherty, C. 2010. “约旦公共和私营部门收入的比较”, 工作条件和就业系列研究, 第 24 期(日内瓦, 国际劳工组织)
- Draghi, M. 2012. “在非传统时代的货币政策”, BIS 中央银行家的演讲, (法兰克福, 欧洲中央银行).
- Dreger, C.; Slacalek, J. 2007. “Finanzmarktentwicklung, Immobilienpreise und Konsum”, in DIW Wochenbericht, 第 74 卷, 第 533 - 536 页.
- Elbadawi, I.; Soto, R. 2011. 中东和北非地区内外的财政体制, 经济研究论坛工作论文(开罗).
- ; —. 2012. 资源租金、政治动荡和经济增长, 经济研究论坛工作论文 (开罗).
- Epstein, G. (主编). 2005. 《金融化和世界经济》(Cheltenham, Edward Elgar 出版公司《》).
- ; Burke, S. 2001. 威胁效应和生产的国际化》, 政治经济研究所工作论文, 15 (阿默斯特, 马萨诸塞大学).
- Estevão, M.; Nargis, N. 2002. 《法国工资的稳定性》,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工作论文 (华盛顿特区).
- 欧盟委员会 (EC). 2007. 《欧盟的劳动报酬份额》, 《2007 年欧洲的就业》, 就业、社会事务和平等机会董事长, (布鲁塞尔), 第 237 - 272 页.
- . 2010. 《2010 年欧洲的劳资关系》, 就业、社会事务和包容性董事长(布鲁塞尔)
- . 2012a. 面向岗位充实的复苏, 与欧洲议会、理事会、欧洲经济和社会委员会及地区委员会的交流, 可参见: http://ec.europa.eu/commission_2010-2014/andor/headlines/news/2012/04/20120418_en.htm [2012 年 9 月 17 日].

- —. 2012b. AMECO: 年度宏观经济数据库, 经济和金融事务董事长 (链接到数据集 http://ec.europa.eu/economy_finance/ameco/user/serie/SelectSerie.cfm[2012 年 9 月 17 日])。
- - . 2012c. 《2011 年欧洲的就业和社会发展》 (布鲁塞尔).
- Feldstein, M. 2008. 《工资反映生产率的增长吗? 》, 美国国家经济研究局工作论文系列 13953 号 (剑桥, 马萨诸塞)。
- Felipe, J.; Kumar, U, 2011 《欧元区的单位人工成本: 再论竞争力》 (马尼拉, 亚洲开发银行)。
- Fleck S.; Glaser, J.; Sprague, S. 2011, 《报酬-生产率之间的差距: 形象短评》, 《月度劳动评论》 美国劳工统计局, 华盛顿特区, 1 月, 第 57 - 6900 页。
- Ganguli, I.; Terrell, K. 2006, 《机构、市场和男性、女性的工资差距: 来自乌克兰的证据》, 《比较经济学杂志》, 第 34 卷、第 2 期、第 200 - 227 页。
- Glyn, A. 2009 年, 《功能性分配和不平等》, 载于 W. Salverda、B. Nolan 和 T. Smeeding (主编): 《牛津经济不平等手册》, (牛津大学、牛津大学出版社) 第 101 - 126 页
- Gollin, D. 2002, 《理顺劳动份额》, 《政治经济学杂志》(芝加哥)、第 110 卷、第 2 期、第 458 - 474 页。
- . 2010. 《解读国民收入中劳动份额的下降》, G- 24 政策摘要, 4 号, 牛津大学经济系。
- Guha, K. 2007, 《全球展望》, 《金融时报》, 9 月 17 日
- Guttman, R.; Plihon, D. 2010. 《消费者债务和金融的脆弱性》, 《国际应用经济学评论》, 第 24 卷, 第 3 期, 第 269 - 283 页。
- Harrison, A. 2002. 《全球化削弱了劳动力的份额吗? 一些跨国证据》, 油印件, 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
- Hein, E.; Mundt, M. 2012 年即将出版. 《金融化以及工资带动经济复苏的要求和潜力: 针对 G20 国家的讨论》, 工作条件和就业司, (日内瓦, 国际劳工组织)。
- ; Schoder, C. 2011. 《利率、分配和资本积累: 对美国和德国的后卡莱茨基分析》, 《国际应用经济学评论》, 第 25 卷, 第 6 期, 第 693-723 页。
- ; Vogel, L. 2008. “分配和增长的再考虑: 六个经合组织国家的实证结果”, 《剑桥经济学杂志》, 第 32 卷, 第 3 期, 第 479 - 511 页。
- Holman, C.; Joyeux, B.; Kask, C. 2008. 《2000 年以来的部门和行业劳动生产率趋势》, 载于《月度劳工评论》, 美国劳工统计局, 华盛顿特区, 2 月, 第 64 - 82 页。

Husson, M. (2010), “Le partage de la valeur ajoutée en Europe”, 载于 La Revue de l’ IRES, 第 64 卷, 第 1 期, 第 47 - 91 页.

国际劳工问题研究所 (IILS). 2008. , 《2008 年世界工作报告:金融全球化时代的收入不平等》(日内瓦, 国际劳工组织/国际劳工问题研究所).

—. 2011. 《劳动世界报告 2011: 让市场为工作效力》(日内瓦, 国际劳工组织/国际劳工问题研究所).

—. 2012. 《劳动世界报告 2012:更好的经济, 更好的工作》(日内瓦, 国际劳工组织/国际劳工问题研究所).

国际劳工办公室(ILO). 2008a. 《2008/2009 全球工资报告:最低工资与集体谈判:工资确定机制政策一致性》(日内瓦).

—. 2008b. 国际劳工组织关于促进社会正义和实现公平全球化宣言(日内瓦).

—. 2008c. 衡量体面劳动, 关于体面劳动衡量标准的三方专家会议论文, 日内瓦, 9 月 8 日 - 10 日

—. 2009. 《从危机中复苏:全球就业契约》(日内瓦).

—. 2010a. 《全球工资报告 2010/2011:危机时期的工资政策》(日内瓦).

—. 2010b. 《全球工资报告 2010/2011: 非洲情况简介》(日内瓦).

—. 2010c. 趋势计量经济模型:方法回顾(日内瓦).

—. 2010d. 体面工作的国家分册:坦桑尼亚(大陆)(日内瓦).

—. 2010e. 全球社会保障报告 2010/2011:危机时期及以后的覆盖面(日内瓦).

—. 2011a. 二十一世纪的劳动时间, 在工作时间安排三方专家会议的讨论报告, 工作条件与就业项目, TMEWTA/2011(日内瓦).

—. 2011b. 家政劳动的报酬, 家政劳动政策简报 1, 工作条件和就业司(日内瓦).

—. 2011c. 劳动力市场关键指标(KILM), 第 7 版(日内瓦).

—. 2011d. 体面工作的国家分册:乌克兰(日内瓦).

—. 2011e. Panorama Laboral 2011. América Latina y el Caribe (利马, 国际劳工组织地区办事处).

—. 2012a. 《2012 全球就业趋势:防止更深的就业危机》(日内瓦).

—. 2012c. 《体面劳动指标:概念和定义》, 第 1 版, 5 月(日内瓦).

—. 2012c. 《北非的就业稳定和社会经济进步:北非 2011 - 2015 年规划》(开罗).

—. 2012d. 《有效保护家政服务工人:劳动法规设计指南》(日内瓦).

—国际金融公司。2012a. 约旦的更好工作:制衣业第三次综合合规报告(日内瓦, 国际劳工组织).

一；2012 年世界银行，应对金融和经济危机的政策清单：一个联合合成报告（日内瓦及华盛顿特区）。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 2007. 《劳动的全球化》，《世界经济前景》，2007 年 4 月：世界经济的溢出效应和周期(华盛顿特区)，第 1 期，第 161 - 192 页。

一. 2009. 2009 年 4 月，《世界经济展望：危机和复苏》（华盛顿特区）。

一. 2010. 2010 年 4 月《世界经济展望：恢复平衡增长》（华盛顿特区）。

一. 2012a. 2012 年 4 月，《世界经济展望：增长恢复，但危险仍在》（华盛顿特区）。

一. 2012b.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关于劳动市场问题的建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情况说明。网址：<http://www.imf.org/external/np/exr/facts/pdf/labor.pdf> [2012 年 9 月 17 日]。

Jayadev, A. 2007. 《资本账户开放和劳动收入的比重》，《剑桥经济学杂志》，第 31 卷 第 3 期、第 423 - 443 页。

Jetin, B. 2012. 《收入分配、劳动生产率和竞争力：是泰国劳动体制可持续吗？》，《剑桥经济学杂志》第 36 卷、第 4 号、第 895—917 页。

Kapsos, S.; Horne, R. 2011. 《世界的工作贫困者：使用家庭调查数据的新的估计值》，国际劳工组织，劳工市场的关键指标（KILM），第 7 次版(日内瓦，国际劳工组织)，ch. 1A.

Kerr, C. 1977. 劳动力市场和工资决定：劳动力市场的巴尔干化及其他论文(伯克利，加利福尼亚大学出版社)。

Keynes, M. 1939. 《实际工资和产出的相对变化》，《经济杂志》，第 49 卷 第 193 号，第 34 - 49 页。

Korpi, W.; Palme, J. 2003. 《紧缩和全球化背景下的新政治和阶级政治：1975 - 1995 年 18 个国家的福利水平回归》，《美国政治科学评论》，第 97 卷、第 3 期、第 425 - 446 页。

Krueger, A. 1999. 《衡量劳动的份额》，《美国的经济评论》，第 89 卷、第 2 期、第 45 - 51 页。

Kulikov, G.; Blyzniuk, V. 2010. 金融和经济危机对工资、收入分配和税收体系的影响（布达佩斯：国际劳工组织体面工作技术支持团队和中欧东欧国家办公室）。

Kumhof, M.; Rancière, R. 2011. 不平等、融资和危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技术报告（华盛顿特区）。

La Marca, M.; Lee, S. 即将出版，《开放经济体的工资和增长：是两难政策选择吗？》，《》I. Islam 和 D. Kucera（主编），

- Lane, P.R.; Milesi-Ferretti, G.M. 2007. 《国家的外部财富, 标记 II: 修订和扩展后的 1970 - 2004 年外国资产和负债估值计》, 《国际经济学杂志》、第 73 卷、第 2 期、第 223-250 页。数据可见
<http://www.imf.org/external/pubs/ft/wp/2006/data/update/wp0669.zip>
[2011 年 2 月 15 日]
- Lavoie, M.; Stockhammer, E. 2012 年即将出版, 工资主导的增长: 概念、理论和政策, 工作条件和就业研究 (日内瓦, 国际劳工组织)。
- Lazonick, W.; O'Sullivan, M. 2000. 《股东价值最大化: 公司治理的新思想》, 《经济和社会》、第 29 卷、第 1 期、第 13 - 35 页。
- Lee, S. 2012. 《最低工资制度的多样化: 按指标对各国进行排序的视角》, 《国际劳工评论》、第 51 卷、第 3 期、第 261 - 274 页
- Lindenboim, J.; Kennedy, D.; Graña, J.M. 2011. 《工资份额和总需求: 对劳动和宏观经济政策的影响》, 论文发表在规范体面劳动大会上, 国际劳工组织, 日内瓦, 7 月 6-8 日。
- 低工资委员会, 2012. 全国最低工资: 2012 年低工资委员会报告 (诺维奇、行政局)。
- Ludvigson, S.; Steindel, C. 1999. 《股票市场对消费的影响有多重要?》, 《联邦储备银行纽约经济政策评论》, 7 月, 第 29 - 51 页。
- Luebker, M. 2011. 《劳动生产率》, 载于 T. Sparreboom and A. Albee, 主编的《非洲撒哈拉以南地区的体面劳动: 监测千年发展目标的就业指标》(国际劳工组织, 日内瓦)。
- Lukiyanova, A. 2011. 最低工资对俄罗斯工资分配的影响, 基础研究项目工作文件 09/EC/2011, 经济学 (莫斯科国立研究型大学高等经济学院)
- McKenzie, R.; Brackfield, D. 2008. 经合组织的单位人工成本体系和相关指标, 经合组织统计工作论文 2008/04 (巴黎)。
- Mankiw, N.G. 2003. 《宏观经济学》, 第五版 (纽约, WORTH 出版商)
- Mehra, Y.P. 2001. 《实证生命周期总消费方程中的财富效应》, 《联邦储备银行里士满经济季刊》第 87 卷, 第 2 期, 第 45 - 68 页。
- Messenger, J.C. 2009. 工作分享: 一项在全球就业危机期间保留工作岗位的策略。工作条件下就业司政策简讯第 1 号 (日内瓦, 国际劳工组织)。
- ; Rodriguez, S. 2010. 中等收入国家工作分享的新进展, 工作条件下就业司政策简讯第 2 号 (日内瓦, 国际劳工组织)。

- 一; Ghosheh, N. (主编). 2010. 离岸外包和远程工作的劳动条件 (日内瓦, 国际劳工组织, Basingstoke, Palgrave Macmillan)
- Naastepad, C.W.M.; Storm, S. 2007. 《经合组织的需求管制 (1960 - 2000)》, 《后凯恩斯经济学杂志》第 29 卷, 第 2 期, 第 211 - 246 页。
- Obstfeld, M.; Rogoff, K. 2009. 《全球失衡和金融危机: 共有原因的产物》, 密西西比州、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
- Onaran, Ö. 2011. 《全球化、宏观经济表现和分配》, 载于 E.Hein 和 E.Stockhammer (主编)的《现代凯恩斯宏观经济学和经济政策指南》(Cheltenham, Edward Elgar).
- 一; Galanis, G. 2012 年即将出版, 《需求工资还是利润主导? 国家和全球影响》工作条件和就业。(日内瓦, 国际劳工组织)。
- 一; Stockhammer, E.; Grafl, L. 2011. 《美国的金融化、收入分配和总需求》, 《剑桥经济学杂志》, 第 35 卷、第 4 期、第 637 - 666 页.
- 经济合作与发展 (OECD) 2001, 《衡量生产率: 总生产率和行业生产率增长的测量方法》, 载于《经合组织手册》(巴黎)。
- 一. 2008. 2008 年经合组织就业展望(巴黎)。
- 一. 2011. 我们正处于分化: 为什么不平等现象不断上升(巴黎)。
- 一. 2012a. 劳动收入的不平等: 驱动力及消除途径?, 经合组织经济部 政策说明第 8 号 (巴黎)。
- 一. 2012b. 2012 年经合组织就业展望 (巴黎)。
- Oya, C. 2010. 非洲的农村不平等、工资就业和劳动力市场形成: 历史和微观的实证研究, 工作文件 97 号, 政策一体化司 (日内瓦, 国际劳工组织)。
- Pastore, F.; Verashchagina, A. 2004. 白俄罗斯的工资分配, 研讨文件第 1140 号、劳工研究所(波恩)。
- Pierson, P. 1994. 废除福利国家吗? 里根、撒切尔和政治缩减(剑桥大学、剑桥大学出版社)。
- Piketty, T.; Saez, E. 2003. 《美国的收入差距: 1913 - 1998》, 《经济学季刊》, 第 118 卷、第 1 期、第 1 - 39 页.
- Rani, U.; Belser P. 2012. 《发展中国家最低工资的有效性: 以印度为例》、《国际劳动研究杂志》, 第 4 卷、第 1 期、第 45 - 66 页.
- Ravallion, M.; Chen, S.; Sangraula, P. 2008. 再看美元的一天, 世界银行政策研究工作论文 4620(华盛顿特区)。

Rizzio, M. 2011. 卢旺达和埃塞俄比亚的农业工资就业：当前政策忽视的问题及着手解决问题的框架分析，国际劳工组织政策一体化部，工作文件 103 号（日内瓦，国际劳工组织）。

Rodrik, D. 1997. 全球化已经走得太远了吗？（华盛顿特区，国际经济研究所）

— 1999. 《民主国家支付更高的工资》，《经济学季刊》、第 114 卷，第 3 期、第 707 - 738 页。

Roine, J. ; Waldenström, D. 2012. 《资本收益对瑞典收入差距的影响》，《收入和财富评论》，第 58 卷、第 3 期、第 569 - 587 页。

Rossman, P. 2009. 金融化和劳动的临时化——成立工会和监管对策，论文发表于全球劳动大学会议，孟买，2 月。

俄罗斯联邦联邦政府统计服务机构。2011 统计年鉴，附件：俄罗斯联邦 1991 - 2010 年社会经济指标。网址：

http://www.gks.ru/wps/wcm/connect/rosstat/rosstatsite/main/publishing/catalog/statistic_Collections/doc_1270707126016 [2012 年 9 月 24 日]。

Särndal, C.-E. ; Deville, J.-C. 1992. 《抽样调查的校正估计》，《美国统计协会期刊》、第 87 卷、第 418 期，376 - 382 页。

Schmidt, V. ; Vaughan-Whitehead, D. (主编). 2011. 《危机对东南欧工资的影响》（布达佩斯：国际劳工组织体面劳动技术支持团队和中东欧国家办公室）。

Shehata, D. 2011. 《法老的倾倒：穆巴拉克的统治如何走到尽头》，《外交事务》、第 90 卷、第 3 期、5 月—6 月、第 26 - 32 页。

Solow, R. 1958. 《有关相对份额稳定性的特别说明》，《美国经济评论》，卷号 x，9 月，第 618 - 631 页。

Sommers D. ; Franklin, J.C. 2012. 《2010 - 2020 年就业前景：有关 2020 年预测的概述》，《每月劳动评论》，美国劳工统计局，华盛顿特区，1 月，第 3 - 2000 页。

Soto, R. ; Huauas, I. 2011. 《阿联酋已逃脱了石油的诅咒？》，经济研究论坛工作文件（开罗）。

—；Vazquez-Alvarez, R. 2010. 短住移民政策(合同)对人力资本存量（和生产力）的影响（迪拜、阿联酋、经济政策和研究中心，迪拜经济理事会）。

Statistisches Bundesamt Deutschland. 2009. Niedrigeinkommen und Erwerbstätigkeit (Wiesbaden), Seite 8.

— 2012. Volkswirtschaftliche Gesamtrechnungen, Inlandsproduktsberechnung, Lange Reihen ab 1970, 第 18 卷，第 1.5 号 (Wiesbaden)，表 1.8.

Stockhammer, E. 2004. 《金融化和积累放缓》，《剑桥经济学杂志》、第 28 卷、第 5 期、第 719 - 741 页。

—. 2009. 《经合组织国家功能性收入分配的决定因素》，IMK 研究 2009 年 5 月 (Hans Böckler 基金会 Düsseldorf)

—. 2012 年即将出版. 《为什么工资份额下跌了?一个对功能性收入分配决定因素的面板分析》，工作条件和就业研究 (日内瓦，国际劳工组织)

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中央统计局，2011a. 劳动力调查。

网址：<http://www.cbssyr.org/index-EN.htm> [2012 年 9 月 24 日]。

—. 2011b. 《统计摘要》，数据可见：<http://www.cbssyr.org/index-EN.htm> [2012 年 9 月 24 日]。

Tillé, Y. 2001. *Théorie des sondages: Echantillonnage et estimation en populations finies* (Paris, Dunod).

Tomei, M.; Belser, P. 2011. 《国际劳工组织有关家政工人体面劳动的新标准:问题和讨论的摘要》，载于《国际劳工评论》，第 150 卷、Nos/NOV? 3-4, 12 月，第 431 - 3800

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 (工发组织)，2006，工业统计数据库。

网址：<http://dx.doi.org/10.5257/unido/indstat3/2006> [2011 年 2 月 15 日]。

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 (贸发会议)，2011。《2011 年贸易和发展报告》(日内瓦和纽约，联合国)，参见

网址：http://unctad.org/en/docs/tdr2011_en.pdf [2012 年 9 月 17 日]。

—. 2012. 《贸易和发展报告》，2012 年(日内瓦和纽约，联合国)。 2012 年。

网址：http://unctad.org/en/PublicationsLibrary/tdr2012_en.pdf [2012 年 9 月 24 日]。

联合国统计司，2011. 国民账户办公室各国数据，联合国数据浏览器，网址：<http://data.un.org/Explorer.aspx?d=SNA>

美国劳工部，劳工统计局(BLS)。2011，《2010 年制造业小时薪酬成本的国际比较》，新闻发布网址：<http://www.bls.gov/news.release/pdf/ichcc.pdf> [2012 年 9 月 17 日]

—. 2012，《2007-2009 年的衰退》，载于《统计焦点》。

网址：<http://www.bls.gov/spotlight/2012/recession/> [2012 年 9 月 17 日]。

Van Treeck, T. 2009. 《政治经济对“金融化”的辩论:宏观经济视角》,载于《国际政治经济评论》,第16卷。第5期,,第907 - 944页。

— ; Hein, E.; Dunhaupt, P. 2007. Finanzsystem und wirtschaftliche Entwicklung: Neuere Tendenzen in den USA und in Deutschland, IMK 研究 2007 年 5 月(Düsseldorf: Hans Böckler 基金会).Vaughan-Whitehead, D. (主编). 2011 年,《危机中的工作不平等现象: 欧洲的的证据》(Cheltenham, Edward Elgar, 和日内瓦国际劳工组织)。

— (主编). 2010.《扩大后的欧盟重新审查最低工资》(Cheltenham, Edward Elgar, 和日内瓦国际劳工组织)。

Vazquez-Alvarez, R. 2010. 阿联酋工资及工资确定的微观结构(迪拜、 阿联酋、 经济政策和研究中心, 迪拜经济理事会)。

—。 2011a.《移徙的经济租金: 管理政策变化的潜在赢家和输家》, 劳工部阿联酋委托世界银的论文

—。 2011b. 预测就业增长和沙特阿拉伯王国沙特化的影响, 世界银行委托, 沙特阿拉伯王国劳动部协助完成的论文。

—。 2011c. 比较阿联酋化和沙特化, 论文由 MNHD 社会保障和世界银行劳工处委托

—。 2012a. 迪拜的劳动力市场: 迪拜主城区与自由区(迪拜, 阿拉伯联合酋长国, 迪拜经济理事会)。

—。 2012b. 评估迪拜新劳动力市场管理法规的效果(阿联酋, 迪拜, 经济政策和研究中心)。—; Belser, P. 即将出版. [to be included]

Wolff, E.; Zacharias, A. 2009. 《美国家庭财富与经济福利的衡量》, 载于《经济不平等现象杂志》、 第7卷、 第2期、 第83 - 115页。

世界银行, 2011, 《移民与汇款年鉴》, 2011 年(华盛顿特区)。

Zhou, M.; Xiao, W.; Yao, X. 2010. 不平衡的经济增长和不均衡的国民收入分配: 来自中国的证据, 劳动力和就业研究所工作论文, 2010 年 11 月(洛杉矶, 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

¹ 各国失业率数字见 ILO 报告，2011c。

² “领薪雇员”不包括个体劳动者、家庭帮工成员、工人合作社成员以及无法按就业状态归类的工人。工资定义见技术附录一。

³ 见 ILO 报告，2012b。另一种工资的衡量单位原本应该是小时工资，但是只有少部分拥有较发达统计系统的国家才有这方面的数据。

⁴ 估算中包括中国多少会夸大全球工资增长情况，因为覆盖 2006 年到 2012 年的工资数据只涉及“城镇单位”，实际上大多是国有企业、集体所有制单位以及与国家有关的其他类别公司。《中国统计年鉴》目前单独发布对“城镇私营单位”雇员的年工资收入数据，但是这一系列数据从 2009 年才开始发布，没有覆盖所有类别雇员的相关数据。

⁵ 工作分享计划也被称作“短期工作”、或被视为“部分”或“技术性”失业（见 Messenger，2009）。

⁶ 实施工作分享计划的国家包括阿根廷、奥地利、保加利亚、加拿大、智利、克罗地亚、捷克共和国、比利时、法国、德国、匈牙利、墨西哥、荷兰、波兰、罗马尼亚、塞尔维亚（只在公司层面）、斯洛伐克、斯洛文尼亚、南非、瑞士、土耳其和乌拉圭；美国的各别州实施了小型工作分享计划（见 ILO，2011a）。要了解更多关于中等收入国家工作分享措施的信息，见 Messenger 和 Rodríguez，2010）。

⁷ 来自有数据可查的 30 个发达国家的初步季度数据表明，在发达经济体，实际平均工资在 2012 年有可能是零增长。

⁸ 图 9 也证明了 2008 年通胀率较高不是由于名义工资需求较高造成的，因为名义工资和 2007 年的增速是一样的（甚至略慢）。相反，较高的物价水平传递到工人身上，结果工人得到的实际工资较低。该图还表明，2009 年工资正向上升避免了物价更进一步的紧缩。

⁹ 虽然衡量劳动生产率有很多不同方式，但都是相对于劳动力投入来定义经济产出（见 OECD，2001）。与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一致，本报告采用就业人口人均 GDP 来简化计算劳动生产率。经调整后以工作小时数计算的方法更加精确，但这种方法往往只适用于研究单一国家（参见美国劳工统计局在网页 <http://www.bls.gov/lpc/> 上发布

的劳动生产率数据 [2012 年 9 月 17 日查阅]），而我们采用的这种简单计算方法更适合同全球工资报告这种覆盖大量国家的研究项目，因为许多国家没有可靠的工作小时数据。

¹⁰ 关于乌克兰在 1992 至 2002 年间的发展趋势，见 Ganguli 和 Terrell，2006 年；关于更近期发展趋势，见 ILO，2011d。

¹¹ 能够全职工作但要缩短工时的人员比例从 2007 年的 4.4% 激升至 2008 年的 10.6% 和 2009 年的 19.4%，然后再次降至 2010 年上半年的 12.3 %。

12 阿根廷的工资统计中存在不一致，这些不一致无法在本报告发布之前得到解决；因此决定不在此报告中发布其数据。

13 海湾合作委员会的成员包括巴林、卡塔尔、科威特、阿曼、沙特阿拉伯和阿拉伯联合酋长国。

14 2008 年国际劳工组织《关于争取公平全球化的社会正义宣言》强调，作为《体面劳动议程》的一部分，要推进“与工资和收入、工作时间和其他工作条件相关的政策，确保所有人公平分享发展成果，确保所有劳动者和需要此种保护的人群能够获得最低生存工资”（ILO，2008a，第 10 页）。2009 年《全球就业契约》还鼓励各国政府“考虑采用最低工资等方式减少贫困和不平等现象，提升需求，促进经济稳定”（ILO，2009，第 7 页）。

15 见《确定最低工资公约》，1970 年（第 131 号）。

16 从每月 877 欧元（即按 14 个月每月支付 751 欧元计算）降至每月 684 欧元。

17 在 2010 年年初，国际劳工组织和世界银行开展了一项联合调查，调查内容为在 77 个国家和地区在超过两年的时间里（2008 年年中至 2010 年年底）所采取的应对经济危机的政策措施。调查数据和联合报告可登陆 <http://www.ilo.org/crisis-inventory> [2012 年 9 月 17 日查阅]。最低工资是 62 项接受调查的政策应对措施之一。报告从几个方面解释了各国之间的差别，包括最低工资标准的制度性特点使得调整最低工资标准更加容易，甚至能够强制性地进行调整。（Bonnet, Saget 和 Weber，2012）。

18 1.25 美元的国际贫困线相当于 15 个最不发达国家（LDC）的国家贫困线的平均值，而 2 美元的国际贫困线相当于 75 个发展中经济体贫困线的中位值。国家贫困线是对一揽子满足规定的最低营养需求的基本消费品的价格进行估算得出的数值。参见 Ravallion et al，2008。

¹⁹ 包括前两期《全球工资报告》（ILO，2008a，2010a）；欧盟委员会，2007；IMF，2007；World Bank，2011；OECD，2011，2012a；UNCTAD，2011 和 2012；以及 IILS，2011，2012 等等，在此不一一列举。有关工资份额对宏观经济总量的影响方面

的研究，UNCTAD（2011）的报告认为目前很多此类研究只是进行描述性的相关分析，而不是研究其因果关系，本报告做到了这一点。

²⁰ 这些实证研究可以追溯到二十世纪的早期，Arthur Bowley 最先使用英国十九世纪至二十世纪的数据分析其规律性，提出了“Bowley’s 定律”。Paul Douglas 研究美国的劳动份额也有类似的发现，并与数学家 Charles Cobb 推导出著名的科布一道格拉斯生产函数。该函数假设劳动与资本之间的国民收入功能性分配比例为常数，从而简化了经济模型（见 Mankiw，2003）。凯恩斯把这个实证的常数描述作“一个奇迹”（Keynes，1939）。此后，Solow 质疑了实证材料的可靠性（Solow，1958）（La Marca and Lee，即将出版）。

21 概括地讲，（未调整的）劳动收入份额等于雇员的总劳动薪酬除以 GDP，而调整后的劳动收入份额是假定个体经营劳动者与雇员有相近的平均收入并把他们的收入也加到劳动者总薪酬当中。使用这种标准调整方法有利有弊：一方面，不同经济体中个体经营人员的实际情况是不同的：发达国家个体经营人员更有可能属于正规就业部门，其薪酬可能比从事雇员工作更高，因而调整后的劳动份额可能会低估实际劳动份额。而欠发达经济体的情况恰恰与之相反，个体经营人员更有可能是弱势劳动者，其薪酬低于他们在正规部门就业的收入。但是，如果不调整个体经营人员的劳动份额则会导致 GDP 中就业产生的报酬的比例被低估。此外，即便使用不同调整方法，变化趋势（这是该报告的关注焦点）也不会出现明显改变（见 ILO，2010a）。使用调整后劳动份额还可以保持与其它多数相关研究之间的可比性。

22 参见巴黎经济学院（Paris School of Economics）世界顶级收入数据库，<http://g-mond.parisschoolofeconomics.eu/topincomes/>

23 留存收益定义为总营业盈余减去红利分配部分。

24 德国联邦统计办公室，国民经济核算：国内生产总值、季度数据，Fachserie 18，Series 1.2（2012 年 5 月），表 1.11。

25 一份欧盟委员会报告得出结论：“对有数据的时期（即 1980 年代中期至 2000 年代初期）的估测结果明确表明，技术进步对劳动收入份额总额的降低应承担最大责任”（见欧盟委会报告，2007 年，第 260 页）。然而，这一结论在发展中国家证据不足。

26 数据来源的详细介绍见 Stockhammer，2012。

27 联邦储备银行前总裁 Alan Greenspan 在 2007 年接受《金融时报》采访时明确表示，美国工资份额的下降、工资与劳动生产率的差距拉大可能危及对自由市场的政治支持（Guha，2007）

28 如上所述，总需求是消费、投资、净出口和政府消费支出之和。政府支出被排除在分析范围之外，这是由于政府支出的定义等同为公共部门就业人员的劳动份额。

29 所有表中具体的计量经济学推导结果可见 Onaran 和 Galanis, 2012 即将出版。

30 见 IMF, 2012c。注意，将单位人工成本的概念作为成本竞争的衡量指标并非不存在争议。例如，Felipe 和 Kumar 认为，当单位人工成本上升时，从定义上讲资本的单位成本必然下降，那么对于外部竞争力的影响就是不确定的（Felipe 和 Kumar, 2011）。

31 只有美国一个发达经济体的例子表明，利润份额的增长对投资的影响为零。早先 Onaran et al. (2011) 的研究表明，美国在对投资的界定中包含利率和分红因素，难以清晰地区分资本份额的增长（劳动份额的下降）对投资的影响力。在我们的回归计算中也是相同的情况。亦见 Hein 和 Vogel, 2008，他们的研究中发现，在美国，资本收入对投资没有影响，与本报告的结论一致。

32 这种情况下存在的一个问题是，可能由较低的收入份额带来的经济增长应该如何在人群当中进行分配。但这一问题超越了本报告的研究范畴。有关改变功能性收入分配对微观经济影响分析的重要性，请见 Atkinson, 2009。

33 几个案例研究专门分析了美国的这一现象。特别见 Barba 和 Pivetti, 2009; Cynamon 和 Fazzari, 2008; Guttmann 和 Plihon, 2010; van Treeck Hein 和 Dünhaupt, 2007; 以及 and van Treeck, 2009)。计量经济学研究显示（金融和地产）财富对消费的决定性影响在统计学上是显著的，并不仅仅是在美国。见 See Ludvigson 和 Steindel, 1999; Mehra, 2001; Onaran, Stockhammer 和 Grafl, 2011; Boone 和 Girouard, 2002; Dreger 和 Slacalek, 2007。

³⁴ ILO 委托 Farhad Mehran 完成报告《全球工资趋势的估计：方法问题》，国际劳工局；对该报告提出评审意见的独立专家包括 Neuchatel 大学统计研究所 Yves Tillé 教授出具了专家报告；HEC 蒙特利尔大学和乔治华盛顿大学 Yujin Jeong 教授和 Joseph L. Gastwirth 教授提出了建议；韩国劳动研究所的 Joyup Ahn 教授给出了答复。

³⁵ 国际劳工组织有关就业状况分类标准（ISCE）的决议，第 15 届国际劳动统计大会通过（日内瓦，1993 年 10 月）。

³⁶ 见 ILO 有关与就业相关收入的考量方法决议，第 16 届国际劳动统计大会通过（日内瓦，1998 年 10 月）。见

http://www.ilo.org/global/What_we_do/Statistics/standards/resolutions/lang-en/docName--WCMS_087490/index.htm

³⁷ 我们致力于尽可能扩大覆盖范围，是因为我们认为体面劳动及足够收入应该让所有劳动者都能够享受到，而统计指标应该涵盖所有与该指标相关的人群。详见国际劳工组织，2008b

³⁸ 我们采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发布的该国物价指数（CPI）。对巴西和美国，我们在这两国的合作伙伴建议采用不同的物价指数，我们采用了巴西地理和统计研究所（IBGE）和美国劳工统计局的相应数据。如果某些国家的统计局直接为我们提供了数据，或者藉此国家提供了名义和实际工资数据，我们也会采用该国的 CPI 或实际工资价值。

³⁹ 我们的调查范围包括所有在国际劳工组织就业趋势模型（GET 模型）中就业数据齐全的国家 and 地区，排除了那些对全球性或者区域性趋势影响不明显的小的国家和地区（如海峡群岛或梵蒂冈）。

⁴⁰ 这与标准调研方法是一致的。用建立模型框架来估算无应答数据，而用建立设计框架的办法来处理调查问卷的无应答情况。

⁴¹ 有关缺失数据问题，详见 ILO 2010c，第 8 页。

⁴² 另一种分析模型采用人均 GDP 和人口规模指标，得出的结论非常相近。

⁴³ 就业人数和雇员总数都是基于 KILM 的数据得出，用 2005 年购买力平价 PPP\$ 表示的 GDP 来源于世界银行发布的世界发展指标。

⁴⁴ 估算区域 h 的雇员总数 $\hat{n}_h$ 是由区域内有数据国家的雇员数量乘以未标定权数。然后再求跨区域总和。

⁴⁵ 见美国劳工统计局主要针对工业化国家的国际劳动比较研究 (<http://www.bls.gov/fls/>) [2012 年 9 月 17 日查阅]。由于我们不比较水平，只关注一个国家长期以来的变化，所以对数据要求不很高。

⁴⁶ 因为 KILM 还未发布相关数据，我们用 2008 年雇员占就业人数的比例计算出 2009 年的雇员数，再用这个比例乘以 2009 年的就业人数。KILM 的主要数据来源是 Laborsta。

⁴⁷ 见 ILO（2008b，第 15 页）工资水平和人均 GDP 的关系。尽管如此，工资发展在中短期内可能偏离劳动生产率变化趋势。

⁴⁸ OECD 统计术语词汇表，stats.oecd.org/glossary/ [2012 年 9 月 17 日查阅]。

⁴⁹ 政府支出作为福利指标表明政府福利随时间变化呈驼峰形发展：政府支出在 GDP 中的比重在上世纪 80 年代达到顶峰，从那以后一直下降。政府支出和慷慨的福利支出的作用在以往的文献中已经得到了大量的印证，尤其强调了后者对劳动年龄人口的保留工资的影响上，参见 Pierson, 1994; Korpi 和 Palme, 2003。还有，上世纪 80 年代

一些高福利国家的福利水平被大量缩减，这正是劳动工资份额下降的起点。有关 GDP 中政府支出减少对劳动工资份额下降的影响的研究见 Harrison, 2002; Jayadev, 2007。

⁵⁰ 欧盟（2007）和世界货币基金组织（2007）均发现工会入会率的作用非常小甚至可以忽略不计。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发现其他的劳动力市场制度指标对劳动工资份额没有显著影响后，加入了工会入会率和“税收楔子”指标。

⁵¹ Bentolila 和 Saint-Paul（2003）和欧盟（2007）的研究中，使用资本-劳动比例和 ICT 资本，或二者结合的指标考察了技术进步的影响。ICT 资本（或 ICT 服务）是对于技术进步来说是一个更明确的代理指标，因为它反映了已经实现的技术进步，而与实现的动机无关。

⁵² 特别是，这些研究指出了政府开支和社会福利在决定参保者保留工资（即使个体愿意进入劳动力市场的水平）时影响的显著性。社会福利状况的改善会导致保留工资水平提升（通过劳动力市场的负激励产生收入效应），因此，会带来工资分布向右移动，使所有人的工资的增加：在保持其他要素不变的情况下，这会带来劳动份额的提高。

⁵³ 失业由经济中的失业率表示，汇率变动则是实际汇率方差的函数。金融改革是一个衡量进入壁垒、国际资本流动、利率管制、私有化、证券市场发展和金融改革指数的变量。有关基线模型之外更多分析模型的详细介绍，可参考 Stockhammer（2012）。

⁵⁴ 在近似的总需求框架是使用单方程是文献中普遍使用的方法，如 Onaran, 2011; Hein 和 Vogel, 2008; Nasstepad 和 Storm, 2007。另一种单方程方法是用 VAR 系统估计弹性，但其潜在的问题是先任意假定消费、投资和净出口之间的关系。使用 VAR 方法的优势在于考虑了劳动份额的内生性。在单方程方法中，长期趋势的假设有助于克服内生性问题，即模型假设在因果框架下有长期稳定均衡关系。

⁵⁵ 亦见 Hein 和 Vogel, 2008：他们发现利润份额对美国的投资没有影响，这与我们的报告结论是一致的。

⁵⁶ 更多信息参见 Onara 和 Galanis 报告，预计于 2012 出版。
